

美国研究

季刊

1989年第2期

AMERICAN STUDIES

第3卷

6月15日出版

中美建交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

金灿荣(4)

利益的汇合：国家关系的基础

资中筠(8)

——写在中美建交十周年之际

美国国会与中美建交十年

张毅(17)

对中美关系下一个高度的探索

李国友(25)

对当前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看美国的几点思考

袁明(33)

美苏核军控谈判的目的及其制约因素

曹冶、陈英选(40)

关于现代美国经济学的历史演变与现状的若干认识

崔勇列(48)

——经济学史与分析方法论的双重考察

从社会结构变动看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动向

邓方(58)

“太平洋的东部首府”洛杉矶(二)

王受之(64)

——一个被低估了的美国城市

本期责任编辑：金灿荣

编辑出版

中华美国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照排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印刷装订

北京新华印刷厂

发行、订阅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刊号

ISSN1002-8986/CN11-1170 / C@

国外代号

Q1122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定价:

国内版 1.75 元

国际版 2.50 美元 (邮费在外)

AMERICAN STUDIES

Summer 1989

Vol. 3, No. 2

CONTENTS

A SUMMARY OF THE SYMPOSIUM ON SINO-U.S. RELATIONS IN THE LAST DECADE

Jin Chanrong (4)

A three-day symposium, co-sponsored by the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and the just established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American Studies, was held at the end of last year to commemorate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Sino-U.S. diplomatic relations. The three major subjects covered were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relations,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main arguments.

CONVERGENCE OF INTERESTS: BASIS FOR RELATIONS AMONG NATIONS

Zi Zhongyun (8)

In this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basis for and development of Sino-U.S. relations in the last decad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relations are based on the convergence of both countries' interests, that there is a large area in which the two countries' national interests converge, and that, therefore, Sino-U.S. relations are expected to further develop despite differences and difficulties.

U.S. CONGRESS AND SINO-U.S. RELATIONS IN THE LAST DECADE

Zhang Yi (17)

Using data from various congressional documents, the author finds that realism and anti-communist ideology are the two major determinants of congressional attitudes and policies towards China. Realism accounts for the congressional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Sino-U.S. relations, whereas anti-communist ideology largely explains some congressional actions which have caused problems for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SEARCHING FOR THE NEXT HEIGHT IN SINO-U.S. RELATIONS

Li Guoyou (25)

Common strategic concerns provided the original stimulus for developing Sino-U.S. relations. New momentum can be found in Sino-U.S. cooperation in the knowledge-intensive sector, including professional service and training and exchange of brain resources. A four-dimension and three-layer's scheme of analysis is used by the author to buttress his contention.

REFLECTIONS ON CHINESE INTELLECTUALS' VIEWS OF AMERICA

Yuan Ming (33)

America has been linked with the miseries and aspirations of the Chinese people.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China's need for enlightenment and national salvation in its modern history have strongly influenced the views by three generation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regarding America. Recent opinions of America are linked to reflections on China's own traditional
Š culture.

PURPOSES AND CONSTRAINTS OF U.S.-SOVIET NUCLEAR ARMS CONTROL TALKS

Cao Ye & Chen Yingxuan (40)

Because of nuclear weapons' enormous destruction power and their vulnerability to strikes, negotiations on their reduction have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both U.S. and Soviet security strategies. The need for arms development, U.S.-Soviet political relations and changes in the balance of power are the three major constraints for nuclear arms control talks.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PRESENT STATE OF MODERN ECONOM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Cui Yonglie (48)

The center of western economics moved from Britain to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war. The two major schools of economic theory in U.S. today, the neo-classical theory and monetarism, differ in methodology as well as in policy preferences. Futur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will be characterized by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schools, the broadening of the subject matter and an emphasis on sectorial economic analysis.

CHANGES IN SOCIAL STRUCTURE AND NEW DEVELOPMENTS IN AMERICAN SOCIOLOGY

Deng Fang (58)

History of American sociology has shown that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sociologists to distinguish social problems that derive from changes in social structure. A major social problem in the U.S. today is an asymmetric structur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focus of American sociology is shifting from the study of how social system influences individual actions to the study of how individual purposive actions are combined into behavior of a social system.

LOS ANGELES: THE EASTERN CAPITAL OF THE PACIFIC(PART II)

Wang Shouzhi (64)

Los Angeles has become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enter of the U.S. west coast.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also led to cultural prosperity and post-industrial style of work and life. The city's problems, though many, can be solved through decentralization. It is the author's view that Los Angeles could become the eastern capital of the Pacific in the 21st century.

AMERICAN STUDIES, a quarterly, is published jointly by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American Studies, and the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content of the articles in this journal should not be construed as reflecting the views either of the Association or the Institute.

中美建交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

金灿荣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头等大事。十度春秋,虽有风风雨雨,中美关系总的来说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成果丰硕。

1988年12月15—17日,适值中美建交十周年前夕,12月14日刚刚成立的中华美国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中美建交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从学术角度回顾十年来中美关系各个方面的发展过程并展望未来的前景。

出席会议的有全国各地研究美国问题的著名专家学者,有对促进中美建交和两国关系发展作出过贡献的两国外交家,以及当时在京的美国知名学者。会议收到25篇论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先生出席开幕式并发言,与大家一起回顾和展望中美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华美国学会主席李慎之主持了开幕式。他高度评价十年前中美建交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指出:“拥有13亿人民的两个大国结束了长达30年的对峙与对抗而重新成为朋友,这件事情对世界和人类的影响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的,更何况它们不但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制度,还代表着两种伟大的文化传统,它们的结合给这个世界大大地加强了和平的因素,给总是对前途惴惴不安的人类增添了安全感,增添了对明天的信心”(李慎之在“中美建交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资中筠依据题为《利益的汇合:国家关系的基础》的论文做主题发言。这篇引起广泛注意的文章,从国家关系的现实基础——“利益的汇合”出发,剖析中美关系中的四个主要问题:(1)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2)中美关系的国际背景及其变化;(3)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与美国的关系;(4)中美文化交流中的双方利益之所在。在第四部分中,有两个观点特别值得人们注意:第一,在看待美国的文化影响时,必须分清“文化侵略”和“文化渗透”的不同性质;在对待接受美国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上,应该认识到接受美国教育不等于“亲美派”,而“亲美”与热爱祖国并无必然的矛盾。第二,解决人才流向中的问题,关键在于“中国是否能创造一种能发挥各种人才的作用的环境和可以过得去的公平待遇。不利于中国建设的人才流向只有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经济的发展和人才政策的合理化,才能逐步好转。”这与其说是中美关系中的问题不如说是中国自己的问题。但是目前这种人才流向的状况客观上对美国有利(见本期资中筠文章)。

资文是对中美关系的全面论述。会议收到的其他24篇论文则大致分属三个方面:外交和军事战略;经济贸易往来与科技合作;社会文化交流。本期《美国研究》特从每一方面择出一篇论文,与《利益的汇合:国家关系的基础》一文同时发表,以飨读者。

美国所张毅《美国国会与中美建交十年》一文，是尝试从美国国内政治和决策程序角度分析其对华政策。美国所李国友在《对中美关系下一个高度的探索》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在今后的世界经济环境中，劳动力价格的低廉已不具有明显的优势，中国的巨大智力资源才是其真正的优势所在；在智力密集产业的合作，将给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新动力，使中美关系达到新的高度的新颖论点。北京大学袁明《对当前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看美国的几点思考》一文，则是从一个侧面探讨了一个难度较大的问题：美国在中国的形象问题。

根据会议论文的不同性质，会议分成外交和军事战略、经济贸易、社会文化三个专题组进行了深入讨论。下面介绍各专题组其他文章的特点，并着重介绍讨论情况。

1. 中美外交和军事战略关系

在中美两国抛弃长达20年的敌对、隔阂政策，跨越互不信任的海洋，走向友好合作的进程中，安全因素起了主要作用，是原动力。但是，随着近年来国际局势的缓和，安全因素对中美关系的促进作用减弱。今后的趋势如何是大家极为关心的问题。有三篇论文讨论了中美战略安全关系，包括美国所张静怡的《中美关系中的安全因素：回顾与展望》，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刘沛的《中美建交以来的两国安全关系》和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庄去病的《美国对华政策中的苏联因素》。张文和刘文是在双边关系中探讨安全因素的作用，而庄文则是从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角度分析苏联因素对美国对华政策作用的。三位作者均认为，美苏对抗的基本态势和安全上的利害关系没有根本变化，中美之间仍有一定限度的共同安全利益。张文和刘文还指出，中美在安全问题上的合作仍有潜力可挖。

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的一片阴影，一个不定时炸弹。美国所何迪在《美台关系十年》一文中，在分析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演变和美台“实质外交”的发展后，指出了台湾问题对未来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潜在威胁。

北京大学王缉思力图从美国外交思想中现实利益考虑和意识形态考虑和意识形态考虑之间矛盾交织的特点来分析美国对华政策，不限于一般政策分析，而是将政策及其制定程序放到一定的政治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体系中去考察，他的《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与对华政策》一文，在会上引起很大兴趣，受到许多与会者的推崇。

对外友协张雪玲的《十年来中美友好城市关系的发展》一文介绍了中美建立友好城市活动的发展过程和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孙阿清在《影响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几点因素》一文中，分析了战略因素、经济因素和台湾问题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影响。

这一专题组主要围绕四个问题展开讨论：

（1）如何评价安全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

安全因素，即中美联合抗苏的共同安全利益，是中美关系建立和发展的主要基础和前提。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和中美两国的政策调整，安全因素的作用降低。其结果，一方面促进中美关系向多样化发展，使中美关系的发展更加平稳而坚实，另一方面，过去在共同安全利益掩饰下的矛盾和摩擦将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尽管安全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有所降低，但对未来中美关系仍具有长期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2）由王辑思的论文引发的，对美国外交思想中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两种传统及其对华政策的影响的讨论最为热烈。

与会者一致的看法是，美国对华政策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结合的产物，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侧重面不一样。会上的分歧在于，一部分人认为意识形态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不可低估，意识形态差异是未来中美摩擦产生的一个根源；另一部分人认为，美国对外政策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现实主义的考虑，意识形态在淡化。

（3）关于国会在中美关系的作用，与会者同意张毅的论点，即国会从总体上说是促进中美关系发展的，但与行政部门相比要消极一些。在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的解释上有分歧，有人认为原因在于国会议员的反共意识形态色彩更强烈；有人认为更重要的还是对国家利益

的考虑,美国在台湾有巨大的实际利益。

还有人在会上提出要加强美国国会的工作。

(4)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大家基本上持乐观态度的同时,也看到阴影和困难,并且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如果中国继续落后,就不能指望美国平等地对待中国,更谈不上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2. 中美经济贸易往来与科技合作

南开大学熊性美和佟家栋合著的《中美贸易十年来的基本估价——兼论两国贸易中的比较利益》和经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蔡述理的《中美经济贸易往来的回顾与展望》两篇文章,都肯定了十年贸易的迅速而巨大的发展。熊文从比较利益角度分析了两国出口产品构成及其变化,并着重分析了美国政府政策对中美贸易的作用。蔡文则着重阐述扩大中美经济关系的意义并分析其可能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周世俭、何建雄所著《美国反倾销法对中国对美出口的影响》一文,着重分析了美国反倾销法对中国出口商品的不合理因素,介绍了近来美国方面的改进行动,提出中国方面的一些因应对策。

美国所孙海顺在《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与前景》一文中指出,随着美国对亚太地区投资高速增长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创造出更好的外商投资环境,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前景是乐观的。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吴念鲁在《中美金融往来十年》一文中,介绍了金融领域中美双方的交往与合作。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柯居韩题为《中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与美国经济》的文章,着重分析了中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与扩大中美经济合作之间的联系。

国家科委国际科技合作司提供的《中美科技合作十年回顾》一文,分析了中美科技合作在短短几年里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双边科技合作的原因,介绍了合作成功的实例。

关于这一专题的讨论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1)对十年来双边经济关系发展的评价。与会者认为,十年来中美经济关系发展迅速,中美贸易的发展速度不仅高于同期世界贸易的发展速度,而且高于各自国家对外贸易发展的平均速度。但与中美两国的地位和潜力相比,目前的两国贸易量和美国对华投资是偏少的,有待进一步发展。

(2)两国经济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和前景。美国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反倾销法的执行对中国对美出口不公正;在投资与贷款方面对中国不信任。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方面的问题大于美国方面,主要问题是:第一,对美国市场没有明确认识;第二,外贸体制落后,缺乏有效竞争;第三,经济立法不完备,使我国经济环境具有不确定性;第四,缺乏对外总体战略,对自己的短处和长处认识不清;第五,汇率严重扭曲,不利于进出口;第六,经济改革带来的一些新问题,如高速发展、经济过热,又如条块分割、财政包干、分灶吃饭,等等。

大家认为,未来中美经济关系的前景仍然是乐观的,但中美贸易的增长速度可能会略有下降。

3. 中美社会文化交流

美国所施咸荣的《近十年美国文学在中国》一文,首先给人们描述了建交以来中国大量翻译美国文学作品(小说、诗歌、戏剧和文学理论著作,尤其是小说)的空前繁荣景象,进而从著作、人员和研究团体三个方面介绍了中国美国文学研究的深化过程。美国所董乐山的《十年来美国书籍在中国》一文,则从书籍出版角度,通过分析十年来美国书籍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情况,探寻中国读者对美国的兴趣所在,以及造成这种兴趣的客观原因。美国所张跃宏在《中美新闻交流十年》一文中,介绍并分析了十年来中美新闻交流发展情况及其原因,他认为中美新闻交流具有跨文化传统的性质;随着交流的进行,双方新闻媒介对对方文化的理解均在加深。

美国所邓方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美建交以来的中国社会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杨子慧的《中美人口学术交流与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两篇文章，分别介绍了中美交流对中国社会学重建和发展、人口学重建和发展的积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十年回顾》一文，首先从出版角度介绍了十年来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的成果，接着根据中美关系研究中的十个主要方面介绍了在各个问题上的研究进展，最后指出了问题所在和努力方向。

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创立，无疑是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特别是教育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该中心中方正、副主任王志刚和沈宗美合写的《中美教育交流的新模式》一文，全面介绍了该中心创立和发展的过程，以及基本教学情况。

中美社会文化交流专题组的讨论是最为热烈的，讨论集中在这一问题上，即由于中美文化交流使中国知识界甚至整个中国社会都受到建国以来未曾有过的激烈冲击，我们现在应如何认识美国文化的冲击及其后果。会议发言一般也着重于两个方面：（1）如何评价随着交流而来的美国文化冲击；（2）在面临异质文化冲击的情况下，在中美两种文化的比较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意义何在。

关于第一个问题，一种意见认为，美国文化以及其他外来文化的冲击动摇了人们原有的价值观念，而新的价值体系又未形成，带来种种问题，如青年人中道德水准的下降等，从而形成“文化危机”。但与会的多数人认为，过去以闭关锁国为代价换取的“价值统一”才是真正的文化危机。“因为这种‘价值统一’剥夺了人民思考的权利，摧残了群众思考的能力，使整个民族的精神文化走向贫困”（见美国所邓方“中美建交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社会文化专题组讨论纪要”）。许多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思想解放是美国文化冲击带来的最重要的社会影响。

持后一种观点的人还认为，肯定美国文化冲击的积极社会影响不等于“全盘接受美国文化”。因为，第一，肯定美国文化冲击的积极影响并不等于否认这种文化冲击造成的某些消极的社会影响。第二，主张文化上的广开国门和让美国文化的冲击来得更猛烈一些，正是为了真正了解美国文化，没有“了解”这一前提，谈不上对美国文化进行科学分析，也就不可能真正坚持和创造自己的文化。

关于第二个问题，与会者认为，美国文化冲击引起中国知识界对于中国文化的反思，不仅不会导致中国的民族文化丧失其优良传统，反而会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

与会者认为，近年来中国知识界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虽然没有发现究竟哪种文化可以为目前中国所取，但是，这场文化讨论所创造的思想上的宽松环境和多元化标准，正在形成民族文化健康发展的外部条件。这一外部条件有助于中国文化不仅扩大其吸收外来文化的容纳量，而且可以保持其优秀的文化内核。

正如资中筠在做总结发言时指出的，这次会议具有三个特点：

第一，会议组织形式的开放性。虽非国际会议，外国学者也可列席旁听；与会者都有机会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体现了组织者求真的科学精神和自信。同时，也反映了十年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

第二，会议的议题多样，内容丰富。组织专题讨论中美社会文化交流本身就构成这次会议的一个特点。在三大专题中，各专题涵盖、包容的问题也是极为丰富的。会议的这一特点正表明十年来中国美国学研究的发展和收获。

第三，在中美比较中反思传统文化，社会文化专题组的讨论和最后一天大会发言表明了这一点。会议的这一特点又反映出中国美国学研究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在讨论中大家达成共识，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取决于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推进与成功，取决于民族文化的新生。

“中美建交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结束了，人们借此检阅了中国美国学研究的基本力量和

成果，结果令人欣慰。在会议的争辩和交锋中，现有的观点得到深化，得到交融，得到发展，新的观点也在涌现，成为美国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而这正是这次会议最有价值的收获所在。

利益的汇合：国家关系的基础

——写在中美建交十周年之际

资中筠

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而对生活在其中的当代人来说，却是风云变幻，内容丰富，值得思考和玩味。

中美两国今天的关系看来这样正常，交往这样密切，而中美建交这一事件在十年前却是轰动世界的新闻。整个建交谈判在绝对保密之下进行，笼罩着一层神秘的气氛。当时本人从事中美民间友好工作，早几天得知这一秘密，感到异常兴奋，不由得想起几十年来在逆境中为促进中美人民互相了解和中美关系正常化而奔走呼号的美国朋友和他们的动人事迹，是他们在两国隔绝的情况下，努力在人民之间架起桥梁。于是与几个同事合写了一篇纪念他们的文章，题为《金桥若虹，思我良朋》（《人民日报》登出时题目被改掉了，内容也遭删节），笔名为“友声”，取“嚶其鸣矣，求其友声”之意。那时，主要萦回脑际的是人民之间的友谊，以自己在两国正常交往之前能结交那么多美国朋友为幸，并以曾为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尽过一分微薄的力量为荣。但是对中美建交的重大意义的认识还是比较抽象的，十年来两国关系发展的迅速，内容之丰富，也是当初没有想像到的。十年以前，谁也不能想像，两国各阶层之间发展了这样广泛而深入的接触。省与州之间、市与市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以及各种机构和团体之间都建立了特殊的关系，两国公民中个人之间交的朋友以千万计。与此同时，政府间的官方关系，也有长足的发展。这些都达到两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所没有达到的规模。民间的友好促进相互了解，在这基础上促进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两国政府对改善关系的积极政策又为开展各界交往创造有利条件，由此形成良性循环。

这十年中，我国对美国以及美中关系的现状和历史的研究也从无到有，由浅入深，到今天美国学可以称为一门学科。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改革，为学术繁荣创造有利条件；一方面当然是由于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但使我们能获得大量的信息资料，而且能打破各种教条的约束，政治的偏见，作客观的、历史的分析。在这一背景之下，我们这次才能开成这样一个学术讨论会，而且能够以刚成立的“中华美国学会”的名义召开。

如果说人民之间主要是发展友谊与了解的话，那么，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建立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的，只有符合各自国家根本利益的国际关系才能得到本国人民的广泛拥护，也才能持久。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国际间究竟应该重信义、原则，还是重国家利益？对这个问题，我想借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在叙述了著名的孟子与梁惠王义利之辩之后的一句评语：“唯仁者为知仁义之为利”。古人说的是治国之道，这里借用来说明在国与国的关系之中利益与道义原则从长远、宏观看，应该是一致的。道义就是指的国际关系中一些公认

的准则。每个国家都有维护自己利益的权利,但是以牺牲或侵犯他国利益来推进自己的野心,就会发生冲突,甚至战争。各国国力不同,往往强国凭借实力逼迫弱国服从自己的利益,这就是强权政治。所以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平等的。另外,一国的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并不总是正确,也导致对外政策的失误。自从有民族国家【脚注】本文提到的“民族国家”是泛指一般人常识中的独立国家,包括多民族国家。【注尾】以来,常因国家利益冲突而纷争不断,结果无论是强国或弱国的人民都身受其害。在长年的争斗与不断调整关系中,各国共同制定了一些维护世界秩序的国际准则,如国际法、联合国宪章,以及现在日益为世界各国所肯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就是国家利益和道义原则的汇合点。当然这些原则并不总是得到遵守,而且各国站在不同立场可以作不同的解释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但是终究在国际社会中已经有一些互相制约的公认的准则,完全靠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行事的时代已经过去。这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之一。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发展正符合这一进步潮流。

下面从四个主要方面剖析一下中美关系的发展基础和问题: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中美两国在历史上曾有过不平等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后又有过20多年的敌对关系。所以能有今天这样比较平等、友好、健康发展的关系,其重要的基础是《上海公报》中的一段话:

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与外交政策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国家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

这段话的意义十分重要。它有两方面的含义:1.贯彻平等和互相尊重的精神,反对强权政治;2.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和平共处,使国家关系超越意识形态。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敌对的状态,同时区别于历史上的不平等关系。显然,这是符合双方利益的。1979年的建交公报和1982年的“8.17”公报又重申了两国遵守这几项原则的立场。具体的表现最主要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到了撤军、断交、废约,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的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基本上结束了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割裂中国领土的历史。也在15年中美大使级谈判中一个僵持不下的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但是,如众所周知,在这个问题上仍有分歧,那就是美国紧接着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和继续售台武器。美国的理由是中国没有公开申明放弃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国的立场是,台湾问题既然是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就是中国人的事,外人无权过问,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的实质还是继续干涉中国内政。但是在实际上,中国也认为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并且几年来一直以和平统一为国策,进行了积极的努力,采取了种种有利于这一目标的措施。近一两年来大陆的改革日益深入,台湾岛内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台湾当局对大陆政策也有所松动,海峡两岸之间的来往有引人瞩目的发展。美国政府公开表示的态度是欢迎这种发展。这样,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和继续对台军售就日益缺乏借口。对美国说来似乎更多是满足某些政客的意识形态的需要,而不是实际的国家利益。对中国说来,只要《与台湾关系法》存在一天,美国售台武器还在继续,就不认为在中美关系中的这个问题上五项原则得到了彻底遵守。另外,美国政界和舆论界还有一股支持台湾分离的力量,还有相当能量,不时在中美关系中造成干扰的因素。目前在台湾问题上,双方利益的汇合点是维持岛内局势的稳定,向着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不过,中国强调的是和平统一,统一是大前提;美国则只强调和平,对统一问题始终态度暧昧。中国要求美国向

有利于中国和平统一的方向运用它实际存在的影响；美国表示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与美国无关；而另一方面，美国又通过诸如《与台湾关系法》等种种行动对台湾表示极大的关切，中国则认为这是美国进行了不应有的干涉。这始终是两国之间的一个困难问题。

坦率地说，对在两国关系中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远比美国重视。这是因为，（1）自近代以来，中国与列强的关系很少是平等的，几代中国人的流血奋斗就是为结束民族屈辱和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所倡导的，对于它的意义中国体会更深；（2）战后美国曾经干涉过中国的内争，后来又奉行过对中国孤立、封锁，并割裂中国的政策，中国认为在过去的中美关系中中国是受害的一方，而如上所述，有些问题至今尚未彻底解决；（3）两国目前国力悬殊，在经济、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客观上不可能对等，从而造成不平等感。

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二方面的含义，那就是尽管中美两国制度不同，政治文化以及立国的哲学理论不同，只要遵守这些原则就能友好相处。中国政府已经明确国家关系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中国领导人一再宣布，“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实践，我们坚持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决定亲疏、好恶”，（1）而且中国在对外关系实践中也的确是这样做。美国在与中国关系中基本上也是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而不强调意识形态。但是与中国相比，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成分仍然相当浓厚。美国的外交最终目标仍是在全世界推行美国的制度、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加以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在推行自己的利益时并不总是注意尊重别国的利益。例如，除了上述台湾问题外，以“人权”为名，在西藏问题，甚至计划生育等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等等。有些言行来自国会，不一定代表美国政府的官方政策，但是实际上美国国会作为“三权”中之一权，对外交政策有着不可否认的影响。特别是就损害美国在中国人民中的形象而言，不可能指望一般中国群众对美国政治作这样细致的分析。因此，这类事造成中美间不愉快的因素，既违背中国的利益，而中国人也看不出美国的利益需要这样做。这就是意识形态因素在两国关系中的消极作用。

现在国际上有一种理论，认为今天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人类共同的利益已经超过一国的利益，因此主权和国家利益应退居次要地位。诚然，在地球变得越来越小、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世界各地人民的命运更加紧密相连。诸如防止核战争、环境保护、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反对种族歧视等等，都是关系到全人类的利益，需要各国合力完成的共同事业。涉及这些问题，每一个国家都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但是除了这些共同问题外，在现阶段，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还是主要的，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的主要考虑，当然还是推进本国的利益，世界大同的理想境界远未到来。特别是在国家之间贫富强弱悬殊如此严重的情况下，抹煞民族利益实际上会导致强权政治。70年代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是一例。美国在对外政策思想中推行美国理想的“天命”论，也往往导致强加于人。所以，笔者仍然认为在今日世界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际关系中各民族国家的利益和人类的共同利益、道义理想和现实利益的最佳汇合点，也是中美关系有着强大生命力的基础。

二、中美关系国际背景的变化

战后40多年来，中美或为敌，或为友，都是在“冷战”的背景下产生的，因而苏联的因素起很重要的作用。毋庸讳言，17年前中美关系的突破，10年前中美建交，其中都有苏联的因素。当时苏联借美国在越战之后需要收缩之机加强军备，并在全世界扩张，咄咄逼人。中国领导人认为苏联是对和平最大的威胁，也是对自己安全最大的威胁；美国决策者认为中国是可以借以抗衡苏联的重要力量。卡特政府决定与中国建交，是政府中联华抗苏的主张占上风的结果。因此，建交初期，双方都强调战略关系。当时，双方对于对方与苏联的关系的变化都比较敏感。中国领导人曾对“绥靖主义”提出警告；而1982年中国开始

调整外交政策,强调独立自主,并且同苏联关系有某些松动时,美国政府对此抱有很大疑虑,美国政界出现一种论调,怀疑中美关系的价值,一些一贯反华的政客乘机攻击美国政府发展对华关系的政策。

但是进入80年代后期,这一国际背景发生很大变化,最主要的是两个超级大国各自的处境和相互关系的变化。更为突出的是苏联自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宣布进行改革,对苏联自十月革命以来70年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全面反思,提出“新思维”。苏联国内问题非本文讨论范围。重要的是,苏联要致力于如此深刻的内部改革,难以同时负担昂贵的军备竞赛和军事扩张,必须调整和收缩对外的战线。现在已经看到的除了对国际关系的理论上一系列新的提法外,在行动上苏联开始从阿富汗撤军,而且国内舆论公开批评当初侵阿错误;同美国达成中导协议,第一次同意核查;在对待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承认各国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等等。

美国没有发生苏联这样令人瞩目的变化。但是美苏之所以能够达成中导协议,也是出自美国本身的需要。美国的经济也遇到相当严重的困难,对于沉重的军备竞赛的承受力决不是无限的。最重要的是世界力量中心正在分散,美国发现自己左右世界事务的力量已今非昔比。与里根上台伊始对苏联的咄咄逼人的强硬姿态相比,第二届里根政府已经转而致力于同苏联谋求缓和,而且自1985年以来已实现了四次美苏首脑会晤。

中苏关系的发展没有美苏关系走得那么远。不过中苏关系中的三大障碍开始有希望逐步消除。如果印支问题进一步得到解决,苏联能更进一步发挥影响,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中苏之间的关系可望进一步改善。

并不是说,美苏之间的对抗已经不存在了;笔者也不同意世界已经实现“多极”之说。因为尽管影响国际局势的力量正在分散,但是美苏之外的其他力量还没有能成为一“极”的;美苏两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没有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可以取代。但是无论如何,中美建交的“冷战”背景已经发生极大变化,整个世界局势正在趋向缓和,单纯从中美苏三角关系来考虑两国关系已经不符合变化了的现实。事实上,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十年来,客观上中美关系的基础逐步向多面化扩大;两国决策者从主观上也日益认识到这样对两国有利。这不仅仅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且从根本上来讲,中美两大国之间本来有建立良好关系的多种理由。在和平时期,单纯以对付第三者的共同威胁为基础的关系是不能持久的。现在,中国领导人对美苏关于裁减核武器的谈判和协议不但不批判而且表示欢迎,对美苏关系的缓和也处之泰然。美国政府发言人也公开表示,在三大障碍消除的前提下,中苏关系的改善有利于世界和平和稳定。这样一种理解正是中美关系健康和稳定的表现。

当然,国际背景中不仅仅是美苏关系问题。美国是超级大国,在它的观念中,全球各地所发生的问题常与其战略利益有关。中国自认为属于第三世界,与美国处境不同。中国的对外政策也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与美国的战略相配合。特别是对某些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对美国的政策常常持批评态度。这是国家关系中的正常现象。但是,维护世界和平,在热点地区尽量争取局势缓和,始终是双方的共同要求。特别是在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促进该地区的繁荣方面,中美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余地。重要的是要弄清双方根本利益所在,尽量发展共同点,妥善处理分歧,不使它发展成为不可调和的冲突。国际局势变化多端,双方如能本着这一原则处理两国关系,就能使它较少波动而更加稳定。这也正是10年来中美关系发展的总趋势。

不言而喻,中美关系决不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被动的因素。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及10年来的积极发展对于今天的国际局势缓和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中美之间关系如何,其意义不同于一般的双边关系,这是两国的地位和分量所决定的,尽管中国不是超级大国而且并不富强。因此,在考察和处理中美之间的问题时,除了各自的国家利益之外,对整个国际局势的影响也必须考虑在内。

三、中国的改革、现代化与中美关系

今天中国所执行的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改革开放政策一般从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一周之后，中美建交，所以中国改革的进程与中美关系的发展几乎是同步前进。这不仅是时间上的巧合，而且二者之间确有一定的联带关系。

诚然，中国为现代化而奋斗非自今日始。结束贫穷、落后状态，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新中国，以平等的一员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以说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无数仁人志士在漫长的岁月中进行了前仆后继的努力和探索，也作出了可贵的牺牲和贡献，但是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原因，中华民族几经磨难，至今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不过今天比起以往，又有着新的奋斗基础：

1. 中华民族作为整体，从曲折的历史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可以说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的目标成为举国上下一致的全民共识。

2. 过去，中国的大门为列强的炮舰所打开，后来又有过被迫的和自愿的闭关锁国的经历。今天则是完全自觉自愿地打开大门。这十年来，中国人对世界事务的了解飞速增长，参与国际交流的阶层空前广泛。为克服闭塞、无知、孤陋寡闻的状况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今天的中国人对现代化的含义了解得更为切实、具体，追求也更为强烈。

3. 有一个基本稳定，并以组织全体人民实行现代化为坚定不移的目标的政府。它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中心考虑，就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前提下，如何有利于建设现代化的中国。

所以，实现现代化是全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这就是当前中国的现实。

另一个现实是，一般说来，多数中国人在想到现代化时，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想到美国。不论是抽象地还是具体地，也不论对美国的想法是否符合实际情况，相当广泛阶层的人士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把美国当作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美国高度发达的科技、教育、文化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是中国可以吸收和借助的对象；尽管美国与中国国情极为不同，发展道路、社会制度、文化背景都相差甚远，但是这一切对当前的中国人都有吸引力，对美国的探索和研究方兴未艾。

在美国方面，促进中国现代化符合美国的利益，似乎也是绝大多数朝野有关人士的看法。这是因为：

1. 早在珍珠港事变之后，美国就认定在西太平洋的长远利益在于有一个既稳定、繁荣而又与美国友好的中国。这两方面缺一不可。在40年代末，国民党政权虽然亲美，却过于软弱，无力统一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稳定而日益强大，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与美国处于敌对状态。现在，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对美国说来，中国具备了这两个方面的条件。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同美国没有利害冲突；中国不是超级大国，没有扩张野心；在中国与美国关系友好的前提下，中国越是发展、强大，则美国在这一地区越无后顾之忧；中国向现代化方向发展是历史潮流，美国在这过程中起的作用越大，同中国的良好关系也越稳固，同时也越有利于美国在正在蓬勃发展的亚太地区发挥其影响。

2. 中国的改革方向是朝着经济上加强市场作用，政治上民主化，思想上打破教条束缚，全面开放的方向发展。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之一是鼓励世界各地向这一方向的发展。作为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当前的改革对美国更有特殊意义。

3. 在政治关系正常化之后，经济关系的地位就日益重要。中国经济同美国互补性大于竞争性。中国即使进一步发展，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大可能在国际市场上成为美国的劲敌，而相反，中国目前还只是潜在的巨大的市场将会有更大的吸引力。同时，如果改革比较成功，目前中国存在的种种弊病将有所克服，从而减少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的中国方面的障碍，中

美经济关系也将能更加顺利地发展。

基于上述理由,当美国政府和政界人士一再表示美国乐于见到中国实现现代化,一个现代化的对美国友好的中国有利于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时,不是外交辞令,而是出于美国本身利益的考虑。

当然,目前美国支持中国现代化有一定限度。这里有美国的政策、制度等原因,也有客观能力的限制。在中国看来,最主要的,不应有的障碍是“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对中国的技术转让的限制仍然没有完全消除。在具体问题上发生摩擦时,技术转让常常被用来作为一种施加压力的杠杆。在中国出口武器问题上,甚至在中国的内政如计划生育等问题上都发生过与技术转让相联系的做法。另外,在国际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中国作为后来者,客观条件相对不利,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更加损害中国本来可以有的机会;从长远看,也未必对美国有利。当然,还有一个限制因素是,美国自己的经济地位已经下降,已经不具备战后初期那种可以运用裕如为政策服务的经济力量。

所有因素中最重要,的还是美国对中国改革的估计。中国的改革进行到现阶段,遇到了比前一阶段复杂得多的问题,正进入最困难的时期,暂时受挫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美国的决策者对此如何估计,作出什么反应,必然影响对华政策。美国投资者和商人更加敏感,因此而使中美经济关系出现波折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总之,围绕着中国的现代化,中美关系有共同的利益,因而有很大的发展余地;同时也存在种种限制。归根结底,中国现代化要靠自己的努力和改革成功,这方面成效越大,同美国的合作基础也越宽,否则反是。在这种合作中双方都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因而是互利关系。中国人如果以为可以主要依赖美国或任何外国实现现代化,是完全错误的;美国人如果以为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完全是一种利他主义的慷慨行为,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四、文化交流

【脚注】这里文化交流是广义的,包括学术、思想、教育、科技、文艺、出版等各个方面、各种形式的交流。【注尾】

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文化关系往往被忽视,实际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中美文化交流是一个值得作为专题研究的课题。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尽述。这里只从本文的题目——两国利益的角度来加以评论。

1978年10月,也就是中美建交前夕,两国签订了《科技合作协议书》,这是中断了30年的中美文化交流之后第一个正式协议书。从那时起在各个学术领域中以及各大学和学术机构之间签订的交流协议已经难以统计完全,两国的文化学术交流以惊人的速度蓬勃发展。单就中国派往美国的学者和留学生一项,根据“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发表的数字,从1979至1987年,已有56000名;(2)已经可以预计,1979至1989年的十年中,总数将超过1860至1950年将近一个世纪的数字。(3)美国派往中国的学者和学生虽然远少于中国留美学生的绝对数字,但是已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当然,文化交流决不仅是互派留学生而已。各种层次,各种职业的人员互访;书刊、资料的互译互通;文学、艺术的介绍,以及其他有形无形的信息交流,其深度和广度都是十年以前难以想像,也是近百年来中美交流史上所未有的。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对两国各自的利益以及两国关系意味着什么?还存在什么问题?

从中国方面说,似乎比较明显。一言以蔽之曰: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中国首先关心的是向美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济管理的知识;借助美国发达的高等教育和开放的教育制度培养各方面的人才;探讨美国发达的原因和建设经验以作借鉴;了解美国的制度、国情以

便正确制定对美国政策，恰当地解决两国关系中的问题。另外，还有利用美国的资金协助加强和发展一些教育、学术活动和机构，等等。这些都是有形的。而无形的影响可能比有形的更为深远。同美国的交往，使长期闭塞的中国人打开眼界，接触到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了解另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特别是在知识界引起的震动是极为强烈的。这当然不仅是美国一国引起的，而是整个西方文化冲击的结果，不过由于美国的实力雄厚和积极的对外文化宣传政策，在这方面美国的影响自然是独占鳌头。这十年来中国翻译的大量书刊中美国的占第一位，并遥遥领先；中国在外国留学生有一半以上在美国，就是证明。

那么这种文化交流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呢？由于两国经济力量悬殊，文化交往的资助大多来自美方，在美国人中间存在着一种看法，似乎是中国单方得利，有人认为中国人期待美国“行善”。(4) 果真如此，这是不可能持久的。事实上，美国积极推进对外文化教育事业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已成为美国对外关系中一大特色，显然美国决策者认为这是符合美国长远利益的。

中美之间最早的大规模的文化教育关系是众所周知的庚款“退款办学”。当年“义和团”运动所表现出来的“仇外”情绪使西方人震惊，八国联军侵华更激起中国人民强烈的反帝情绪，还有美国排华运动和清廷与美交涉的失败引起中国人抵制美货的斗争。美国希望改变自己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把自己同其他列强区别开来，便于争夺中国市场。当时这一主张倡导者之一，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Edmund James)在1906年给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一封备忘录中说：“哪一个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文明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5)

半个多世纪之后中美在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又恢复了文化教育关系，而且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发展着。但是美国所追求的目标精神基本方向没有变。在1979年5—6月间美国众议院科技委员会“科学、研究、技术”小组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科技政策办公室副主任本杰明·胡伯曼与“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路易思·布朗斯孔姆列举美国同中国交流对美国的“动机”如下：

1. 在某些领域内获得科学成果。
2. 与年轻一代中国科学家与工程师建立重要联系，他们很可能在未来的领导层中占很大部分。
3. 使美国能在日益扩大的商品市场中有更强的竞争力。
4. 促进中国农业发展并帮助中国矿产和能源的发展与出口。
5. 对发展一个“强大、安全和和平的中国”作出贡献。
6. 通过美国社会科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在中国的研究工作提供对中国社会、政治与政府更好的了解。
7. 通过让中国学者接触美国以改进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了解。
8. 使那些为了发展经济而求诸西方思想的人能得到美国的技术，例如管理学。
9. 研究中国农村发展的某些方面是否能适用于发展中世界的其他地区。
10. 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人员和机构的联系网，并建立许多继续进行的项目，俾使朝着关系更加密切的方向发展的潮流难以逆转。(6)

以上10点概括了从美国角度看中美文化交流的好处。比之庚款时期提法略异但实质精神是一致的，而且大大地发展了。美国政治家和科学家都认为，在成千上万中国青年思想成型的过程中接受美国的基本价值标准之一：“个人通过科学研究追求真理的自由”，是有重大意义的。还有人指出，如果在各个负责岗位的中国人许多是在苏联或日本受的教育，而与美国没有联系，那美国会多么吃亏！(7)

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访问中国，走到北京的王府井，望着摩肩接踵的人群，忽发感想说，如果这样众多的中国人都反美，太不堪设想，美国无论如何应致力

于防止发生这样的情况。

不论这个故事是否真实,在十亿中国人中间,特别是其中的精英阶层中间,美国的形象如何,美国是不能无动于衷的。

这又联系到一个经常困扰中国人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美国在中国培养“亲美派”?过去,这曾经被认为是美国居心叵测的表现,似乎凡“亲美”者必然要反对本国人民,本国利益,于是美国的积极外向的文化宣传政策就被认为是“文化侵略”。这是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1. 在过去,中华民族长年处于民族屈辱,广大人民处于苦难之中的时候,中国的民族利益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在华利益有很大矛盾。当时受到西方教育的,或者与外国企业机构关系比较密切的人中间有少数人脱离本国人民,甚至轻视本国人民,处处站在外国立场做出维护外国利益,损害本国利益之事。更严重的是,如果处于重要的决策地位,却受制于外国,自觉或被迫执行外国政府所需要的政策而不顾本国利益,这当然为本国人所唾弃。中国过去有所谓“国贼”“洋奴”或“高等华人”之讥,即由此而来。而外国有关当局则致力于培养忠于自己利益的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受外国影响面越大,往往对本民族不利,“文化侵略”之说有一定根据。

但是,文化本身并无敌友之分。文化上接受美国教育熏陶是一回事,维护民族利益与否又是另一回事。就以庚款培养的大批知识分子为例,他们是西方现代科学文化在中国的得力的传播者,他们中间许多人学习并欣赏美国的政治、社会制度。但是在40年代后期,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时,这些教授中多数都支持或参加了反美学生运动;美国出资在华办的一些学校的学生成为这些学生运动的骨干力量。由于美国驻华外交官说了中国学生受教育是美国的“恩惠”这样的话,引起清华大学教职员拒领美国救济面粉事件。所以在民族利益发生尖锐冲突时对于多数受美国教育的知识分子说来,民族立场始终是第一位的。

2.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敌视中国政府。艾奇逊说“寄希望于中国民主个人主义东山再起”;杜勒斯说“共产主义”统治在中国是“暂时现象”,都只能被解释为意在推翻和颠覆现政府。另外,在“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外文化宣传成为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当中如果有人“亲美”,当然就与爱国相悖。因此当时中国政府对美国“文化渗透”进行谴责和批判。不过,许多本来很爱国的受过西方教育,特别是美国教育的知识分子受到怀疑和迫害则是全然错误的。与此相对应的是在美国麦卡锡主义时期,大批了解中国国情的学者和外交官,从美国利益出发,主张美国采取现实的对华政策,也被怀疑为“亲共”,受到“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调查和迫害。这样的悲剧应该一去不复返。

3. 在正常情况下,各国文化只要有交流,就必然互相渗透,互相丰富。人类的共同文明因此得而发展。而且,一个国家的对外文化政策当然是以争取别国人民对自己有好感为目的,这不但无可非议,而且有助于消除人民之间的隔阂与偏见,有利于促进两国关系。在这里人民之间的友谊正好与国家的利益汇合在一起。自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基本上可以纳入这一格局。

不过,在新的形势下,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例如,在相当多的中国人中间对美国有一种盲目崇拜,以为美国遍地黄金唾手可得。有的青年人痛感中国民主改革的迫切需要,处处以美国的制度为蓝本,提出激烈而不切合中国实际的要求;这些情况又引起当政者对人心动荡的担心,从而对与美国文化交流产生疑虑;另一方面,有人面对当前民族文化的不景气担心失去中国的民族特质,因而对西方文化持怀疑和抵制态度。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目前无可讳言地在文化、经济上与美国差距太大,在相互交流中很难吞吐自如。特别是中国过去有着这样历史悠久的光辉灿烂的文化,现在普遍教育水平又如此低;过去长期闭关锁国,思想禁锢,现在一旦开放,面对汹涌而来的外来文化冲击,产生种种矛盾摩擦和不平衡的心理状态,恐怕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在全民族的教育文化水平提高,重新树立民族自信心,解

决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问题，才能逐步取得心理平衡，也才能在吸收外来的营养中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这些都是中国本身的问题，非外来文化之过，重新关闭是没有出路的。当然，在美国方面也还存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以及“美国中心”的心态。

还有一个困难问题是人才流向问题。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最新主持出版的《中国留美学生》一书中差不多用了一半篇幅讨论这个问题，足见这个问题已引起美方重视。美国发展强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善于吸收各国人才为己所用。这固然有美国的雄厚财力为其后盾，更重要的是美国特别优越的文化环境和积极的文化政策。十年来，中国向美国输送了大批留学生和学者。除少数由中国政府资助外，多数是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美方资助，或半工半读，或在美国各种学术以及企业机构工作。表面上是美方出钱为中国培养人才，而实际上大批优秀人才在美国学习或工作，对提高美国大学和学术机构的水平起了积极的作用。在美国各种单位就业或半就业的中国人总的说来都表现出色。因此有人说，在某种意义上等于中国为滞留在美国的一部分优秀人才支付了中小学教育费用。美国方面对大批外国学生涌向美国的现象对美国的得失有所争论，去年《华盛顿邮报》发表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两位学者的文章，总的认为外国学生对美国作出了宝贵贡献，如果外国学生一旦停止要求进入美国大学，对美国将是重大损失。(8)

对中国说来，自然就是人才外流，这也是中国政府及一些单位的领导为之烦恼的问题。美国之所得，暂时成为中国之所失。更为严重的是目前尚在国内各种岗位上工作的各种人才也不安心工作，纷纷谋求出国，而最容易得到机会的还是美国。中国在这样一种现象中究竟得失如何，似乎成了问题。不过这与其说是中美之间的问题，毋宁说是中国本身的问题。人才为谁所用，主要要看中国是否能创造一种能发挥各种人才的作用的环境和可以过得去的接近公平的待遇。不利于中国建设的人才流向只有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经济的发展和人才政策的合理化，才能逐步好转。如果解决得好，大批优秀人才将在更大范围内对中国现代化起到远比庚款所培养的前辈们更为深远的作用。这个问题同前一个一样，靠重新关门是无论如何不可取，也办不到的。中国教委负责人和中国领导人一再发表谈话，表示中国将不改变向国外派留学生的总的政策，说明这也是中国政府的认识。

本文主要谈中美关系中双方利益的汇合。但是这里还必须指出，文化交流除了涉及两国利益之外，还有其超乎国家利益的本身的价值。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文化体系目前正在面向世界的过程中向现代化蜕变，与美国这样一个年轻的，脱胎于欧洲，而又自成体系的西方文化之间，在历史上第一次有机会这样全面深入地，无拘束地相互认识，相互探索，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是应该占有重要的一页的。一部分中国学者已经或正在意识到这一点。在这方面，双方发展趋势似乎不平衡，在中国的美国学正在向纵深发展，而据笔者从一些研究中国的专家学者处了解，近年来，美国研究中国的人数和经费正在减少。与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以及正常化初期相比，“中国热”正在减退。若干年后，一批优秀的中国学专家有后继无人之虞。还有一种现象，在一些著名大学的中国学系中，在校的学生或研究生大半都是中国留学生！即使这些中国学生毕业后留下来充实美国各研究和教学岗位，也代替不了美国人本身对中国的了解和研究。据说这种现象之出现是因为两国关系已趋稳定，问题较少，似乎不需要给予太多注意。这显然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态度。其实，总的说来美国人对中国的探索 and 了解刚刚开始，过去长期存在的偏见，一些简单程式化的标准和仓促的结论，都是进行深入了解的障碍。即使是在近期也还是妨碍两国关系的一个因素，遑论更深远的影响。本来，美国能够兼容并蓄各民族的文化，是迄今为止美国的优势。但是这种短视的，缺乏耐心的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又会使美国失去这种优势。从长远来看，也将影响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势头。作为一个研究美国的学者，我借此中美建交十周年之际，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以供将来与美国同行们作进一步探讨。

瞻望将来,中美之间有广阔的利益汇合区,因此有足够的理由期待两国关系稳定而健康地前进。但是也存在不少困难,要靠双方有识之士共同努力来促进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从长远看,两国人民互相深入了解还有许多工作可做,这也是我们以学术讨论会来纪念中美建交十周年的宗旨所在。

注释:

(1) 1985年赵紫阳总理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表的演讲(《人民日报》1985年6月7日)。

(2) 里奥·奥林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政策、问题与数字》(Leo A. Orleans,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Policies, Issues, and Numbers, for CSCPRC*, Washington, 1988), 第9页。

(3) 大卫·兰普顿等:《恢复了的关系:美中教育交流中的趋势,1978—1984》(David Lampton, *A Relationship Restored—Trends in U.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s, 1978—1984*), 第2页。

(4) 沈大伟:《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美国的互相矛盾的形象》,威尔逊中心亚洲部论文集第32卷(David Shambaugh, *Conflicting Chinese Images of America Dur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lson Center Asia Program Occasional Paper, No.32), 第23页。

(5) 明恩溥:《今日中国与美国》(Arthur. H. Smith, *China and America Today*, New York, 1907), 第214页。

(6) 转引自拉夫·克劳:《美中交流计划评述》(美国新闻署调查报告,1981年2月), (Ralph N. Clough, *A Review of the U.S.—China Exchange Program*, Research Report USICA, Feb. 23, 1981), 第7页。

(7) 同上,第61页。

(8) 《华盛顿邮报》,1987年11月15日。

美国国会与中美建交十年

张毅

如果要开会讨论中国与除去美国以外的其他一个国家的关系,大概不会有一篇论文专门谈这个国家的议会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即使有,它也是一个比较偏的题目。然而,倘若是中美关系,专门探讨国会的作用就不仅不偏,而且非常必要。这是因为,第一,美国实行三权分立,国会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发言权之大,其他国家议会远远不及。第二,比起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国会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尤其重大。历史上有的时候(比如19世纪末的排华运动和本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时期),国会“甚至控制了对华政策的制定”。(1)时至今日,国会仍是公认的美国对华决策的重要参与者。

既然如此,在中美建交以来的十年间,国会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到底持什么态度,起了什

么样的作用，而且原因何在呢？这就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材 料

对十年来国会在中美关系上的所做所为，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讨论。本文拟从分析一些关于国会活动的第一手材料入手。考虑到需要，也考虑到在中国查询美国资料的实际条件，本文选择了以下几种材料。

第一种是《国会记录》(Congressional Record)，由美国政府编辑出版，内容包括议员在参众两院大会上的口头和书面的发言及投票情况，是关于国会工作的最全面的原始材料。

第二种是国会委员会的材料，包括1979年至1986年间的20次听证会的记录，6篇委员会报告和6次研讨会的记录。

第三种是1979—1987年间国会季刊公司出版的《国会季刊年鉴》(Congressional Quarterly Almanac)和《国会季刊周报》(Congressional Quarterly's Weekly Report)。这两本刊物含有大量的第一手和第二手材料，可靠性很高。

第四种是1979年至今的《人民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它在反映中国对待中美关系的看法与政策上当然具有独特的权威性。

最后一种是1979—1986年间台湾“中央研究院美国文化研究所中美关系报告编辑小组”主编的《中美关系报告》。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台湾当局如何看待中美关系对研究这个课题无疑有重要参考价值。

除了上述第一手材料外，本文还参阅了其他一些书籍、文章、报告等第二手材料，在此不一一列出。

结 果

分析总结本文的材料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果。

第一，对于中美建交，国会议员中持完全反对态度的人很少，但大多数议员认为卡特总统对中国让步过多，不必要地牺牲了台湾的利益。他们强调要使美中关系和美台关系达成“平衡”，这种主张有强烈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色彩。

中美建交的消息传到国会，虽然很少人为此欢呼雀跃，但完全反对者也寥寥无几。共和党参议员多尔指出：“我认为可以这样讲，我知道的同事当中没有很多人反对正常化。”(2)在大多数议员看来，中美建交“意义重大”，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他们认为，美国“在过于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正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控制大陆和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这一现实”，(3)正常化则接受了这个“亚洲事务中早该接受的主要现实”。(4)

甚至像戈德华特这样的长期反华反共的极端保守分子也认为中美建交是大势所趋。他承认：“就我个人来讲，我希望看到台湾保持原状，但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知道那已不可能了。”(5)

表1和表2分别列出参院和众院对《与台湾关系法》和其他有关修正案 的表决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国会总的来讲还是支持中美建交的。

尽管如此，很多国会议员还是对卡特的建交决定深感不满。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他们认为卡特没有把国会放在眼里，事先同国会磋商不够，虽然国会几个月前通过的多尔—斯通修正案明确要求总统进行事先磋商。其次，他们感到美国吃了亏，因为中国在建交过程中“一步未让”，美国则一味妥协，完全接受了中国的条件。众议员丹尼迈尔在众院发言中指出：“令我及其他许多议员感到不安的是，我们的政府对北京政府作了这么多的让步，所得到的却这么少。”(6)

表1 参议院讨论《与台湾关系法》及有关修正案时的表决情况

提案人	内容	表决情况	
		支持	反对
多尔	把与“台湾人民”的非官方关系改成与“台湾”	33	62
格伦	搁置(即否决)汉弗莱提出的要通过政府“联络处”来处理与台湾关系的修正案	57	38
珀西	宣布对台的敌对行动是对“美国安全利益”的威胁	42	50
拜登	搁置(即否决)多尔提出的要求由参院来批准美在台协会主任的任命的修正案	54	38
丘奇	搁置(即否决)汉弗莱提出的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只有当总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不进攻台湾的书面保证时,《与台湾关系法》才能生效	74	21
	《与台湾关系法》	90	6

资料来源:C Q Almanac, 1979.

国会认为美国让步过多主要是指台湾而言的。作为中美建交的条件,美国同意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撤走部队并废除《美台防御条约》。很多议员认为这是把台湾这个美国的“老盟友”“出卖了”。在他们看来,承认中国并不一定要以断绝与台湾的关系为代价。换句话说,美国可以同时承认“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丹尼迈尔批评卡特政府的政策自相矛盾,一方面承认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统治的现实,另一方面又完全拒绝承认“在台湾已经存在了30多年的有效率、生产发达和管理良好的国家”这一现实。(7)众议员拉哥马西诺更是毫不掩饰地说:“亚洲的现实是有两个中国,而美国坚持认为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值得承认的立场是荒谬的。”(8)

其他一些议员虽然在名义上不主张实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但在实质上却十分希望保持“一中一台”的现状。参议员肯尼迪一方面支持中美关系正常化,另一方面又强调美台之间的联系“不应受到破坏,因为在实质上它应依旧如故,尽管在形式上它有了一些变化。”(9)参议员格伦多次强调要在美国与中国关系和美国与台湾关系之间维持“平衡”,认为这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10)说穿了,这种“平衡”就是要搞“一中一台”。

表2 众议院讨论《与台湾关系法》及#C 有关修正案时的表决情况

提案人	内容	表决情况	
		支持	反对
克莱默	保留1955年《美台防御条约》的内容	149	221
拉哥马西诺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进攻台湾,美国将考虑撤销对它的承认	169	197
奎尔	要建立政府“联络处”来处理与台湾的关系	172	181
阿什布鲁克	把美国在台协会工作人员定为政府雇员	171	239
爱德华兹	把金门、马祖包括在台湾内	146	256
所罗门	同台湾建立领事级关系	179	225
包门	搁置(即否决)《与台湾关系法》	110	295
阿什布鲁克	对美在台协会的拨款必须经过国会授权	226	174
	《与台湾关系法》	345	55

资料来源:C Q Almanac, 1979.

第二,总的来讲,在过去的十年中,作为美国政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会对推进中美关系的发展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

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两国的关系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这些进展是双方努力的结果,就美国方面而言,也包括国会的努力。这一点可以从国会几项重大的立

法行动中表现出来。

1979年,中美两国政府签署了一项贸易协定,其中规定废除美国对中国的歧视,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美国对待“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政策是,除非它允许其公民自由出境并不对出境征收过高的税,否则不能得到贸易最惠国待遇。总统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放弃这些条件,但须得到国会批准。卡特总统向国会提交《中美贸易协定》时说明他准备放弃这些条件。尽管其他“共产党国家”很少享有这种待遇,国会还是以绝对多数批准了《中美贸易协定》,而且自那以后年年都同意延长给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

1980年,国会还通过法律允许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是美国政府的一个机构,职责是为美国在海外的投资提供保险。按照美国《1961年外援法》的规定,它不得为在中国投资的美国人提供保险,理由是中国属于“共产党国家”。1980年8月,众议院以328票对55票、参院则以呼声表决修改了这一法律。

1985年9月,里根政府通知国会,美国准备第一次向中国出售军事设备,价值9800万美元。根据美国武器出口管制规定,国会在接到通知的30天内有权通过联合决议阻止成交。当时国会有少数极右派议员企图阻挠向中国出售军事设备,但未能得逞。1986年4月,里根总统再次通知国会将向中国出售价值5.5亿美元的电子设备,用以改进中国战斗机的雷达电子系统。参议员赫尔姆斯提出第331号联合决议案,主张取消这次军售。但是,当参院外委会对此议案表决时,除了赫尔姆斯本人赞成及另一名议员未表态外,其余14名参议员全都投了反对票。

1985年签订的中美核能协议是中美建交十年当中两国关系发展的又一件大事。美国是一个核大国,对于核不扩散非常重视。它的法律规定,对于类似中美核能协议的文件,国会在90天内有权以联合决议的方式加以否决。里根政府把中美核能协议提交给国会审议后,一部分自由派民主党人和保守派共和党人提了许多反对意见(前者主要担心核扩散,后者则完全出于反共反华的目的),要求对协议大加修改。但是,在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的努力下(洛德大使还专门从北京给一些议员打电话做说服工作),国会还是基本未动地批准了中美核能协议。

当然,美国国会在过去十年间也通过了一些有碍于两国关系发展的法律,比如《与台湾关系法》以及授权总统停止向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拨款的法律。但是,两相比较,国会十年来有关中美关系的立法总的来讲还是推动了两国关系朝前发展。

第三,在一定意义上,国会对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不如美国政府行政部门积极,但在维护美台关系方面却比行政部门更热心。当然,在更高一个层次上,国会与行政部门的对华政策是一致的。

1979年美国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后,卡特总统向国会提交了一个《与台湾关系法》的草案,作为今后指导美台关系的准则。这个草案遭到国会许多议员的抨击,认为它“用词含糊,意图不清”,远不足以维护台湾的利益。国会于是对草案作了很大的改动,目的都是为了加强美台之间的联系。以台湾的“防御安全”为例,国会补加的条款宣布,美国将“把针对台湾的任何非和平努力——包括抵制和禁运——看成是对西太平洋和平的威胁”,而且美国将“向台湾提供足够的防御性武器,使之保持充分自卫能力。”(11)

在经济贸易方面,国会也加上了一些明显亲台的条款,例如它规定美国在台湾的投资者得以继续享受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援助,尽管台湾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该公司规定的标准。为了确保台湾的利益不受到“侵犯”,国会还承担起“监督”行政部门执行《与台湾关系法》的职责。

《与台湾关系法》通过之后,在对该法的解释和执行方面,国会也同样以台湾的“保护人”自居,采取了较行政部门更加亲台的立场。1980年4月,参院外委会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派遣工作人员访问台湾,实地考察《与台湾关系法》的执行情况。根据调查

写成的报告批评行政部门执行《与台湾关系法》不力,在售台武器等一些问题上违背了该法的“精神和文字”。报告指出,行政部门对法律规定的“非官方关系”下了过于狭窄的定义,“实际上,行政部门有时似乎是在贯彻它起草的《与台湾关系法》草案,而不是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12〕

1980年5月,参院外委会东亚和太平洋小组委员会就《与台湾关系法》通过一年后的情况举行听证会。该小组委员会主席格伦在会上再次指责行政部门偏向大陆:“到目前为止,行政部门似乎常常过分倒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边。这危及了我们与台湾的关系。我希望我们能对这种平衡加以微调,使今后有关各方对它都能满意。”〔13〕

国会与行政部门在对台态度上的一些不同,也可以从台湾方面得到印证。台湾“中央研究院美国文化研究所中美关系报告编辑小组”主编的《中美关系年度报告(1979—1980)》明确写道:“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屡有损害我国(指台湾,下同)的行动。比较而言,美国国会却常有支持我国的表示,他们监督《与台湾关系法》的执行,常常纠正行政部门的缺失,督促采取有利于我国的措施。”〔14〕“凡此种种,都显示美国国会较美国行政部门更能顾及我国的利益。”〔15〕

中国政府虽然没有明确这样说,但实际上它大概也认为国会在发展中美关系方面所起的消极作用要大于政府行政部门。从《人民日报》的报道评论和中国政府的官方声明来看,中国官方对国会时常提出或通过的一些涉及中国的决议案和修正案尤其反感,每每表示出极大的愤慨。1987年10月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就某些国会议员鼓吹西藏独立所发表的声明指出,少数国会议员在西藏问题上说三道四,“这是他们顽固坚持反华立场的又一次大暴露。他们的手伸得那么长,我们不禁要问:你们究竟要干什么?”〔16〕声明还指出:“两国议会理应为促进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作出积极努力。但令人遗憾的是,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国会少数人一再制造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挫伤中国人民民族感情的事件。这已成为损害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消极因素。”〔17〕

最后必须强调,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和国会在对华政策上的一些分歧只是程度上的。从根本上来讲,两者的方针是一致的,即一方面发展与中国大陆的多方面的关系,另一方面继续保持与台湾的紧密友好关系,使海峡两岸长期保持“一中一台”的现状。这不仅是美国政府行政与立法部门的一致政策,而且也是美国两党的一致政策。正如美国前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沃尔夫维茨所指出的:“我们处理与中国关系的根本态度在四届政府中得到了两党一致的支持。”〔18〕

第四,少数国会议员强烈反共反华,利用各种时机不遗余力地攻击中国大陆,赞美台湾。大多数议员平时对中国问题似乎并不十分关心,他们对中国或许有一般好感,但深度不够,很少站出来为中国说话。中国在国会山上可以依靠的朋友不多。

表3把近一些年《国会记录》中有关中国的、且带有明显倾向性的内容简单分成为正面和反面两类,从中可以看出,反面的(即攻击中国的)比例大大多于正面的(即称赞中国或主张发展中美关系的)比例。从反面的内容看,它主要集中在反对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和计划生育、西藏等与“人权”有关的问题上。从攻击者来看,他们虽然所造声势不小,但人数并不多。1979年,在总共91处对华攻击中,就有49处出自戈德华特、赫尔姆斯、阿什布鲁克、麦克唐纳等10名议员(不足议员总数的2%)。这一小部分议员可谓是铁杆的反共反华派,不愿错过任何有可能攻击一番中国的机会。

除了上述极右派议员之外,经常攻击中国的议员当中也包括一些自由派。应当承认,极右派议员和自由派议员在对华态度上是有一定区别的。前者反华死心塌地,在他们眼里,中国一无是处,中美两国不共戴天。后者则对中国有比较现实的认识,主张加强同中国的联系。但是,即使这些支持中美友好的自由派议员也常常在诸如“台湾前途”和“西藏独立”等问题上攻击中国,从而妨碍了中美关系的顺利发展。

相比之下,《国会记录》中赞扬中国的呼声要弱得多。表3所统计的正面内容主要包括两类。第一类认为中国是个潜在的大市场,主张发展中美之间的贸易往来。第二类是国会议员因其选民和中国发生关系(比如议员所在城市的交响乐团访华演出)而发表谈话或转登文章。前一类主张当然对中国有利,但更多的还是出自美国自身需要的考虑。至于后一类,与其说它主要是对中国表示友好,不如说是同自己的选民拉关系。国会中对中国抱有特别好感、能够比较无所顾忌地为中国说话的议员即使有,也是屈指可数。1980年,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罗伯特·伯德访华,回国后在《国会记录》上刊登了一篇比较热情洋溢地赞扬中国的文章,居然遭来了好几位议员的指责。

表3 近一些年国会议员在众院或参议院大会上赞扬或攻击中国情况的统计

时间	反面	正面	反面与正面比
1979	91	27	3.4:1
1980	52	18	2.9:1
1985	49	19	2.6:1
1986	28	7	4:1
1987	40	7	5.7:1
1988(1-6月)	21	5	4:1

资料来源:根据 Congressional Record 整理。

如果说少数议员对待中国大陆是极尽挑衅攻击之能事的话,那么他们对待台湾则完全是另一种态度。每年“双十”,他们会发表谈话向台湾表示祝贺;蒋介石出生100周年纪念,有几十名议员为他歌功颂德,称他是“当代民主中国之父”;⁽¹⁹⁾国际奥委会决定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马上有议员提出议案,要求总统采取措施,保证台湾不必换旗换歌就可继续留在奥委会中;甚至当有的议员就“高雄事件”批评台湾当局时,竟然还有其他议员出来为台湾当局打抱不平,说批评者是偏听了“一面之词”。凡此种种,说明台湾在国会山上确有一批人数不多但却靠得住的“铁哥们”。

分 析

美国国会十年来对华政策主张和态度上有上述特点的原因何在?政治学家在寻找国会议员言行(比如投票、声明等)的动机时,往往要从议员与选民关系的角度入手,看看他们是不是受选民的意愿所驱使。一般认为,国会议员是“一心一意的连选追求者”,⁽²⁰⁾他们最重视的事情莫过于连选连任。而要做到连选连任,就必须得到足够多的选民的支持。因此,总的来讲,如何谋求选民的支持,或者至少避免引起选民的反感,是决定议员言行的第一要素。

然而,就十年来中美关系这个具体问题而言,普通选民对议员的影响似乎不是决定性的。究其原因,首先,在和平时期,选民对外交问题远不如对内政问题关心,更何况中美关系还不属于美国外交问题中的头等大事。⁽²¹⁾再者,外交事务在美国一般被看成是总统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如果说选民对外交虽然不特别热心,但也不是不闻不问的话,那么这种低程度的关心也只影响他们对总统的选择,而不是国会议员的选择。

既然从选民这个角度难以解释国会议员的对华态度和政策主张,下一步就应该从议员本人身上找原因。查阅十年来有关国会与中美关系的材料,一个总的印象是,决定国会议员对华看法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议员的意识形态信仰,其二是议员的现实主义感。这两个因素之间有一定的矛盾,国会的对华政策就是这一对矛盾之间相互影响作用和较量妥协的产物。

简单地讲,国会议员的意识形态信仰就是他们根深蒂固的反共信仰。这种反共意识不仅

是中美关系曾经隔绝30年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也是建交以来始终妨碍两国关系有更快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国会议员的反共信仰与其对华态度和政策主张是密切相关的。首先,反华最卖力的少数议员都是坚决反共的极右派,他们处处找中国麻烦的原因只有一个,即中国是“红色的”“共产党国家”。中美建交,他们指责是“出卖了台湾,换来了一个血腥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22)中国加入国际金融组织,他们惊呼中国将“吸干西方资金的血”;(23)卡特政府邀请耿飚参观美军事设施,他们声明反对,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绝不是美国或美国利益的真正朋友或盟友”;(24)当美国考虑是否向中国出售武器时,他们要附加的条件之一是中国不能“危及”它的“非共产主义”邻国。(25)至于中国是否会“危及”其“共产主义”邻国,这些顽固不化的反共派是不屑操心的。

其次,少数议员强烈偏向台湾也是他们的反共信仰使然。众议员波特访问台湾回美后发表谈话明确指出:“在我访问期间,我了解到我们之间的联系牢固是因为相同的价值观。是的,两个社会都反对共产主义。”(26)众议员克雷恩甚至认为:“只要有台湾……就永远会有美国,因为台湾是全世界抵制邪恶的致命的国际共产主义的最前哨。”(27)

最后,大多数议员对中国抱有一定好感,但缺乏亲切感和信任感,这同样也是他们的反共思想在作怪。1985年国会讨论中美核能协议时,曾经力促卡特与中国建交、称中美建交是“通向世界和平的积极步骤”的自由派参议员克兰斯顿直言不讳地指出:“在没有足够的保护美国安全利益措施的情况下,我拒绝同意向一个共产党国家出售核技术。”(28)在西藏问题上,国会议员对中国的不信任表现得尤其充分。尽管中国政府和报刊提供了大量有关西藏历史、现状以及1987年的骚乱的事实材料,尽管连美国政府行政部门都承认中国提供的数据比较接近事实,但国会的议员却偏偏置若罔闻,而对西藏独立分子攻击中国的言论则百听百信,并据此提出和通过了所谓“关于西藏人权”的决议案。参议员普罗克西迈尔时常提醒他的同事:“我们不应忘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共产党国家。”(29)从国会议员的言行来看,普氏的提醒实在多余——他的同事当中谁也没有忘记。

正如《华盛顿邮报》最近在一篇社论中所说的,“反对共产主义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30)但是,反共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决定美国外交的唯一因素(否则中美至今仍会处在冷战状态之中),另一重要因素是现实主义精神。所谓现实主义精神,就是意识到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不能总以美国的意志为转移,意识到为了自身的利益乃至人类的生存美国必须而且能够和与自己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和平相处(live and let live),发展关系。正是基于这种现实主义精神,尼克松总统才决定放弃了对中国视而不见的鸵鸟政策,同中国建立了关系,尽管他曾经认为“对自由或和平损害最大的事情便是承认共产党中国”。(31)正是基于这种现实主义精神,“新政”以来最保守的总统里根上台之后不仅没有像他在竞选中所允诺的那样与台湾“恢复官方关系”,反而还在许多方面加强了与中国的联系。也正是基于这种现实主义精神,国会大多数议员才对中美建交和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持基本肯定的态度。

从迄今为止国会议员的言论观点来看,他们对华政策上的现实主义感集中体现在以下两点认识上。第一,中美两国在一定程度上有相同或并行不悖的战略利益,发展中美关系对美有利。1980年7月,参院多数党领袖伯德访华归来在参院发表讲话说:“美国与中国之间显然有趋同的战略利益,对当前重要的世界事务有相同看法。”(32)1980年总统竞选期间,众议员欧比对里根关于要同台湾恢复关系的讲话提出批评,指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对遏制苏联极为重要,里根讲话一定已使克里姆林宫“高兴得手舞足蹈”。(33)国会1985年和1986年同意向中国出售军事设备也是出于战略的考虑。

第二,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发展两国关系可以促进美对华产品出口,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国会批准《中美贸易协定》,修改涉及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法律以及通过中美

核能合作协议,都是例证。除此而外,不少国会议员还主动敦促政府行政部门提出具体建议,取消对华贸易的限制。1980年7月,众院科技委员会的两个小组委员会在听证会的基础上向众院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建议放松限制,简化手续,以扩大对中国的技术转让。1987年7月,参议员赫克特发起组织了“对华贸易小组”。同年10月,该小组举行中美贸易专题讨论会,有20多位参议员与会。参议员迪克逊在会上呼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潜在市场,美国政府应该尽快配合私人企业开展对华贸易。”(34)相比其他方面而言,美国国会对促进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还是比较热心的。

总括全文,从本文查阅的一些资料来看,在过去十年间,美国国会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既起了积极的正面作用,也起了消极的反面作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决定国会态度和政策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现实主义精神,一是意识形态信仰。这两个因素是相互矛盾的。现实主义精神是推动中美关系朝前发展的主要动力,意识形态信仰则无时无刻不限制着两国关系发展的进度、广度和深度。十年来总的趋势是现实主义因素逐渐加强,意识形态因素逐渐淡化。但是,迄今为止,意识形态还远没有淡化到多数国会议员可以把中国当成真正朋友的地步。它什么时候能淡化到这一步,或者说它能不能淡化到这一步,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如果它不能继续淡化,中美两国就很难成为非常紧密的朋友,这坏阉蚰侨范丐转傻摹

注释:

(1) Michel Oksenberg, "Congress, Executive-Legislative Relations, and American China Policy", in Edmund Muskie, et al, eds., *The President, Congress and Foreign Policy* (N. Y.: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6), p. 209.

(2) U. 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Hearings on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96th Congress, 1st Session, p. 397.

(3) Senator Glenn, U. 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Subcommittee on East Asia and Pacific Affairs. *Hearings on the Oversight of TRA*. 96th Congress, 1st Session, p. 2.

(4) Senator Church, note 2, p. 1.

(5) Ibid., p. 360.

(6) Congressional Record, March 13, 1979, H1286. 应当指出,当时认为美国吃亏的人是非常多的,连曾任过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的当选总统布什也认为美国“做了所有的让步,却一无所获”。

(7) Ibid.

(8) Congressional Record, March 5, 1979, E842.

(9) 同注(2),第371页。

(10) See U. 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Subcommittee on East Asia and Pacific Affairs. *Hearings on the Oversight of TRA*. 96th Congress, 2nd Session, p. 2.

(11) PL96-98, Section 2.

(12) "Implementation of the TRA: the First Year", A Staff Report to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 S. Senate, p. 3.

(13) 同注(10)。

(14) 台湾“中央研究院美国文化研究所中美关系报告编辑小组”主编《中美关系报告(1979-1980)》,第7页。

(15) 同上,第9页。

- (16) 见《人民日报》1987年10月9日第一版。
- (17) 同上。
- (18) U. 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Subcommittee on East Asia and Pacific Affairs. *Hearings on US-China Relations*. 98th Congress, 2nd Session, p. 3.
- (19) Wallop, Congressional Record, October 2, 1986, S 14555.
- (20) David Maybaw, *Congress: The Electoral Connec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5.
- (21) 1988年总统选举过程当中, 两党竞选人很少提及中国, 就是例证。
- (22) McDonald, Congressional Record, April 10, 1979, E1693.
- (23) Ashbrook, Congressional Record, May 21, 1980, H3919.
- (24) Rudd, Congressional Record, June 12, 1980, H4917.
- (25) Congressional Quarterly's Weekly Report, 1986, p. 968.
- (26) Congressional Record, August 15, 1986, E2920.
- (27) Congressional Record, October 2, 1986, H9008.
- (28) Congressional Record, November 21, 1985, S16195.
- (29) Congressional Record, November 13, 1985, S15260.
- (30)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31, 1988. 关于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可参见 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31) *China: U. S. Policy since 1945*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1980), p. 54.
- (32) Congressional Record, July 23, 1980, S9575-9576.
- (33) Congressional Record, August 20, 1980. H7547.
- (34) 见《人民日报》1987年12月1日第7版。

对中美关系下一个高度的探索

李国友

一、冷却中的热点

在迎来中美建交十周年的时候, 人们似乎突然发现, 曾经促使中美接近的某些战略抗衡因素正在消失, 同时, 数度激起中美对抗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色彩也大为减褪。可以说, 中美关系中原有的热点在冷却, 很像是一个时代的结束。美国官方已经把中国作为不结盟的友好国家。中国的反美情绪, 如果还有的话, 那也降到了二次大战后的最低点, 并且, 大概比美国的某些盟友, 如南朝鲜还少。总之, 中、美在对方的形象已大为改善, 广泛渗入了官方和民间, 友好的势头大大压过了对抗的积怨。

促成中美接近的，原来主要是外部因素，不过，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新政”，其分量正迅速下降，好似冷战的贬值。潜在的热点，台湾海峡两岸，在蒋氏家族统治最后消失以后，老一代的敌对情绪已被淹没在探亲热、贸易热和投资热中了。朝鲜半岛局势，正迅速降温。南朝鲜和中、苏的关系急转直下，不仅贸易额剧增，正式贸易关系建立在望，直接投资也已起步。美国和北朝鲜的关系也在改善，并且是在南朝鲜的促进之下。

看来，一种新的游戏规则正在形成：对手的盟友可能是我的伙伴，缓和与对手的关系，争得更多的朋友。这一潮流到1988年的今天，几乎发展成“雪崩”之势。虽然今后仍会出现波折，缓和中仍会有冲突，但是三角对抗中的价值，中美间原有的引力和斥力，都已大为减弱。在一个变化迅速的多极世界中，中美关系能否获得新的势头，值得探讨。

二、选择的挑战

新的战略价值，未来的会聚点可能在哪里出现？很可能将更多地取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取决于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中的国际竞争能力和相对优势组合。在当今这个急剧“缩小”的世界中，这正成为无形的主宰，决定着国家的兴衰、国际关系的冷热，虽然“静悄悄”，但影响之强，变幻之快，对人类贡献之大，胜过惊心动魄的热战和冷战中叱咤风云的军事统帅和政治领袖。

中美相比，中国是处于重大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不发达国家，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首先要探讨一下中国在世界发展格局中面临的矛盾、潜力和制约条件，以及机会和可能的选择。

相对差距和主要矛盾

在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的世界经济竞赛中，中国拉了车，中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从1960年的7%下降到1980年的2.5%。按国内生产总值相比，中国1960年和日本相等，1980年只有日本的1/4，1985年只有1/5；1960年比美国仅少4600亿美元，1985年少36800亿美元。1984年中国拥有的摩托车辆，仅和1000万人口的希腊相等（均为180万辆）；其中小汽车的数量只相当南朝鲜或泰国的1/5。就是说，即使不算八亿农民，中国的相对和绝对差距都扩大了。

中国增长的速度表面不低，但发展水平落后，主要原因是投入大，效益低，国际竞争能力进化慢。体现资源利用水平的综合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长期来和发展中国家相比都较低，和发达国家比差距更大。对今后的发展，这更是关键，因为：第一、中国人均自然资源贫乏，人口增长进入高峰；第二、中国改革、发展的初级释放能量阶段基本结束，农业和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取决于素质的提高；第三、面临的世界经济竞赛，以内涵增长为特征，要求以更少的自然资源，更低的成本，提供同等或更高效用的产品和服务。高技术产业成为这一发展的核心和动力。这正好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手段，但却和痼疾不相容。这一难关不突破，到本世纪末，中国经济发展的相对差距，将退回到鸦片战争时期，对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都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潜力和局限

中国缩小差距能依靠什么？依靠劳动密集优势吗？

虽然廉价劳动是发展中国家的固有优势，理应发挥，但是，其增值有限，不能提供经济起飞的动力和后劲；并且在世界市场中优势在下降，范围在缩小，领域在变化。在80年代头五年间消费电子装配所需的劳动力减少了一半，直接劳动成本平均已下降到总成本的5%。今后十几年发达国家将完成制造业，包括纺织业，从设计、制造，到销售、服务的计算机集成高级自动化，整个制造业剩下的某种“劳动密集”部分大约只有15—20%，并且是随着自动化筛选过程在转移。这已经在中国沿海开放前沿有了明显反映：定单批量减少，

花色品种要求提高,电子产品的加工费和价格下降,品质要求苛刻,以致品质改善,而合格率降低。同时,劳务成本迅速提高。

国际分工理论是针对现状下的相对成本,要缩小差距就要突破现状。所以日本30年前就摆脱了这种分工理论的束缚,作出了决定命运的选择。

依靠外部资源,即两头或四头(原料、市场、资金、技术)在外可行吗?显然,这些资源既稀缺,又丰富;既难以获得,又流动迅速;既代价高昂,又效益诱人;关键在于利用的能力。因此,智力资源的作用决定成败,中国的潜在优势在于:以10万计的接触到当代前沿科技和经营管理的优秀人才,仅中国科学院就有4.6万科技人员,海外留学生超过6万,还有成百万的工程技术和教研队伍;相当规模的研究、开发和制造业基础,仅独立研究所就有4690个,52万人;特别是一批具有开拓精神的创业人才,从农村的专业户,乡镇企业,国营大、中型企业,研究、教学单位、政府机构和海外留学生中,正在涌现。

可见,中国智力资源和科技—工业基础不比日本起飞时的相对差距大,也不比“四小龙”现在弱,更高于相似的发展中国家。问题在于发挥智力的作用,特别是在改革和发展方面,而不仅仅在技术上,这是中国一贯的弱点和难点。因此,中国大陆目前的竞争起点(观念、战略、执行效率),还比不上50年代中期的日本和60年代的南朝鲜,台湾和新加坡。容易发挥的优势前景有限,关键的潜力难以发挥,这正是中国面临的难题和严峻的挑战。

发展中的机会——四维三层次分析

机会在哪里,有种种说法。为此,作者研究出一种发展的四维三层次分析法,以利问题的展开和深入。

四维是指产业类型,国际化程度(外向水平),管理体制,发展特征(或模式)四个方面。每一个方面又可大体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每一层次又和增值水平,开放程度,发展阶段和国家规模有某种关系。如图1所示。

产业类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智力密集型。

国际化程度:出口加工和进口替代,产品开发和出口导向,国际网络一体化。

管理体制:外资管理(特区)型,(重点)竞争优势培植型,自由企业型。

发展特征和模式:香港式(短平快),日本式(跟进导向),美国式(融合进化)。

发展中国家一般从左下角出口加工,进口替代的C-3格局起步,利用劳动密集的固有优势,靠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带入国际市场,两头(原料、市场)在外是在外商手里。这对政府和企业界领导素质低的国家是重要的启蒙阶段,几乎是必经之路。但是,经济的起飞和发达程度的提高,却在于突破这一低增值和低外向水平的局限。因为出口加工和国内经济分离,和国际市场的联系是间接的,无实感,不透明。进口替代和国际市场分离,和国内经济机制的低效率部分易于结合。在这一阶段停留时间过长,超过八至十年,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往往会上升,甚至导致国际收支和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就是说,扩大利用外部资源(多头在外,大进大出)必须和提高外向水平和竞争能力相配合,及时从C-3进入B-2,才能转入良性循环。否则,提高增值的目标难以达到,开放程度也得被迫收缩。中国近些年的波动,似乎是陷入了这类低水平循环的漩涡,并且,周期有缩短、振幅有加大的趋势。

后进国家要缩小发展差距,就要充分利用“跟进效应”(Catch-up Effect),吸取领先国家的经验和成果,以较少的研究、发展费用和投入要素,取得较高的增值,以较小的代价和较短的时间转变产业结构,进入较高的发达阶段。跟进效应是日本战后经济得以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日本1950至1973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9.37%,其中来自跟进效应的高达1.02%,来自外贸的只有0.26%,来自劳动力数量的为1.09%;1973至1984年,GDP年均增长率为3.78%,其中来自跟进效应的仍占0.44%,外贸0.05%,劳动力数量0.4%(1)。跟进效应随着和领先国家差距的缩小而降低。不同阶段跟进的特点不同,内在和外在的影响因素都在变化,包括世界产

业格局和经济形势。要考虑时间差,就是说,跟进不是简单重复,而是要根据前沿的发展,为取得在预定的未来交会点上的相对优势,作好准备并付出代价。

例如,日本汽车业的发展在第一阶段利用了战后西方国家汽车市场急剧扩大的机会,仅美国的市场年销售量到60年代末已达1000万辆,比战前增加一倍。在第二阶段市场饱和的情况下,利用了石油危机,以省油的小型车夺取了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低档市场份额。而南朝鲜利用日本迫于美国限额,向中、高档车转移的机会,填补了低价车的空档。当前,世界汽车业正向三个方面急进:低成本,高性能和多样化需求。本田汽车公司总裁(Tadashi Kume)1987年宣称,在世界已经领先的本田生产率要再提高二倍。作者1988年9月访问本田在熊本的工厂,特就此问及完成情况,得知该厂已有一半以上工种达到目标。本田在研究和效率上的效率也极高。1985年本田和通用汽车公司均各取得约300个专利,但通用汽车投入37亿美元,而本田仅投入6.7亿美元。日本以品质和服务的优势抵销了日元升值,并针对贸易磨擦迅速进入A-1格局:重点产业战略导向、出口导向显著削弱,国际化、自由化迅速发展。日本海外销售中在海外生产的部分,1983年只占2%,1986年增至5%,90年代中期预计将达20%,赶上目前美国的水平。

可见,以同一方式发展所能取得的效益是递减的。南朝鲜的汽车在1985年才批量销往北美,1988年预计可出口88万辆,远低于日本,但是已开始北美设厂,并加强了和日本的交织及在日本的销售。就是说,南朝鲜只有及早从产品出口的B方式转到国际网络的A方式,才能保持发展的势头。因此,中国要尽快在图1的A、B、C三个层次展开。目前三种类型的产业基本处于左下角,竞争能力低,要尽快进入B格局。智力密集的服务业要进入A格局,以便提供国际化、商业化的支撑服务,以提高产业的增值和外向水平。但是,由于上述的效益递减,以及中国制造业的平均素质和政府对产业战略领导能力上的差距,中国难以获得日本和南朝鲜在B-2阶段取得的效益,因此,要提前进入A-2,这样可以运用当代新的、更加优越的方式,弥补迟缓的损失。(2)

多层次发展可以把沿海发展战略从地区梯度,推向竞争力梯度,使改革围绕统一市场,投资环境和企业活力稳步推进,使开放获得坚实的基础。

三、智力密集的高度

在上述中国的多层次发展方式中,最有潜力,最关键,最适于中美双方长期合作的部分在哪里?大概就在智力密集领域;这里是泛指,不仅包含技术密集产业,并且包含专业性的服务业及教育、管理和学术研究。因此,这是具有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和不同性质的综合体,影响到经济、政治、文化的基础和变革。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可以把中美关系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新的引力

1985年约翰·艾克斯(John Akers)就任IBM公司总裁后在斯坦福商学院的讲话中,对作者提出的关于该公司新建的自动化打印机工厂的作用时,明确答复,IBM有长期制造打字机的经验,因此有信心夺回(计算机用的)打印机的制造优势,在质量、成本上都胜过东南亚的制造商。作者就此问过英特尔公司(Intel)的创始人诺伊思(Robert Noyce),IBM的这种战略是否会被其他公司效法。答复是否定的,因为大部分公司认为,还是投资到研究和效率上收益更大。

1987年11月斯坦福商学院教授亨利·罗文(Henry S. Rowen)来华讲学和作者交谈中认为,美国的概念设计和中国的工程设计相结合是大有可为的。1988年4-5月作者在广东调研中得知,蛇口工业区工人的工资加上补贴,已高达泰国劳务成本的二倍,日本的1/7。但是,中国高级科技、工程人员的劳务成本只相当印度的1/10和美、日的1

%。

从上述的“一孔之见”可以发现,美国的制造业竞争优势主要不寄托在海外廉价劳动上,美国的重点放在高增值的层次,需要扩大这一层次经济规模和效益的雄厚智力资源。

70年代初美国在海外制造业中的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只比国内低31%,大大高过日本(比国内低67%)。(3)近十年来,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呈现类似特点。至1988年6月,美国在中国大陆直接投资的企业达467家,平均投资协议额为469万美元,比日本的平均额232万美元高一倍以上。

这显示,富于劳力资源的日本,比富于资本和技术的美国,更依靠海外廉价劳动,以便维持劳动密集的优势,而美国更着重技术密集优势。当然日本也正向这一方向转移。

从中国方面看,虽然在这个不祥的龙年,价格改革准备不周,起步不稳,胎死腹中,笼罩着通货膨胀和信心受挫的阴影。但是,从作者的“一孔之见”仍可以发现缕缕光明,仍可感到一股强劲的潜流,试图冲出漩涡,游向彼岸。

中国开放、改革前沿的创业人士已经目标明确地在从依靠政策优惠,转向培育和发挥机制和素质优势,转向技术和智力密集层次,转向提高外向水平。仅从作者1988年接触到的部分,从蛇口工业区,深圳科技工业园,广州黄埔经济开发区,佛山市,中国科学院,都在为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经营环境作切实的准备,并且在使这一转向得以操作和实现的软支撑上下功夫,认为这是促进外向经济更上一层楼的关键,是使“七通一平”、各种内外资源等硬件发挥经济效益的催化剂。

聚合点

目前,坚冰已经打开,禁区迅速缩减。美国在放宽高技术向中国转让的范围,中国在致力于改革的深化,包括价格改革,股份制,证券市场,证券交易所,法律体制,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转移给民办机构,国营企业部分股份出售给私人,企业的破产,人事制度的活化,都在实施或加紧筹划中。聚合点在哪里?可能就在智力密集的专业性服务业,包括信息、咨询、投资、会计、法律、人才培养交流等,影响到经济体制、产业政策、产业、企业、产品等各层次的衔接、调整和效应,并且可促进相关环节的贯通,是中美在智力密集领域结合的基础。对此,双方都极关注,在某些方面几乎不谋而合。例如,本文上述基本观点,一年来曾在中国不同层次中酝酿并得到重大支持。1988年10月中,美国助理商务部长穆尔(James Moore Jr.)和进出口银行行长博恩(John Bohn Jr.)在世界电视网答中国记者强调的也正是:“……担心中国今天还没有充分了解服务业对整个经济是何等重要,……让我们的服务部门人员和中国的服务部门专家一起工作,我想会对双方都有好处。”(穆尔语)“我想只用三个字:这就是信息,信息,信息。……我不会在鼓励投资办法方面下功夫,而会在透明度上,在资料的可靠性上,在动员更多的人往来于太平洋两岸,从事交流活动的问题上下功夫。”(博恩语)

对美国来说,服务业在世界领先,增长最快,并且是优势出口产业,仅八大会计公司(1988年已是二大会计公司)在海外的收入就十分可观。同时,服务业是投资环境的重要支撑。因此,对美国这一行业的合作者来说,不是等待投资环境的改善,而是在参与改善中寻求机会,扩大领域,增加收益。对中国来说,存在巨大的服务真空,相当部分不适于由政府去填补,要转移给民间,政府中的有识之士也已认识到,但是民间难以接办。同时,各级政府的主体倾向于以各种名目保持计划体制中对人、财、物的控制权,而难以向维持市场秩序,提高市场效率的政府权力方面转移,这又形成政府权力的真空。这两部分合在一起就形成,中国没有服务,既没有政府的服务,也没有民间的服务,而没有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就丧失了领导的基础,形成两头落空:决策无依据,执行无手段。

可以看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有着强烈需要,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但尚未开发和生疏的领域。为此,有必要促进形成双向接口,兼容和官民协调的多元化合作体制。着重点可能在:

第一,增加双向透明度和可测性。美国体制和市场的透明度和可测性是较高的,但是对中国却很低。从中国政府到企业界人士都反映,美国的情况复杂,难以捉摸,连合法、非法的界限都不易划清。在贸易,特别是反倾销上,不确定的因素更多。

中国沿海今后更加开放,更加“特”,不仅要把国外的要素引进来,更要把国内有活力的前沿“放”出去。并且,只有更好地放出去,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才能成为素质好的合作伙伴,从而提高放进来的水平。通过抓住中国力图提高进入国际市场水平的需求,美国企业、首先是服务业,不仅可以获得商业机会,并且可以在中国的低透明度和低可测性中,发现扩大中国市场的“空档”和前景,特别是优秀的合作者,后者往往是提高外向水平的先锋和扩大国内市场潜力最大的成分。

第二,建立国际化、商业化、社会化的软支撑网络,加强多边、民办和独立的性质,以增强客观性、持续性和稳定性。

这种软支撑网络可以包括:

(1) 与世界市场信息网络联接的卫星信息处理服务网络。

(2) 公司经营实绩跟踪考核网络,为股票证券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基础。§(3) 风险投资,项目咨询评估,管理及市场服务网络。(4)

以上是美国的强项,中国的弱项,几乎是空白。当然,还应包括美国国会技术评价局(OT A)在技术基础设施和创业网络中所列举的内容,如智力资源网络,和研究、发展以及有竞争力的企业、经销、顾客连接的网络。(5)

美国的服务业对和中国的合作也是感兴趣的。仅1988年8—9月作者和国家科委的一个考察团访问美国期间,对一些可能的方案就进行过广泛的交流和认真的探讨。信息产业协会(Information Industry Association)作出积极反应,正继续进行接触中。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和最大的会计公司阿瑟·安德森公司(Arthur Andersen and Co.)都有和中国合作的经验,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其他留下深刻印象和有兴趣合作的公司和机构也不少。

多边国际合作对促进软支撑网络的独立性和开放性会起作用。例如世界银行的国际金融公司(IFC)表示,和美国公司一起参与在中国的这类项目,用IFC的资金和美国公司的执行能力和效率,带动中国民办的服务行业,是可行的方案。从美国到日本,在和包括台湾、南朝鲜和香港的人士接触中都可以强烈感觉到,扩大和加深双边和多边合作的需要和困难。中美在智力密集领域的合作可以起促进作用。例如:减少中资大量进入香港带来的使香港商业水平和市场效率下降的趋势;开拓美、中、台湾、南朝鲜的交织通道;改善投资环境和提高中方伙伴的素质将大大增加日本在中国的投资。

第三,智力密集的合作网络必须是多元化、多领域和融合贯通的。上面涉及的偏重于经济和产业,显然,没有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配合是不能成功的。创业精神(entrepreneurship)和美国概念中的个人主义关系密切,而艾奇逊提到的民主个人主义在39年前就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判,并且埋下了反右派运动的诱因。其实,在文化上(不是政治上)是一场误会,因为在中国批判的个人主义在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上和美国的没有多大关系,倒是和中国开放后流行的个人主义有些关系。似乎中国批判中国的个人主义和接受美国的个人主义可以兼容。中国对美国的政治体制有自相矛盾的误解:政界中对三权分立有忌讳,以致决策程序混乱,增加了随意性和摇摆性;而司法界中对三权分立清楚,但对现代三权合一,如美国的独立机构(Independent or Regulatory agencies)知之甚少,以致中央政府管理经济的机构软弱无力;权力分散和自由化的程度大大超过美国。中国没有一个机构,甚至所有的机构加在一起,具有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更不用说日本的通产省在相应领域所具有的实际权力。同样,美国人中由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和隔阂,对中国误解也不少。往往看到下放权力,多宣布几个开放城市,放开物价,就是改革派占上风,有保留的就是保守派。带有这种误解的美国人士,加上“读了半部塞缪尔逊(P. A. Samuelson)经济学”(青年学者中的戏言)

的中国新秀合在一起,大概也为中国的改革帮了倒忙。社会的因素同样重要。1988年8月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经济学院组织的国际金融研讨会期间,一位朝鲜银行(Bank of Korea)的访问学者 Yu Hae-ju (柳海柱)和作者交谈中强调的一点,可能是有启发的。他认为作者提到的南朝鲜经济得以起飞的有关因素,只是表面现象。深层的原因在于,南朝鲜相当普遍的人可以指望,只要努力进取,提高才能,就能得到相应的地位和报偿,而不靠家庭背景和出身地位。在这一点上,表面和中国社会传统相近的南朝鲜还有日本,反而和美国有共同之处。东京的YHP公司体现了美国HP公司文化在日本的生根。而年轻的日本ASCCI公司的总裁西和彦成功的创业,显示了美国信息产业前沿的风格。熊本技术都会中心(Kumamoto Technopolis Center)和地区的环境,使人感到在智力密集领域把技术、文化、社会融合一体的目标明确的势头,并且具有坦诚和乐于交流、合作的“硅谷”气氛。同样,通用和丰田汽车合营的加州工厂的美国经理也可以眉飞色舞地介绍美国人如何吸收丰田文化,包括做工间操,而取得成功。中国可以从这里得到的启示是更多地着眼于文化、社会和经济的综合交流,着眼于国际多边合作。

这一合作的网络应使各领域,各层次,各阶段相呼应,相贯通,包括在学术界,产业界,政界之间,在某些政策、战略、项目的规划和执行之间。以下试用一个例子来表明一类现存的断层和差距,以及需要贯穿的环节。

爱瑞斯公司(Aries Technology, Inc.)是设在波士顿地区的一家计算机软件公司。1986年4月作者应一位风险投资管理人之邀去访问时,该公司预计当年末即可推出一套供机械工程师个人使用的计算机辅助工程(CAE)。因此,在寻求第三轮投资和扩大产品销路。该产品从概念设计的优化着手,通过三维有形的软原型来验证设计的性能和可靠性,大大减少通过硬原型的高费用和反复、迟延,从而使产品发展的成本和时间各缩小30%,对大规模发展的项目,如汽车,效果更显著。该公司对40家公司包括三大汽车公司作过调查,以便使产品更适应用户的要求;展示的原型已得到良好反应。这对中国有关企业是很有用的,可以通过投资,共同设计,补充进适合中国的软硬件。和中国有关方面试探发现,这涉及上下左右各环节,相互难以理解和协调:这种CAE软件涉及产品发展周期(软件人员不清楚),涉及企业经营战略(管理人员对通过优化概念设计和验证来缩短周期,降低成本,提高质量的认识和迫切性不高),涉及国际竞争战略(完成出口指标属于外贸,而外贸对于如何有竞争力地发展新产品没有责任),涉及国家产业政策(计划部门按人、财、物和协商水平规划产出,没有按世界市场竞争格局促进企业提高生存能力的政策);对机械业,包括汽车业的很多企业来说,目前的承包利润不反映国际相对水平,要有竞争力地发展新产品,扩大规模,才能有存在的资格,于是回到了缩短产品发展周期,降低规模成本的软件。在执行上涉及引进技术,共同发展,投资,海外投资,海外风险投资(一种股本投资)各环节,也难以相通和融合。

一种美中多边国际合作的中介机构和网络,将有助于贯通、连接或绕过上述割裂的环节,并可以起到示范、补充和衔接的作用。否则,中国的改革难以深化,观念和执行力上的真空,会使漂亮的口号落到小农方式的尘埃中。

高度

智力密集领域的合作有低有高,有实有虚,可能导致何处,高度在哪里?为什么是中美会聚的高度?

在太平洋世纪即将到来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大中国”(美国《商业周刊》称为Greater China)经济大国似乎也在成形。这是指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取长补短的联合经济优势,加之,成其自然,很少政治色彩,对统一祖国有利,对各方有吸引力,势头正强。但是,三者都缺少长远计划性,战略导向能力弱,港、台企业家族色彩重,大陆产业经营水平低,相互促进的余地有限;港、台促成起飞的小而轻的灵活反应方式,可以推动华南起步,

却难以带动大陆。日本和南朝鲜那样的国家规模，就要求不同的方式。并且，港、台也难以填补本文提到的大陆“服务真空”。同时，“大中国”虽然在文化、社会上有共性，却缺乏新的激活因素，难以获得更高的发达程度。从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看，中国采取了各种方式摆脱落后，实现了大陆近代的空前统一和强盛，曾一度缩小了差距，但随后又迅速扩大。在这分裂，统一，封闭，开放的不同形态中，有一点相同，就是“中央王国”，“中学为体”的心态和主旨不变。但是当代的辩证法却是，要保持民族的传统，关键在吸取外部的养分，适应时代潮流进化。否则，“体”仍在，优秀传统尽失，成为空心大树。从这一意义，中国不能从“大中国”，而要从和人类发展前沿的融合中，获得新生。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及不列颠帝国一样，已成历史，超级大国控制的时代也正在过去，都没有恢复的价值。相反，中美的交织倒可能为亚太地区的进化，注入新的基因。

智力密集领域在中国的发展不仅会促成一个内外融合、透明度和可测性高的经营环境，使十亿人的潜在市场成为现实，并且将导致一个有目标、有理性的中产阶级的出现，包括农民中的专业户，技术工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教师和党政军中的职业官员。核心将是各阶层中的创业人士，是当代的淘金（智力资源）者。他们将奋力进取而不走极端，求实而不腐化，兼容并蓄而不走中庸之道，从而促进民族的成熟，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当然，也将把中美关系推到新的高度。

今天，中美关系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在很多方面超出了十年前的期望，特别在人员交流和观念的沟通上。这为登上下一个高度打开窗口，但是道路艰难，需要双方各界人士的开拓性努力。中美看来差异很大，智力密集领域看来很玄，但是，有如绝缘的陶瓷，用适宜的配方和工艺来调整微观结构，在经济上实用的温度下就可实现超导，从而带来突破性效益。中美间的“超导”将为人类文明作出历史性的贡献。

注释：

(1) 引自 Angus Maddison, *Growth and Slowdown in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June 1987.

(2) 参见李国友，顾淑林，王可，王路焜，曾洪：《加速发展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建议》，世界经济导报，1988年10月31日。

(3) 引自 Terutomo Ozawa, *Multinationalism, Japanese Style*, Princeton University, 1979.

(4) 详见王可，顾淑林，李国友，陈明宣，华社年：《调研报告——迎接开放前沿地区经济发展的第二波》，1988年6月。

(5) 参见 U.S. Congress,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July 1984.

对当前中国大陆知识分子 看美国的几点思考

袁 明

19世纪中后期,太平洋的波涛将两类社会地位不同的中国人由中国送往美国。前者是1848年加利福尼亚金矿被发现以后,以“契约劳工”的身份登上美国国土的华工,后者是自1872年始由清朝政府派往美国留学的留学生。清廷将选派“聪颖幼童”赴美国学习的宗旨视为“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1)

这两类被大洋波涛裹挟东去的中国人的自然生命都早已结束,然而,他们所从事工作的社会归宿却有明显的不同之处。中国赴美劳工在金矿开采、铁路架设中为美国的经济繁荣流尽血汗,但美国在本身的西进运动完成之后,以“排华”代替了招雇中国劳工。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排华法案,这一支中国人东去的人流中断了。他们对美国的看法,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除了留下一些在美国受尽歧视与剥削后写成的血泪斑斑的诗篇之外,基本上是无声无息。赴美学习的中国人则不同。一个多世纪以来,几代中国人通过各种途径负笈北美。这一支人流声势不断壮大。与前者被招雇去美国一去不能复返不同,他们有回流、有影响,架起了中美文化交流上的一座座桥梁。这一支人流至今没有中断。仅以数字为例,1872至1875年的首批中国赴美留学生人数为125名,而1979年至1988年仅中国大陆赴美留学、进修、访问人员已达5.6万人。(2)

在中美交往史上,这两类中国人的境遇与归宿本身已提出了无数个课题,值得引起中美两国有关学者的深入思考与研究。本文仅想对后一类中国人作一些初步探讨,重点放在当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如何看美国这一问题上。这是因为:(1)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一类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不仅继承了前辈的事业,也发展了前辈的思想。对他们来说,美国仍不失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参照系,他们的视野已由“西人擅长之技”而扩展到美国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法律诸方面。这种现象必然会导致中国人进一步深入了解美国。(2)从中美交往的角度看,他们较他们的同胞更直接地接触了美国文化与美国社会,有大量第一手的感性与理性认识,他们实际上起着中美相互了解中的媒介作用。(3)他们中的许多人已被历史的大潮推到中国当前改革的各个前沿位置上,他们将对中美关系在各方面的发展起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就他们如何看美国这一问题作一些初步分析,对中国人看世界、看美国、看自己,以及对美国人了解中国都是有意义的。

一、众口纷纷话美国

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大洋彼岸的那一大片土地仍具有魅力与神奇色彩。那一片土地曾经毫不留情地吞噬了大批中国劳工的生命,同时,它又培育了一批批中国的精英。现代中国人要问:这个既吞噬中国人又培育中国人的美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要对这个问题做出完整的回答是困难的。有的中国学者认为,美国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相当特殊的现象,要回答美国如何成为美国,必须从地理条件、历史环境、民族因素、

政治经济制度等多种角度来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考察。这个任务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

然而，许多现代中国人还是对美国社会与美国人作了不少观察与描绘。但正如一位中国留学生所说，留美的中国人往往根据自己的某种特殊的经历写出对美国这样那样的观感，而美国的“特殊之处”又太多，因此，一万名中国留学生就可以写出一万篇不同的美国观感来。这种说法虽然带有夸张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它还是有道理的。近年来，发表在不少报刊杂志上的大量游记、散文、小说等等，都可以归纳到这一类的对美国的描绘上来。这些描述虽然零散表面，但却五光十色，并且生动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美国。而且，这些感性的认识是人们由表及里、由局部到全面认识的必要准备，字里行间也有不少闪光的思想。一位中国老新闻工作者从美国新闻写作截稿的“死亡线”(deadline)谈起，赞赏了“美国人的苦干和实干精神”；从美国的滑雪热和艺术节，看到了“美国人爱玩会玩的风尚”；从小学校到国会山，感受到“美国人的民主传统”；从婴儿室的布娃娃到独居的老祖母，体会到了“美国人的个人独立精神”(3)。另一位对美国进行了两年考察后的学者写道：“美国文化的一个根本价值观念便是人类应努力征服自然。他们相信人类能克服障碍，掌握环境，他们主张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来对付自然界而不应消极被动。从这一价值观念出发，又产生出许多相关的价值观念，如关于努力工作，重视个人成就，主张开创进取，讲究效率和理性”(4)。一位中国社会学家认为，美国人的精神根源于拓殖时代，“那种粗放旷达的生活环境养成了独来独往，不亢不卑，自负自骄，耐劳耐劳的性格。这性格归结于他们崇尚平等，爱好自由的精神。美国的创造力并不是凭空获得的，而是从这种对生活的认真，对自由的爱好中中成长的”。“我们要认识美国，不在他外表的耸天高楼，而是在他们早年的乡村里”。(5)

这些分析无疑都是深刻且有说服力的。然而，它们并不能全部回答本节开始时提出的那个问题：“美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中国知识分子看来，这是一个动感情的问题。因为美国总是与中国人的痛苦与希望联系在一起。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探求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时，往往会涉及到中美关系中的一些深层的、本质的东西。中国知识分子在看美国的时候，往往要受到一个复杂的外部世界与一个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制约与影响。这些制约与影响，也许是中国至今还不能有一本像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那样从历史、文化的深度来全面论述中美两国的著作的主要原因。

下面想就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看美国的客观与主观两方面因素分别作一些探讨。

二、在政治的漩涡里

任何人看世界看社会，总不免带上他所处时代的印记，受到身处的政治环境的影响。这一点在中国知识分子看美国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当前中国国内知识分子队伍，若从年龄上作粗线条的、并不严格的划分，可分为老、中、青三个年龄段。他们各自不同的经历，不能不影响到各自对美国的看法。以老一代为例，他们中不少人有留美经历，更多人则在美国人办的学校里受过教育。他们“生活于中国和世界动荡最大的年代，许多够得上是世界头号新闻的事件都发生在这段时期里。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五四运动、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解放战争、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们所亲身经历的这些与中国命运相关的重大事件，往往都在不同程度上与美国联系在一起。他们对美国的希望、失望也都与这些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政府介入中国内战，朱自清教授“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的配给面粉”，引起了中国师生的一片敬佩之情。一位老新闻工作者1948年在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毕业时，领到了校方发给的校友通信地址登记表，出于对美国政府助蒋内战的义愤，他认为今后美国同中国敌对是注定的了，再同美国联系似乎没有什么可能，于是，他挥笔在地址栏上填了“花果山水帘洞孙悟空转”，弄得美国人莫名其妙。40年代在美国旅居四年的《大公报》女记者杨刚于

1951年出版《美国札记》一书,当时正值朝鲜战争方酣之际。她在书的前言中开宗明义:“英勇的人民志愿军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和敌人的炮火与钢铁对抗,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伟大胜利,证明了美帝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因此,“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对美帝无法无天的掠夺精神以及这种掠夺精神所造成、所影响的美国文化思想多作研究与暴露”。她认为,“一般地讲,除了少数进步的人而外,美国人是在民智未开的情况之中。他们的生活目标是空虚的,他们不问生活的意义何在”(6)。我们在今天回顾那几十年前的事情,重读那几十年前的文字,不能责怪当事人的偏激。就以上举例提及的几位而言,他们都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华。他们学识渊博,精通中外文字,但他们当时之所以那样“宁死不食周粟”,义愤泻于笔端,主要是大政治环境的影响所致。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在评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那一段年月时指出,当时在中美两国国内,两种民族主义情绪都在迅速增长。一种以要扩张为标志,一种以争独立为特征。这两种强烈的民族情绪迎头相撞,必然会产生深刻的反响。政治已以压倒一切的优势代替了其他。当时美国国内又盛行麦卡锡主义,在“反共”的口号下反华,大批中国留美学生不得不排除重重阻挠返国,有的甚至要绕道第三国始能回到故土。彼时彼景,对美国的友好感情无从谈起。他们中间不少人后来经历过许多坎坷,有的人甚至因为早年与美国有这样那样的关系而受到无端牵连和委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我与祖国共了患难”来自慰。当前,他们想得更多的是如何从历史中总结经验,使中国能尽快摆脱贫困与落后,“如美国能平等对待我,中国应当发展与美国的关系”。由于有丰富的人生经历,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不少人对美国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并且,由于他们有早年与美国的种种联系,在交流上又没有语言障碍,他们目前在中美文化科技学术交流上仍起着带头作用。

中年一代知识分子,成熟、成长于新中国诞生之后。他们之中最年长的一批,正是属于40年代末在北平美国创办的燕京大学校园中贴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大标语的那一代人。这一时期,是美国对中国采取敌对政策,要中国共产党人受难,封锁孤立新中国的时期。在这样的大形势下,即使他们中间最远离政治的人也要认真地考虑国家的安危存亡问题。原来与美国的联系被朝鲜战争切断了。他们不可能再像上一辈知识分子那样赴美学习。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到了苏联和东欧,更多的人是留在国内,参加抗美援朝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反右”运动。他们中间更为年轻的一批人则从小学开始便感受到美国敌视中国的气氛:小学时,他们听的唱的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曲。中学时,他们参加的是“要黎巴嫩,不要美国佬”的示威游行,从报纸与教科书中,他们读到的是大量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文章。这一代知识分子从政治启蒙开始,就被大政治气候推入一个固定的、由教条概念组成的思维框架之中。如果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激烈震荡,不是这场“革命”结束后出现的拨乱反正局面,不是新局面下的开放政策以及有了直接赴大洋彼岸亲眼看一下的机会,他们也许至今也不明白美国的多元性、复杂性绝非是几个政治名词就可以概括得了的。近10年来,这一代人中的不少人已经访问过美国。他们承担着将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缺掉的一页重新补上的历史重任。这项工作已在科技、文化、教育领域全面展开。10年来不少双边研究项目、交流项目、国际会议的主力是由这一代人来承担的。

青年一代知识分子中的较为年长者的经历与上一批知识分子有不少共同之处。他们之中的稍年轻者出生成长于国内的动乱年代。客观环境不允许他们有一个正常的人生启蒙的机会,他们的人生启蒙的最初几课是在动乱与迷茫中度过的。但是,这一阶段恰好与中美关系由敌对趋向解冻并发展的时期相吻合。美国对他们来说是神秘的、充满吸引力的。他们从书刊、电影、电视、交友中了解到的美国与中年一代在早期所受的影响熏陶已很不一样。在他们心目中,遥远的美国与其说是面目狰狞的“头号敌人”,还不如说像那“白胡子、戴眼镜、永远笑容可掬的山德士上校”那样直观、富有人情味(7)。青年人特有的朝气与探新精神和对旧传统的不满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渴望有朝一日能去“新大陆”实地了解美国。每次“托福”报名时那热闹盛况便是一个生动的写照。现在,已有一大批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可

以预期,在对美国有了较为长期的观察以后,在对人生、对自身、对社会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与体味以后,他们之中的不少人会比他们的前辈更为全面深刻地认识美国。

三代中国知识分子看美国,时间、条件不同,主体、客体都在变化。就中国知识分子本身而言,老一代知识分子当年到美国与今天中青年知识分子去美国的情况与待遇是很不一样的。“回想当年,美国一般人对少数民族的心理状态还停留在黑奴主的时代,在美华人哪能高视阔步?有时甚至连头也不敢高高抬起,唯恐受到压制和打击”(8)。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今天这一情况已有了很大的改变。与老一代相比,中青年知识分子今天了解美国的条件与机会毕竟是好多了。

尽管条件起了变化,我们仍可以看到,中国当前几代知识分子都没有完成在客观的、系统的基础上了解美国、研究美国的工作。变幻动荡的国内外局势使中国知识分子在做这一项工作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50和60年代中有些部门、大学中设立了研究美国的系科,但并不真正受到重视。

以上只是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看美国的直接客观原因,如放到更为广阔的政治历史背景下去考察,可以看到还有更为深沉的因素。

可以这样说,中国人看美国与中国人看世界这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一开始就“先天不足”。中国人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到认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其间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只有到了19世纪,中国的旧观念才开始发生变化。但大的概念变了,具体看问题的角度、思想方式、语言、行为的适应与改变则没有很快跟上去。与欧洲人相比,中国人观察美国时就有更大的基本文化价值观念问题、语言问题等障碍。这些障碍从上一世纪一直沿袭至今,加上上述的大政治环境的限制和影响,使中国人在全面认识美国这一点上始终没有打好基础。中国的美国研究没有在近几十年内发展成健全的独立的学科,而是经常受到国内外大政治气候的左右。

三、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之间

除了外部大环境的影响之外,影响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看美国的还有一个非常特殊与复杂的内心世界。这个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形成与中国在近现代在周围列强的挤压下所走过的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密切相关。

要说明中国知识分子这一复杂的内心世界,必须考察一下它的由来。这就不得不要提一下五四时代。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界思潮中的主旋律就是“启蒙与救亡”。“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与救亡、爱国的主体相碰撞、纠缠、同步。中国近现代历史总是这样”(9)。在这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中美关系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巴黎和会结束后,中国知识界对美国在和会上对日本的妥协与让步感到极大的震惊与失望。李大钊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写道:“威尔逊!你不是反对秘密外交吗?……你自己的主张计划如今全是大炮空声,全是昙花幻梦了。我实为你惭愧!”(10)悲愤之余,大批中国知识分子仍怀着强烈的救亡与启蒙的意识,远渡重洋,负笈美国。从20年代到40年代,在美国的大学中培养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中国留学生,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对中国发生巨大影响的学者。这批赴美学子,以启蒙为主要目的,即寻求科学与民主,但救亡意识仍紧紧地同启蒙志愿联系在一起。“1919年我到美国后,和西方文化有了直接的接触,当时我经常考虑的问题是:西方为什么富强?中国为什么会贫弱?西方的优点,在于其有了近代自然科学”(11)。一位留美学生在致国内的信中说:“到了美国以后,发生了许多在国内不会发生的思想。……我是学化学的,我时常想到国内很难找出一个占有国际地位的化学学者。国内最好的,在世界地位不过二、三等。其他学科,也多有同样情形。我觉得这也是国家的羞耻之一。我深切地感到,至少应有一部分留学的同学能拚命延长学习,埋首十年或

二十年，替国家造出几个占世界地位的学者”（12）。中国的有识之士，即使是受英、美教育影响很深的人，也不可能将历史投下的阴影完全从内心深处抹去。中国自上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扮演着大国交易，强权政治中的牺牲品的角色。对任何一个以权势谋发展的大国，中国人是谨慎看待并持保留态度的。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力量膨胀的美国尤为如此。费孝通在1944年至1945年间访美之后，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大英帝国的扩展时代已经过去，成了年，有的是心平气和、冷眼看世的神气了”。但像美国这样“一个年轻的文化，配上无比的强力，毕竟不是件太可以放心的事。何况，若是拓殖的心理没有修改，他再度的扩张，是否是世界的幸福呢？……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300年前的北美了，没有文化的真空区了。若是按照18、19世纪的老方法去扩展的话，说不定会遇着很大的阻力，把人类在封建制度所解放出来的力量消磨在无谓的争斗之中”（13）。战后美国在远东、中东、拉丁美洲的困境已足以证明这段话的预见性。此处要强调的是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在1945年看待盟国美国时那深沉的感情内涵与救亡意识。

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救亡的主旋律一次次压倒启蒙，这主要是由大时代和客观环境决定的。“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是，“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14）这种情感，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也仍然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文革”中，提“现代化”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救亡意识发展到僵化锁国，走上了绝境。直到70年代末以后，启蒙、现代化的口号才再一次被响亮地提出。中国人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美国。今天，大多数曾到过或未到过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已有一种共识：“美国是世界上经济实力雄厚和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5）。而且，美国经济发达和科技进步的重要因素，是“美国建国二百多年来执行开门政策，第一，大量吸收外国移民，第二，不断吸取外国技术，第三，长期吸收外国资金，第四，大量吸收外国文化”（16）。凡是到美国去过的中国人，几乎无一不对美国那高度发达的通讯联络、交通运输、机械化程度发出由衷的赞叹：“当夜幕降临、万物隐退的时候，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驱车疾驰……只要继续向前，眼前就永远闪烁着、流动着两道长长的火龙、金色的光带……这时，我忽然觉得自己触摸到了美国的动脉”（17）。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贫困、落后、锁国、吃大锅饭等现象有切肤之痛，面对美国那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那一个开放的、竞争的、机会众多的社会，心情复杂而感慨不已。对自己祖国也往往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叹。当前，这种由两个社会的强烈反差而引起的感慨与实现现代化的决心交织在一起，启蒙的旋律便奏出了最强音。

然而，前人的思考与话语并没有成为历史陈迹、空谷余音。在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政治关系稳定的今天，它们仍然时时激起中国知识分子内心的共鸣。在肯定美国的长处与优点以后，今日中国的有识之士仍不能不对美国有所批评：“美国军事实力较大，向外伸手较多，世界公认它是超级大国，西方推举它是盟国之首。它自己也老实不客气，经常说自己是‘世界第一’，自命超人一等，情不自禁地要求别国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转移，动不动用美国的一套政治信仰和政府制度来挑剔别国内政”。（18）这从宏观角度观察美国的理性思考，是新形势下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层的救亡意识的又一次表露，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几十年前对美国的思考与评价的承继与发展。

美国人对中国知识分子这一深沉的内心世界经常无法理解。他们往往将其归于美国人理解的那种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框架中去。其实，这种处于“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之间的复杂内心世界是较一般的民族主义感情更为深沉、理性、带有强烈历史感与责任感的忧患意识。它几乎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独有，而且往往超越时空与党派的界限。否则，就无法解释这一现象：无论是大陆、港台还是在美国及世界各地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旦相聚并谈及中华民族的前途，顿时会有那么多的话题及语言。这正是般美国人所难以了解与体味的深层心理因素。现执教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华裔学者杜维明教授对中美之间的这道鸿沟作了以下的描绘：“中

国人的忧患意识与美国人对政治悲剧的全然无知共存。没有尝过炮火轰炸滋味的美国人怎么能够理解什么是一场真正的民族灾难呢？”〔19〕

中国知识分子看美国时的这一由“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为特征的内心世界，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历史遗留的与现实发生的种种问题，使中国知识分子要摆脱这种心境变得非常困难。何况，目前正在中国知识界出现的大规模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正是这种心境的反映。

四、在对传统文化反思的困境中

19世纪中，李鸿章看到了中国已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是在西方列强主要是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前发出的惊呼。而100多年以后，咄咄逼人地向中国传统文化发起挑战的是另一个新的文化价值体系的代表——美国。这种挑战异常严峻。纵观200多年来的世界历史，美国从弱变强，中国由强变弱。姑且不提这强弱变化背后的种种原因，就其目前力量对比来说是很不均衡的。中国现正处于改革变型时期，对自身的旧传统，究竟什么该坚持，什么该扬弃，尚在思考之中；对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究竟什么该吸收借鉴，什么该抵制，也尚在犹豫之际。更何况扬弃、坚持、借鉴、抵制的过程，从思想认识到社会实践，更需一段漫长的时间。这期间必然会有各种磨擦与阵痛。当前的中国知识分子正身处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之中。

目前，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已构成上层建筑改革中的重要部分。学术界关于文化的讨论成为“显学”。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这种反思往往与当前中国知识分子看美国联系在一起。反思是需要借鉴外部世界的种种模式的，而美国已成为最重要的参照模式之一。“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以法治代替人治的法律观念，市场调节的经济理论，已成为学术界热门的话题。不但中国的“经典文化”受到以美国为代表的整体文化体系的全面挑战，就连中国的“民间文化”似乎也“在劫难逃”。“文化的深处时常并不是在典章制度之中，而是在人们洒扫应对的日常起居之间”。“行为时最不经意的，也就是最深入的文化表现”。尽管“麦氏咖啡”的浓郁一时还不能替代中国传统茉莉花茶的清香，而迪斯科、摇滚乐、霹雳舞等等毕竟已纷沓而至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需要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中美之间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不可避免。“全盘西化”不符合我们的国情，一概斥之为“污染”而拒之门外也未免失于浮躁。中国知识分子在认识美国时，还要面对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的问题，而认识自己往往更为困难，这实在是一个困境。正如严复所说的“旧者已亡，新者未立，怅然无归”。这不仅仅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历史安排它在20世纪末期发生。

然而，意识到是一个“困境”，比身处“怪圈”而不知其“怪”要好得多。“困境”实际上是一种矛盾，进入“困境”，也就有了变化的契机。上文中提到，中国人看美国、看世界时大的概念起了变化，但习惯的、传统的、具体的看问题的角度、思维方式、语言词汇等都还没有来得及做相应的改变和调整。大概念的变化也就像建在沙丘上，因为没有实质的具体的东西来支撑它，一阵风刮来，沙丘马上就会成为平地。中美之间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仅仅想用几个名词概念来说明这些差别是无法办到的。必须从具体问题上研究起。各自的文化传统都已渗透到日常起居、举手投足之间，不从具体问题上做起，既不会认识对方，也不会认识自己。譬如说中国人凡事都讲究“正名”，即主观判断为主，而美国人则讲究“理性”，以客观实际为标准；中国人重人际关系，凡事左右考虑，个人在客观环境中越渺小越好，否则，“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而美国人却重个人独立，在主观意识上较少受客观环境或关系的牵制。凡此种种，皆是差别，有时题目虽小，却能见微知著，深入思考，往往能见本质，有助于对自身的反思，对深刻认识美国与认识自己都有积极意义。

五、结束语

“美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正在寻找对这个问题的较为完整和科学的答案。中国的美国研究，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就其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来说，这一研究的成果将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中国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21世纪。除了加强这一研究本身之外，中国还需要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如何看美国。一切尚待于实践。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问题将会对今后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持久的魅力。

注释：

- (1)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82卷，第46页。
- (2) 1988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4版。
- (3) 王作民：《美国万花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5年，第440—447页。
- (4) 陈尧光：《大洋东岸——美国社会文化初探》，辽宁人民出版社，沈阳，1986年，第35页。
- (5) 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85年，第16页。
- (6) 杨刚：《美国札记》，1983年再版，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3页。
- (7) 此处的“山德士上校”指天安门广场附近“肯德基烤鸡店”的标志。见《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10月8日，第3版。
- (8) (美)沈己尧：《海外排华百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北京，第15页。
- (9)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北京，1987年，第15页。
- (10) 李大钊：“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每周评论》第二十二号，1919年5月18日。
- (11)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202页。
- (12) “孙观汉致胡氏”，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430页。
- (13) 费孝通前引书，第36—37页。
- (14)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474—1475页。
- (15) 姚士谋、何腾高：《美国风光》，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82年，第1页。
- (16) 张海涛：《我说美国》，北京出版社，1987年，第18—21页。
- (17) 周倜：“在美国高速公路上开车”，《望》，1985年，第26期，第35页。
- (18) 彭迪：“论‘变’——评里根政府对外政策新动向”，《望》，1983年第2期，第32页。
- (19) Tu Weiming: “Chinese Perceptions of America”, 引自 M. Oksenberg R. Oxnam: *Dragon and Eagle*, 1978, Basic Books, N. Y. p.91。

美苏核军控谈判的目的及其制约因素

曹 冶、陈英选

美苏这两个用核军备武装到牙齿的超级大国，是战是和，是无休止的进行核军备竞赛，还是控制核军备发展，实行真正的裁军，这直接关系到全人类的安危，因而一直是当代国际战略问题研究的重大课题。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作为旁观者，中国学术界对此理应有独到的分析和见地，但是由于长期受固定思想模式的禁锢，人们往往简单地仅仅将其看作美苏尔诈我虞，欺骗舆论的谋略，而未能作进一步系统深入的剖析。本文试图跳出以往的公式，探讨美苏核军控谈判的意图及其制约因素，并展望其未来走向。

一、调节美苏对抗的重要阀门

美苏核军备控制谈判和核军备竞赛是对立统一的一对矛盾。二者既相互排斥、制约，又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美苏安全和争霸的战略目的。核时代的美苏对抗使全面战争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质变，单靠军备维护安全的观念不仅过时，而且十分危险。顺应历史条件的变化，核军控成为美苏调节核军备竞赛，缓和对抗，减少核战争爆发危险的一个重要阀门。随着时间的推移，美苏对其应用越来越自觉和纯熟，核军控对美苏对抗的调节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美苏核军控谈判的产生和发展与核武器的显著特点密切相关。首先，核武器具有空前巨大的摧毁力。美苏一艘战略潜艇所携带的核弹头爆炸当量，即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的所有弹药的爆炸当量总和还大；经计算，苏联只要用300颗百万吨级的核弹即可消灭美国60%的人口，美国用400颗百万吨级核弹可摧毁苏联1/3的人口和2/3的工业，而美苏仅各自战略核武器弹头总数已超过万枚；据联合国估算，美苏各类核弹头总数达5万多枚，足够毁灭地球数次。第二，核武器具有迅速、多样的投送手段，易攻难防。用陆基洲际导弹攻击对方，飞行时间不足30分钟，潜射导弹飞行时间可以更短。以陆、海、空各类平台发射的战略及战术核武器，不仅由于投送手段的多样化而具有很强的整体生存能力，也增加了对方防御的难度。第三，美苏核武器数量发展到相当程度后，任何一方都无把握在一次先发制人的核袭击中彻底摧毁对方的核反击能力。而且今后也难以根本改变这一僵局。第四，核武器耗费巨大。1枚MX陆基导弹的价格为0.95亿美元，1架B1-B型战略轰炸机的价格1.5亿美元，1艘三叉戟战略潜艇的价格为13.5亿美元，建设和维持庞大的核武库成为美苏经济发展的一项沉重负担。因而，虽然核武器是美苏建立、维护超级大国地位和影响国际事务的重要工具，但如不加以控制，也可对其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一句话，核军备对美苏既有巨大的利益，又有巨大的风险，具有明显的两重性。

由于核武器具有巨大摧毁力和易攻难守的特性，从而使全面战争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质变。以往战争的基本目的都在于消灭敌人，保护自己。但美苏在一场全面战争中，国土的每一个角落都将置于对方核打击的威胁之下，双方都有能力消灭对方，却无法有效地保护自己。因此，尽管美苏存在尖锐的利害冲突，但却戏剧般地出现了同生共死的局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理论物理学教授希普尔，把两个超级大国比喻成站在积满齐膝深汽油的地下室里的两个人，每一个人都以要点燃汽油而威胁对方。有6根火柴的人因为对方有10根火柴而更为不安，但大火点燃之后的灾难性后果对双方却是一样的。由于美苏之间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

而引起的对抗,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消除,为了避免对抗激化而导致共同毁灭,美苏需要使硬对抗转化为软对抗,即在进行核军备竞赛的同时,维持一定程度的缓和。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宣称的那样,美苏之间形成了某种求生存的互相依赖关系,双方必须把竞争的现实性与共同生存的必要性协调起来。赫鲁晓夫也认为,“如果爆发一场核战争将没有胜利者,人类唯一可供选择的道路是两种制度之间的和平共处。”美国核军控问题专家德雷尔博士指出,美苏军备控制的基础是双方都有兴趣保持稳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核军控谈判成为核时代美苏推行缓和的重要工具和安全战略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美苏利用核军控谈判维护国家安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它可以促进两国之间政治关系的改善,并随之缓解军事对抗。尽管核武器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战争逻辑,但战争,包括美苏间的全面战争依然是政治的继续。克劳塞维茨的这一论断并未过时。美苏政治关系的紧张必然引起军事对抗升级,反之则会使军事对抗降温。核军控谈判的状况如何,往往标志美苏政治关系紧张与否,并对政治关系起着反作用。1983年底美苏核军控谈判中断,使美苏之间政治气氛恶化,军事对抗加剧。而1985年3月谈判的恢复又改善了两国政治关系,并进而缓和了箭拔弩张的对抗态势。

其次,是可以增加核军备竞赛的稳定性。美苏核军备竞赛本身就是相互对抗的一个重要内容和形式。美苏核军备竞赛的轮番升级,即意味着对抗升级和战略因素的增长。美国前国防部长布朗指出:无休止的军备竞赛对美国安全和生存是严重的威胁。双方通过核军控谈判可以就核军备发展达成某种默契和制定某些竞赛规则,增强竞赛的稳定性和预见性,降低对抗性。

再次,是可以减少偶发战争的危险性。由于核武器具有射程远,破坏力巨大的特性,判断失误或出现技术事故,可能无可挽回地导致偶发核战争,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特别在危机时期,双方处于高度敏感和紧张状态,错误地引发核战争的可能性更大。这一点已为古巴导弹危机和此后其他一些危机事件所证明。美苏核军控谈判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预防偶发核战争,减少由于误解和意外事故而使危机升级为核战争的危险。美苏认为历年来通过谈判多次达成的热线协定以及建立危机处理中心协议,是加强稳定与安全的重要措施。

美苏对核军控谈判意义的认识和运用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总的趋向是,双方对核大战难以有取胜者的信念日益加强,利用核军控谈判降低对抗程度,避免全面冲突,在对立中求共存意识更加明确。战后最初10年,双方核力量都处于发展初期。当时,美国居压倒的核优势地位,尚未切实感到核武器对自己的威胁。苏联则急于改变其核力量处于绝对劣势的不利状况。双方一心发展核军备,对核裁军、核军控只是做些表面宣传,并不准备认真付诸行动。50年代后半期,苏联试制洲际导弹成功,其核力量取得飞跃性发展,改变了美国能够严重威胁苏联,而苏联对美现实威胁不大的局面,开始形成相互威胁的态势。60年代初,洲际导弹开始大规模装备和部署,美苏互为人质的关系逐步形成。因而,美国开始收敛不可一世的核讹诈态度,并修订了50年代的“大规模核报复”战略。美国总统肯尼迪强调,“不论美苏之间存在什么分歧,美苏的共同利益在于避免核战争”。1962年秋的古巴导弹危机增加了美苏寻求缓和的紧迫感,双方随即签署了《热线协议》和《局部禁止核试验协议》,第一次运用核军控达到稳定局势的目的。从此军控便成为美苏缓和政策的核心。70年代和80年代,美苏核军控不断向高层次发展,对核时代全面战争的性质和争取避免核大战的认识更为理论化。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1975年出版)中指出,“现代武器的威力使全面战争已不再是政策的工具,而只是一种孤注一掷的行动。”因此,“除非万不得已,必须避免热核战争。”苏联也作出了类似论述。基辛格认为,核时代美国外交政策的任务之一在于明确,“我们不寻求敌方无条件投降,而要制定一个约束行动的框架,以避免事态发展到威胁民族生存的地步。”而军控正是遂行这一任务的重要途径。70年代的核军控谈判,有助于美苏在进行激烈的核军备竞赛的同时,保持一

定的克制。80年代的中导条约使不断恶化的美苏关系重又走向缓和。历史经验证明,核军控谈判对美苏可以起到安全阀门的作用,对缓和美苏对抗,减少政治危机和战争危险,保持形势稳定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除了安全方面的考虑外,美苏军控谈判还附有其他目的,它们是:

1. 限制对方,保护发展自己。美苏都力图凭借实力,达成对己更为有利的协议。一般来说,苏联技术发展落后于美国,其陆基系统较强而海基、空基系统稍弱,因而在谈判中较多强调停止发展新技术装备和严格限制海、空基系统。美国则反之,一心要打掉苏联的陆基优势,保护和发展己方的海、空基和技术优势。70年代苏联依靠不断发展的实力和美国的困难,迫使美多作了些让步。80年代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但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双方在关系重大的问题上的让步总是有限的。而这种针锋相对的争斗,却使战略武器谈判等关键性谈判久拖无果,成为马拉松式的拉锯战。

2. 制定规则,减轻经济负担。美苏核军控谈判进行多年,搞了不少协议,但其中仅中导条约真正是裁减核武器协议。因此总的来说,美苏通过裁减而取得的经济效益不大。收益较多的是通过制定竞赛规则,对军备发展进行共同控制。最明显的例子是1972年达成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条约限定了双方部署和研制反导系统的规模与方式,有助于美苏避免在一个技术尚不成熟的领域内,过早地进行一场劳民伤财的竞赛。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虽然只是向上平衡军备发展的协议,但也有一些控制作用。卡特政府的国防部长布朗认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除了可增加对核军备发展的预见性和竞赛的稳定性外,对降低军备发展数量也有作用。据布朗估算,如果没有这一协议,1985年苏联可能会有3000件运载工具,而不仅是2250件;1800枚多弹头导弹,而不是1200枚。美国将被迫对苏联核军备的进一步膨胀作出相应反应,从而加重美国经济的负担。此外,军控还可通过推动缓和,间接促进双边及东西方贸易,这种交流对于经济、技术落后于西方的苏联和东欧国家更为需要。

3. 炮制条法,尽力限制他人。在核武器问题上,美苏另一个共同点是,担心越来越多的国家掌握了核武器,不仅会使美苏失去核垄断地位,还可能使其他国家能够用核武器对抗超级大国的核威胁。为此两超常常在双边和国际多边裁军谈判中进行合作,竭力设法限制他人。1963年美、英、苏拟定的部分禁止核试验多边条约,只禁止大气层核爆炸,而未对地下核试验作任何限制。这对于已获得充分大气层核爆炸数据,并掌握地下核试验先进技术的美国和苏联毫无影响,但却对广大无核国家发展核武器构成障碍。1968年在美苏推动下签署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对无核国家进行了种种限制,而对拥有最大核武库的美国和苏联却没有任何约束,这是美苏炮制的限人不限己的典型不平等核军控条约。

4. 改善形象,应付舆论压力。美苏核武库占全世界核武器总数的95%,而且仍在继续进行核军备竞赛,因此理所当然地成为世界和平与裁军舆论的众矢之的。而美苏提出的各类裁军建议,无一不有争取舆论,嫁祸对方,摆脱孤立的宣传意图。从战后不久关于巴鲁克计划的论战,到当前的削减战略核武器谈判,美苏的裁军调门虽然叫得很高,但裁减的武器却微乎其微,究其原因,无非是缺少诚意,仅仅为了应付和平舆论而已。

总之美苏核军控谈判具有多重目的,但核心是寻求核时代的稳定和自身的安全,其他意图处于相对次要地位。理解了这一点也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二、核军控谈判的制约因素

在军备控制与军备竞赛的这对矛盾中,军备竞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军备控制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因此,核军控谈判不可能超越,相反却受制于美苏军备发展和全球争霸的总体需要。战后40多年的历史表明,军备发展政策、双边政治关系和战略力量

对比对不同时期美苏军控政策的形成至关重要，成为影响美苏军控谈判发展的三大要素。

1. 核军控谈判对军备发展的从属性。美国和苏联一向认为，国家安全的首要条件是强大的国防实力，实力是威慑和打赢战争的基础。美国前副国务卿达姆称，美国安全政策有三大支柱，第一是强大的军事实力，第二是盟国的团结，第三是军备控制。实力在三者中居首位。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科克拉福特将军也强调，军备控制与军事实力相比，实力必须是第一位的，美国必须有足够的实力，以便形成强大威慑力量，这样即使没有军备控制也不怕。由此可见，在任何情况下，军事实力对维护安全都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主要依靠，而军控则处于从属地位。它的存在和进展必须以不阻碍军备发展为前提，受制和服务于美苏发展军事实力的需要。

譬如，1961年8月，苏联为了取得足够的大气层核爆炸数据，确保核武器发展的需要，竟然不惜中断禁核试谈判，恢复大气层核爆炸，并在60天内进行了30次大规模试验，爆炸总当量超过以往全部核试验爆炸当量的总和。而美国也于次年春开始，在6个月内进行了40次大气层核试验。当美苏确信不再需要大气层试验之后，方才恢复谈判。70年代，美苏战略核力量还需要发展数量，因此双方仅制定了一个向上平衡的军控协议。80年代，当美苏战略核武器无论运载工具还是弹头都已大量过剩时，双方才考虑削减。总之，只要任何一方需要发展某种武器或技术，就不可能通过谈判裁减或禁止这些武器和技术。即使达成协议也必然以不根本影响各自实力和妨碍战略核力量发展为限度。

此外，美苏的核战略对军控政策也有决定性影响，并与之形成制约关系。例如，战后美国军事战略的立足点之一是以首先使用核武器（一般是先使用战术和战区核武器），对苏实行威慑，抵销苏的常规优势。为此，美国在谈判中始终不肯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70年代之前，苏联因其陆基洲际导弹生存能力差，在战略上强调先发制人，所以也不肯接受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倡议。80年代，苏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显著增强，接受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不仅无碍于其核威慑政策，还可以制约美国，更好的发挥其常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才表示愿在与有关核国家对等的条件下达成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协议。

2. 对美苏政治关系的从属性。美苏核军控谈判虽然可以促进美苏关系的缓和，但作为缓和的工具，它必然要适应双边关系的大气候。当双方需要缓和时，军控谈判才有可能取得进展，否则就停滞不前，甚至中断搁浅。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强调，军备是各国抗争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因此关键是美苏关系的改善，否则军控难有实质性进展。

杜鲁门、斯大林时期，美苏关系处于冷战状态，双方根本没有缓和的意愿，认真的军控谈判也无从谈起。50年代后半期和60年代，美苏关系出现较大松动，双方才达成若干局部军控协议。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苏积极寻求缓和，柏林危机和东、西德问题得到解决。核军控在东西方缓和影响之下取得新的进展，双方达成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和一系列其他中小协议。70年代后半期和80年代初，美苏对抗加剧，地区性争夺激烈。军控谈判遂变得日益艰难，甚至发展到否定已达成的协议和中断双边核军控谈判的地步。80年代中期，美苏关系重趋缓和，军控谈判有新的明显进展。当美苏关系需要从对抗激化转向缓和时，双方对核军控的需求最为迫切，从而可能推动核军控谈判高潮的到来。但美苏不仅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对立，而且双方在争夺世界霸权的全球利益上针锋相对，这就决定双方关系的实质必然是对抗性的。核军控可以降低对抗程度，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对抗。这是对美苏军控谈判的第二个重要制约因素。

3. 必须适应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美苏达成的任何核军控协议都是双方实力对比的反映。力量对比决定军控谈判斗争的态势，军控谈判随力量对比的消长不断变化。

50年代末以前，美苏力量对比悬殊，美国的核力量对苏形成压倒优势，双方缺乏对等谈判的物质基础。美国不愿白白放弃核王牌，苏联拒不接受对己不利的现实，因而没有认真的谈判。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已具备对美实施强大核打击的能力，美苏相互威慑，

互为核人质的态势开始形成,产生了寻求共同安全利益的需要,因此进行了局部核军控谈判,先后签署了《热线协议》、《局部禁核试协议》,并积极推动《核不扩散条约》多边条约的签定。70年代初,美苏核运载工具数量达到大体平衡,70年代后半期各自的多弹头系统也大致相等。在此期间,双方先后达成以限制运载工具为内容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和以限制多弹头系统为主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当时,苏联军事实力处在上升势头,军备竞赛的发展趋势对美国不利。因而苏依仗有利的态势在谈判中持强硬态度,对美频频施压。美国则因被越战拖得疲惫不堪,急需喘息,在谈判中让步较多。80年代初,美国为改变对己不利的力量对比,在大力扩充军备的同时,要求摈弃70年代与苏达成的军控协议,重新制定严格限制苏联的军控协议,结果导致核军控谈判陷入僵局。80年代中期,双方战略核武器的弹头数量已超饱和。在苏联方面,由于长期的对内扩军和对外扩张,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戈尔巴乔夫被迫对苏内外政策实施战略调整,在军控谈判中主动做出一系列让步。美国自恃军事实力大为改观,企图在此基础上利用苏联的困难,争取达成较为有利的协议,遂在谈判中也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态度。双方于1987年12月达成中导协议。在中导协议中,美苏虽互有妥协,但苏的让步多于美。这正是双方新时期军事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果。

迄今为止,美苏达成的军控协议都是以整体或局部力量对比大体均衡为前提,并照顾双方的需要而达成的妥协。但在各个不同时期,双方力量对比的平衡是相对的,差异则是绝对的。占上风的一方往往得利多些,占下风的一方则被迫多作让步。

4. 影响核军控谈判的其他因素。(1) 军事技术。军事技术的发展往往会影响核军控的稳定性。如70年代初,多弹头技术的发展曾成为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主要难题;80年代定向能等反导弹技术的发展将可能促使美苏废除或修订1972年达成反弹道导弹条约。同时,新技术可为控制或禁止过时技术提供可能,为军控谈判创造有利条件。如60年代美苏都掌握了地下核试验技术之后,才肯放弃大气层核试验,否则难以达成禁止大气层核爆炸的协议。(2) 核查技术。任何条约都需要一定的核查、监督手段作保障。特别是美苏之间存在强烈的不信任感,更加需要有效的核查技术手段,以防欺骗和违约。60年代美苏掌握卫星侦察手段后,已能够监视彼此战略武器的部署和发展情况,从而为制订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提供了前提。(3) 经济形势。一般来说,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美苏对核军控的要求更为迫切。如80年代中期,苏联积极推动核军控谈判,显然有借此减少经济困难的动机。里根政府也因财政困难,被迫减慢军费增长速度,松动其僵硬的核军控立场。(4) 舆论压力。50年代后半期,世界反核运动风起云涌,加速了美苏举行禁止核试验谈判的步伐。1982年到1985年期间,欧美和平运动高涨,对推动美苏恢复一度中断了的双边核军控谈判起了一定作用。(5) 国际事变。重大国际事变对美苏核军控谈判具有一定的影响。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使美苏认识到核冲突的危险,促使双方恢复一度中断的禁止核试验谈判,加紧进行关于建立热线的谈判。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导致美苏对立加剧,推迟了美苏举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日期。1980年苏联出兵侵占阿富汗,致使美国参议院拒不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美国而后还强调军控谈判必须和苏联的其他国际表现相联系,增加了美苏核军控谈判的复杂性。(6) 国内政治。美苏军控谈判政策经常随着领导人的更迭而重新调整。赫鲁晓夫上台后修正了斯大林的强硬对美政策,宣扬和平共处,促进了缓和与军控谈判。戈尔巴乔夫批判了勃列日涅夫的内外政策,采取灵活的外交和军控谈判方针,打破了谈判僵局。美国卡特政府上台伊始,试图修改前任总统和苏联达成的海防框架式协议,遭到苏联反对,使谈判经历曲折。里根总统入主白宫后,采取强硬的军控谈判方针,拒不批准卡特政府和苏联达成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协议。另外,各派政治力量也可对政府的军控决策起牵制作用,这一点在美国更为明显。

在直接影响核军控谈判的三个主要因素,即核军备发展、双边政治关系以及战略力量对比之中,核军备发展是最活跃的因素,通常对美苏政治关系和战略力量对比的变化起着带动

作用,对核军控谈判的影响也最为明显。三大因素反映美苏对抗的本质,决定核军控谈判的走向。其他因素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一般可能影响核军控谈判的进展速度。认真分析各个时期这三大因素的状况和影响,是正确把握美苏核军控谈判现状和发展趋向的基础与关键。

美苏核裁军谈判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处于不断发展中,它随着核军备政策、双边政治关系及力量对比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战后40多年来,美苏核军控谈判大致经历了50年代的酝酿试探、60年代的局部军控、70年代的向上平衡和80年代的向下平衡四个发展阶段。每一时期的特定历史条件,对美苏核军控谈判均起到推进或制约的作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认为,在核时代美苏不可能成为朋友,但如果成为敌人,谁也受不了。换句话说,美苏的主要共同点在于确保核时代的共存,因而需要缓和,但同时又不会停止对抗和争夺。当美苏利用核军控达到缓和和目的后,就可能减缓甚至停顿核军控谈判;待新一轮争夺激化时,双方就再度推进核军控谈判,以促进缓和。美苏关系既缓和又争夺的总格局限定了美苏核军控谈判发展的边界线。

从以往的历史看,无论在哪一个阶段,美苏核军控谈判都必然根据各自战略需求的变化,经历一个从高潮到稳定,再转向低潮,又从低潮走向高潮的周期性变化。例如,60年代初的几个局部军控协议,使美苏对抗得到缓解,双边关系趋于稳定。但三、四年后,当军备竞赛又有新的发展,各自的战略核武器数量激增,并开始大规模开发反导弹系统和多弹头导弹之时,新的危机正在孕育之中,稳定即面临被破坏的威胁。对抗的升级和新的战略力量对比态势需要新的军控条约予以调整和确认,新一轮竞赛需要新的规则加以限制。于是双方又开始谈判,并达成新的军控协议。

在观察美苏核军控谈判的变化发展时,应该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美苏达成交易、双边关系趋向缓和时,不能忽视它们之间无法消除的矛盾和争夺;美苏对抗加剧时,也不可忽视它们对和平共处的共同需要以及通过谈判达成新的协议的可能。同样的评价美苏核军控谈判的客观作用时,既要看到它有利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一面,也要看到它的限度以及损人利己的消极面。任何盲目乐观和悲观,以及把美苏军控谈判贬低得毫无实际意义,或者把它的作用任意夸大的论断都不符合客观实际。

三、美苏核军控谈判的现状和前景

三四十年来,世界政治风云变幻,经济、技术不断发展,但美苏军控谈判的基本目标和制约因素却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有时动因作用明显,有时牵制因素表现得更加突出。科学的分析要求我们不仅要看到业已显露的倾向,更要看到被掩盖的另一倾向。

目前美苏核军控谈判仍处于向下平衡阶段。中导协议达成后,核裁军的大趋势已十分清楚。普遍认为,两超经济实力相对下降,更加重视以经济、技术为龙头的综合国力的竞争,需要核军控来稳定形势,推动缓和;核武器及其他军事装备质量的提高,和美苏核武库的饱和状态,使核武器的削减成为可能;人心思和,世界和平与裁军的舆论对美苏的压力增大;苏联的困难更多,更加需要改善国际环境,将不断采取主动,推动核裁军。这些看法已被事实所证明。但正确的判断要求我们还要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即核裁军的牵制因素,特别不能忘记美苏矛盾根深蒂固,不可能停止对抗和军备竞赛。看不到核削减的大趋势固然不对,但同样,认为美苏在大幅度削减战略武器等问题上,可以轻而易举地达成协议也是不正确的。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和里根连任总统以来,美苏核军控谈判进展较快,但在中导协议达成后,速度已明显减慢。当前美苏核军控谈判仍存在重大分歧,主要有:

1. 削减战略武器谈判(S T A R T)。1988年5月里根访苏期间,两国首脑再次

确认已达成的关于运载工具和弹头的总额及部分分项限额,并在某些次要具体问题上取得一定进展,然而在关键问题上,双方立场至今仍尖锐对立,主要表现在:

(1) 分项限额。美国仍坚持只规定陆基导弹弹头为3300枚的限额,并要求严格禁止重型陆基导弹的生产、试验和更新。苏则强调如规定陆基导弹限额,潜射导弹也应作同等限制。

(2) 海基巡航导弹。苏联提出对携带常规和核弹头的海基巡导应加以严格限制,而美则以此类武器难以核查为由,主张只就拥有的数量发表单方面声明,而不必进行核查。

(3) 核查问题。双方虽已拟定核查议定书、改装或销毁战略武器议定书和谅解备忘录三个与核查有关的联合草案文本,但其中尚有大量悬而未决的“空白”,特别是在具体的核查方式方面仍有大量的技术难题。

(4) 与外空武器谈判挂钩问题。美国仍坚持认为战略防御计划不违犯反弹道导弹条约,可以自由发展,拒绝把禁止外空武器作为削减战略核武器的先决条件。

2. 外空武器谈判和禁止核试验谈判。

外空武器谈判中现存主要分歧是:(1)在遵守反导条约的时限上,苏联坚持10年,美国提出7年。(2)在禁止试验的范围上,苏要求制定允许在外空试验项目的清单,以便对美国研制空间武器施加严格限制。美则主张可允许进行各种反导武器的研究、发展和试验工作。

禁止核试验谈判,双方已同意“分步走”的原则,并开始进行联合核查试验。但美国仍然不肯接受苏联提出的全面禁试的建议。

美苏关系在中导协议达成后进一步走向缓和,缓和的气氛反过来又有助于保持和推动军控谈判继续进展。人们普遍认为,近一、二年内双方就诸如改进核试验手段和批准1974年、1976年两个部分禁止地下核试验条约等次要问题,可能达成一些中小军控协议,但对能否达成削减50%战略武器协议却众说纷纭。要从复杂的表象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必须从探讨和分析美苏核军备的现状、战略意图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因素着手。

应该看到虽然大幅度削减战略核武器的条件正在逐步成熟,但这毕竟是一个关系到美苏重大安全利益的大手术,双方都不会贸然行事,也不会轻易放弃限制对方、维护自己的方针。加之存在大量技术性难题,谈判进展不可能太快,双方近期签约的条件显然不成熟。因为中导协议的签署,而对美苏谈判产生过分乐观的估计,显然是根据不足的。

1. 美苏需对战略核力量的结构作大的调整,以保证削减后各自战略核力量的生存能力。

自60年代末以来,美苏核军备竞赛着重发展多弹头武器系统,造成双方战略核力量结构呈弹头多,运载工具和发射平台少的倒金字塔形。美苏各自的战略核武器弹头均在1000枚以上,而运载工具只有2000多件,发射平台则更少。以导弹核潜艇为例,美国仅有36艘,苏联也只有62艘。如按现有方案削减,对彼此弹头的影响较小,但对发射架及发射平台的削减却可能危及双方战略态势的稳定。据美方分析,美国的战略潜艇平时将只能保持12艘在海上执勤,随着苏联海军反潜能力的不断提高,美国最为倚重的潜射核力量的生存将受到很大威胁。有鉴于此,双方在达成大规模削减协议之前,都需要对各自的战略核力量进行较大调整,如发展单弹头陆基导弹,提高导弹与弹头的比例和生存能力;建造小型战略核潜艇,以保证足够的发射平台等等。这不仅需要时间和巨额投资,还可能引起双方作战思想的相应调整。目前美国国会与军方在是否应发展机动式MX导弹和单弹头的“侏儒”式导弹问题上尚争论不休,战略核潜艇的发展计划及其作战思想也无变化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仓促成交是不可能的。

2. 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美要价较高,苏难以接受。

美苏在谈判中都极力争取有利于己的“三位一体”核力量配比方案,致使分项限额之争难解难分。特别是共和党政府一贯奉行以实力压苏让步的谈判方针,要价偏高,令苏联难以

接受。苏联也强调必须保持战略均势和足够的防御力量，绝不能单独裁军。双方已同意规定陆、海基战略核弹头的限额共为4900枚，由于苏、美分别在陆基和潜射战略导弹上占有优势，双方针锋相对，对核弹头的分项限额一直定不下来。美方只提出将陆基导弹弹头的上限定为3300枚，拒不同意对潜射导弹弹头数作任何限制。美国为发展海上优势，拟大量部署海基巡航导弹（计划到90年代中期共部署4000枚），因此不愿将其纳入限制范围。苏则主张此类导弹数目应为1000枚，其中只有400枚允许携带核弹头。在这些关键问题上，双方短期都难以妥协。

3. 外空武器谈判短期内似难成交。

在大幅度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的同时，美苏都致力于发展攻防兼备的战略武器系统。从长远看，苏终将效法美国，公开发展外空武器系统，双方在外空谈判中可能会找到共同点，并单独就外空问题达成协议。但苏目前在技术、财力不如对手的情况下，仍希望通过裁军谈判迟滞美发展战略防御计划的势头。苏在1988年的第9、第10轮谈判中更加明确地坚持将外空武器谈判与达成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挂钩的立场。在不清楚新当选美国总统对此问题可能作出何种调整的情况下，苏联的立场不会改变。战略防御计划不仅是美国争取对苏军事和科技优势的龙头，也是美国对苏施加压力的“王牌”。布什政府近期不会轻易根本改变目前的不妥协立场，僵局难以很快打破。

4. 与中导谈判相比，削减战略核武器谈判内容复杂，困难重重。

中导武器只占美苏核武库的4%，基本只涉及一类导弹，较易达成妥协，而且是全部销毁，核查也较简便。战略核武器涉及的武器种类、型号繁多，且只要求部分销毁，核查难度大得多。据报道，为监督中导条约，美只需派遣400人到苏境内视察100多个工厂或基地，而核查战略核武器，则需派遣数千人，视察点多达1800个。更重要的是双方都必须开放更多的机密要地接受核查，事关国家安危，更要慎重考虑。据称，目前双方在谈判中仍有千余个难题未解决。其中大部分与核查问题有关。

5. 盟国和内政的牵制，影响谈判的进程。

中导条约达成后，美国内部对于今后的军控方针产生分歧，强硬派认为应优先解决东西方常规力量不平衡问题，反对首先与苏达成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北约盟国也要求重新全面考虑西方的防务和军控政策，以便对苏采取统一行动。苏内部对戈尔巴乔夫在军控方面对美一再让步也有反对意见。对此，布什和戈尔巴乔夫不能不加以考虑。

美国新总统上台后，一般要优先处理大量内政问题。在安全问题上也要先确定军备发展方针之后，才会认真考虑军控政策的调整，短期内难以拿出新的方案来。苏联对美国新任总统也要观察一段时间才会亮出新一轮谈判的底牌。估计1989年美苏核军控谈判不会有大的交锋。

6. 美苏对新的军控协议的需求尚不迫切。

美苏军控谈判的首要目的是促成美苏缓和。中导协议达成后，美苏缓和已具有一定势头，双方通过军控协议推动缓和的需求已不像中导条约达成之前那样迫切。1988年，虽然美苏裁军的调子仍唱得很高，但实质性妥协却没有多少，重要的原因是，美苏对抗已经缓解，对军控谈判的压力已有很大减少。此外，双方的常规裁军问题已提到议事日程，1988年12月7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将单方面裁减常规部队50万。这对欧洲常规裁军和继续缓和无疑是个推动。从促进缓和的角度看，常规裁军的进展可以部分取代核军控谈判的作用。

上述牵制因素渊源甚深并关系到美苏重大利益，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因此要在近期达成削减50%战略核武器协议是不可能的。但不排除双方寻求过渡性协议的可能，如对削减战略武器的总限额作某些变动。在削减50%战略核武器之前，先寻求较小幅度（如1/3）的削减。但这又有可能引起新的问题和争执。看来1989年按中间方案达成协议的可

能性也不大。

但由于美苏今后将更加注重以经济力量为主的综合国力竞赛,适当缩减军备的方针不会改变。随着双方政治关系的改善,各自战略核力量结构的逐步调整,达成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的条件将渐趋成熟。在下届美国总统任内,如不出现意外,美苏签定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的现实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纵观战后40多年的历史,国际间处理相互关系的斗争和活动主要围绕两大问题展开。一是安全保障问题,也可以说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另一个是经济领域的竞争和协调问题。当前世界上只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具有打世界战争的能力,如果两个超级大国在处理彼此间的矛盾过程中,不能采取克制态度,使对抗发展为全面武装冲突,这不仅对美苏两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美苏军控谈判是双方对话的重要方式,经验证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美苏的对抗,因而对避免世界大战、维护世界和平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从这一点出发,应该对美苏对话和裁减军备持赞成态度。

但是还必须看到美苏裁军具有欺骗性的一面。迄今为止,美苏尚未达成过真正影响其军事实力的核裁军协议,所达成的中导协议仅涉及占双方核力量4%的核武器。相反,凡是有碍于军备竞赛的裁军建议都难以被接受;已签定的条约,如果在新的条件下成为发展军事实力的障碍,也要被废除。美苏关系不会因为进行军控谈判或达成几项军控协议就改变对抗的实质,两超也不会因此放弃实力第一的安全政策。任何超越这一限度的期望都是不现实的。

值得警惕的是,出于维护霸权地位的共同考虑,美苏会搞一些危害第三国利益的协议,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双方曾经拟议的在亚洲保留若干中导的中导削减方案等等。今后这类情况仍可能出现。具有最大核武库和常规武库的美苏两超率先大幅度削减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停止试验、生产和部署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并同时停止空间武器竞赛和大幅度裁减常规军备,世界和平才是有希望的。

关于现代美国经济学的 历史演变与现状的若干认识

——经济学史与分析方法论的双重考察

崔勇列

一、问题的提出

美国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中心。有很多例子可资证明: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美国经济学家居多(从1969年起,有25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其中有16人是美国经济学家,占2/3);战后在西方经济学中发挥重大影响的经济流派多半产生于美国;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学家队伍和最为完整的经济学教育体系,等等。我们提出问题的基本动因就在于试图回答:美国经济学(以上述几点为特征的)中心地位是怎样形成的或为什么

形成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西方经济学无可争辩的中心是在英国。自亚当·斯密以来（很可能从威廉·配第或更早），英国一直保持了这一殊荣。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斯坦利·杰文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阿瑟·庇古、约翰·凯恩斯、尼古拉斯·卡尔多等人，这些在经济学说史上熠熠闪光的名字，和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每一次划时代的革命和跃迁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经济学界虽稍逊于英国，但也产生过名垂史册的经济学家：如法国的弗朗索瓦·魁奈、让·巴·萨伊、莱昂·瓦尔拉斯；奥国的威廉·门格尔、欧根·庞巴维克、约瑟夫·熊彼特、弗里德利希·哈耶克；德国的弗里德利希·李斯特、威廉·罗雪尔；意大利的帕累托；瑞典的奈特·魏克赛尔；波兰的米哈伊尔·卡莱茨基；俄国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尼·德·康德拉季耶夫等。反观美国，能跻身于这一宏大行列中的经济学家，可谓寥若晨星。除了为马克思所称赞过的琼斯以外，就要数克拉克和张伯仑了（可能还要包括被视为异端的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康蒙斯和凡勃伦）。

战后美国取英国而代之，成为西方经济学中心的原因很多。其中美国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和科学技术大国的地位的确立，当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现在我们要考察的是，从纯粹的经济角度上看，美国经济学界这种地位的确立是通过何种途径、由于何种因素造成或完成的。我们发现，凯恩斯革命的产生，阿尔文·汉森对这一革命的“通俗阐释”及其政策化，是这一转变的最初和最根本的契机（1）。新古典综合派和货币学派对宏观经济分析体系的改革和进一步系统化，是这一转变得以完成的最基本的翼A

二、凯恩斯宏观经济分析体系的挑战和被挑战

凯恩斯完成了西方经济学说史上被维多利亚·希克称之为“最激动人心的”革命。（2）这固然值得英国经济学界荣耀。但若进一步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凯恩斯革命很有些“风光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意味。凯恩斯革命实际上还预示着英国经济学盟主地位无可挽回的失落，亦即以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斯密信条及建立在这一信条之上的均衡理论为圭臬的经济学说体系的衰落。凯恩斯学说不能只简单地视作对新古典学派的挑战，它实际上是对英国经济学传统中本质内涵的挑战。它必然从根本上震撼英国经济学赖以维持其荣耀和泰斗地位的全部基础。凯恩斯革命作为一个经济学说史上巨大的方法论变革发挥作用时，产生了一种相应的历史效应。这种历史效应不仅形成了30年代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不间断革命的趋势，大大改变了经济学的“势力分布”，也造成了对自身的挑战。这种挑战（我们称为反挑战或被挑战）由于凯恩斯革命的方法论意义而产生，也由于这种意义和它本身的英国属性之间的矛盾而变得咄咄逼人（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比较概括地说，凯恩斯对新古典学派的以下几个理论命题提出了全面的挑战：

1. 产品的需求和供给始终保持着恒定的均衡关系。这一点有时被称为“萨伊定律”；
2. 经济系统是在资源得到最佳配置的情况下自然地均衡地运转的。一旦出现不均衡的状态，必有一种类似力学的反向运动或校正运动，使其恢复到均衡状态；
3. 利率率便是这种反向运动的主要动力。通过调节利率，可以保证货币市场上的均衡，并促进资源的合理流动；
4. 工资率同样具有经济力学的作用。工资率和就业率保持一种反相关关系。因此，劳动需求曲线和一般的需求曲线一样是向右下方倾斜的；
5. 由于经济这种自然地恢复均衡的运动功能，政府的干预是不必要的。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对货币供应的管理；
6. 货币供应的主要作用对象，是价格水平，而非产出和就业水平。

凯恩斯的反论可以概括为：

1. 利息率并非促进企业进行旨在扩大充分就业的投资的唯一杠杆。投资在很多方面要受到投资者心理预期的影响。在萧条期间,即使利息率很低,也不能促进悲观的企业领导人去增加投资;

2. 降低名义工资率亦并非校正失业的适当办法(而降低实际工资率可能不失为增进就业的一个途径)。将工资水平弃之一旁而提高总量需求,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校正手段;

3. 政府的干预是这个已经推动均衡的“对称体系”的重要的补充动力。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和减少赋税来增加有效需求,使经济系统尽量避免在未充分就业状态下运转,是政府的职责。

凯恩斯首先创造了一个关于就业、产出、货币与价格的总量理论。就凯恩斯本人来说,他特别重视就业水平的理论含义,因为在这四者中,只有就业具有单一的总量规定。因此,对“均衡对称体系”的扬弃,表现为经济在失业存在(或低于充分就业)的条件下达到均衡。宏观经济学中的两个中心变量,即作为整个经济活动的集中标量的国民收入和决定资产流动方向的利息率,都可以在生产市场和货币市场达到均衡(I S-L M曲线就是说明这个问题),但劳动市场却常常不能达到这种均衡。正如雷诺兹所说,凯恩斯“树立了宏观经济学最基本的,也是最原始的理论框架。”(3)当然,凯恩斯的分析中也有微观的因素,如消费倾向和灵活偏好(有时称为流动偏好)等,它们都是一种行为性状,具有个体运动的含义与特征。

那么,所谓对凯恩斯革命的反挑战又是指哪些呢?我们认为,完全有必要把这种“反挑战”限定在宏观经济分析的范围之内。因此,我们把那些不是针对凯恩斯的分析方法论体系,而是针对他的理论观点的那些学派,如激进经济学派、新制度学派和某些新自由主义学派等除外。那么我们看到的真正的“反挑战”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由凯恩斯的短期静态分析到主要归功于哈罗德和多马的长期动态分析。哈罗德从两个方面对凯恩斯理论的方法论进行了补充:(一)将时间因素引进到凯恩斯关于储蓄—投资的分析中来,用按比例(增长率)的分析来代替凯恩斯的水平分析,以寻求“动态均衡”的条件。(二)将产量(收入)的增长对投资的引致作用(即加速度原理)作为对乘数原理的补充。这种分析方法开拓了现代西方经济学中两个崭新的理论领域,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索洛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提出的经济增长理论和丹尼森·肯德里克生产率理论,是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两项突出的贡献。而萨缪尔逊、希克斯、卡莱茨基、卡尔多、梅茨勒和古德温等人则在经济周期理论方面发挥了引人注目的作用。

第二,将凯恩斯的分析方法和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使微观经济分析重新步入宏观经济学领域。可以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宏观经济学领域中分析方法体系演变的主要象征。雷诺兹写道:

“经济学中的任何思想,几乎不会完全死亡。有些思想似乎在1940年已被埋葬,但现在又重新出现并赢得现代的支持者。这种思想包括:经济本来就比凯恩斯想的要稳定,……这就是说,经济学是一门活的学科,它从凯恩斯著作中汲取营养,但同时又超过它。”(4)

这个分析方法的变革是由被称为“新古典综合派”或“主流经济学派”的一些美国凯恩斯派经济学家,如萨缪尔逊、海勒和托宾等人来进行的。

第三,在凯恩斯和凯恩斯学派认为相对不具有重要性的货币领域内,产生了一个极为深刻的方法论创新。以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中心的一些经济学家强调货币数量增长率和货币收入增长率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动关系。在他们看来,这种关系是宏观经济学中的主要关系。连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也认为货币学派在完善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补充凯恩斯分析方法的缺陷方面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5)

这三个“反挑战”几乎都来自美国经济学家,他们成功地进行了一场经济学的持久战,使得战后凯恩斯宏观分析体系的完善、补充及舍弃的工作基本上得以在美国进行。当然,宏

观分析方法论体系的这种转换引起了许多非议（“两个剑桥”之争就说明了一部分问题），但它在几乎没有遇到很大阻碍的情况下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主流。而方法论体系的改变，也必然意味着经济学对象坐标系的相应调整和补充。现在，宏观经济分析体系的视野已被大大拓宽，对象范围大有延展。这不能不说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经济学家，尽管他们的理论观点是那样地不同。

三、凯恩斯以后：经济学板块在美国的重新拼接

凯恩斯在1934年11月写给约翰·希克斯的一封信中，明显地表示出对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的厌恶。他鄙夷地称瓦尔拉斯学说是“胡说八道”。在他看来，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资产和负债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积累起来的。而积累的过程是以对未来的不肯定的预期为基础的。凯恩斯不否认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方程式的解式是存在的，但它的含义却极不现实。例如，商品的实际交换总是在均衡价格下进行，则所有市场（包括劳动市场）上的需求将恒等于供给，这意味着一直有充分就业。传统经济学一直刻板地遵循着这种假设，把不肯定因素和货币包括在他们的体系之中，凯恩斯和传统经济学派分歧的症结即在于此。传统经济学认为，瓦尔拉斯的假设若多加上几个限定条件就可以用于现实（他们认为不确定因素是存在的），而凯恩斯则认为应该推倒重来。换言之，凯恩斯不否认财货市场上和货币市场的均衡，但却否认劳动市场上的均衡。这种不均衡和劳动市场的价格（工资率）并无多少联系，而和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有着确定的联系。

首先是这位希克斯对凯恩斯发难。他认为他本人和凯恩斯在30年代创立的短期分析理论仍未完全脱出新古典派一般均衡理论的窠臼。（6）他以一种动态分析方法来取而代之，这就是所谓双重均衡过程，即储蓄投资均衡过程和充分就业均衡过程。这实际上是他早些时候提出的IS—LM曲线的动态化。这一点为后来美国经济学家将凯恩斯学说和高度专门化的一般均衡理论结合起来埋下了一个伏笔。紧接着登场的是阿尔文·汉森。这位充满戏剧性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中心转移到新大陆方面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名坚定的凯恩斯主义分子的。直到1938年10月前，他都一直坚持传统的经济理论，对凯恩斯学说采取近乎鄙弃的态度。他从明尼苏达州立大学转到哈佛大学任教后，终于同意凯恩斯学说，成为凯恩斯的积极追随者，以至有人称他为“美国的凯恩斯”。他写出了《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1941年）、《经济政策和充分就业》（1947年）、《凯恩斯学说指南》（1953年）、《美国经济》（1957年）等著作，可谓为凯恩斯学说的“通俗化”、“政策化”和“美国化”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提出的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带动私人投资的所谓“泵水政策”（Pump-Priming Policy），后来经他本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成为所谓“补偿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或“逆经济风向行事的政策”。这可以说是战后美国 and 许多发达国家所施行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

希克斯和汉森所创导的将凯恩斯学说和一般均衡理论结合起来的分析方法体系，最终在美国生根并发展起来。希克斯更多地是做了理论上的准备（其中IS—LM曲线可以说是理解美国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关键），而汉森更多地是政策方法论上的阐释。这一趋势由萨缪尔逊的推动终至发展成为直到今日仍具有无可替代的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综合派”（萨缪尔逊喜欢自称“主流派经济学”，而许多人又称他们为“后凯恩斯学派”）。它成了新时期新的西方正统经济学说。这一正统学说辅之以货币学派，几乎主宰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如前所述，美国宏观经济学能够获得这种地位，是和他们在凯恩斯以来宏观经济学分析方法上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的。除了新古典综合派和货币学派的分析方法以外，这种变革还包括其他一些崭新的分析方法的创立和新的分析领域的开拓。这主要包括：

1. 瓦西里·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模型。这一模型把生产系统中的相互依赖关系描述为

各部门之间的相互投入，技术系数规定生产每单位的某种产品需要中间产品的数量。作为这一分析方法的唯一的不会受到挑战的创始人，里昂惕夫给美国经济学界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荣誉。他为美国宏观经济分析的武库增添了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它提供的是极具实验性（通常经济学被认为是不具有这种实验性的）的科学分析手段。

2. 西蒙·库兹涅茨对美国及其他国家国民收入长期变化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统计研究，以及由此提出的著名的关于经济增长的六项定义，这些直到今天仍然是这个领域中无可替代的经典性的研究。他不仅为美国宏观经济学的长期动态统计分析提供了一个牢固的阵脚，而且直接创导并大大推动了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理论及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的发展。

3.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阿瑟·奥肯的均等与效率理论。前者对补充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狭窄刃锋”的缺陷，后者则为新剑桥学派常对之加以攻讦，而且确系美国宏观经济学方法论体系中之一缺憾的收入分配理论，作出了显著贡献。均等与效率理论不仅为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微观经济政策目标之间的协调提供了一个理论依据，而且常被各国学者用来解释各种社会问题。

4. 萨缪尔逊、库普曼、克莱茵和迪布鲁等人在经济学的数理化和建立经济计量模型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萨缪尔逊这位当代经济学巨擘有一句名言：

“经济学曾像一个睡美人，等待凯恩斯来吻她……然而，她还在等待另外一个吻，数学的方法。”（7）

萨缪尔逊被认为大大提高了经济科学分析方法的一般水平。如瑞典经济学家林德白克所说，他“更多地证明了经济分析严格形式化的好处”。这是指他在动态理论和稳定性分析、消费理论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指数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及其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著名的萨缪尔逊—斯托尔珀定理）和资本理论等四个领域中的贡献。在这些领域中，他特别强调了数学方法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库普曼在线性规划，克莱茵在编制经济计量模型等方面，都更为广泛地开拓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范围和程度。这在形成美国宏观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特点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经济学板块在美国的重新拼接，是以方法论的变革和创新为主要张力的。这种张力作用的结果，便是美国经济学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正统，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导力量。

四、美国宏观经济学分析方法论的若干特点：新古典综合派和货币学派

近年来，关于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问题的研究及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译成中文的却寥若晨星。目前在我国国内，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之间的区别，多半是依据其政策主张之相异，而非依据其理论分析方法之间的相异来判定的。或者说，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之间政策对策的差别被用来代替了凯恩斯学派的学说（及其分析方法）和货币学派的学说（及其分析方法）之间的差别了。因此，简略地分析并澄清这两个学派分析方法间的差别，是有所裨益的。

1. 新古典综合派的分析方法

如前所述，萨缪尔逊、帕廷金、托宾等新古典综合派分析方法的基本特点是，将凯恩斯学说和高度专门化的一般均衡理论结合起来。具体地说，就是 $I S - L M$ 曲线。在这个曲线中，商品和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在劳动市场上，生产函数曲线引伸出的边际产品和劳动需求曲线，表现为实际工资的反函数。这两个曲线在产生三维衔接时， $I S - L M$ 曲线的均衡，使得总需求水平与产出水平的均衡，不是发生在按照已定的前提应该发生的 Y_e 上，而是发生在小于 Y_e 的 Y_1 上。于是，相应地劳动市场将出现 $N_2 - M$ 的非自愿失业。这个学派

是用下述四个方程式来回答这个问题的：

(公式略)

根据 I S—L M 曲线定义，收入、消费、投资、储蓄和利率同时由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决定。收入与资本为已知量，故生产函数决定就业水平。余下两个变量，即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若实际工资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则把某一时刻的货币工资作为一常数，即可求出价格水平。这一联立方程式和凯恩斯的理论之间的区别在于它包括利率和实际财富，并将它们作为消费的决定因素。同时，货币需求函数具有更为普遍的性质，使实际货币量的需求成为利率和国民总产值水平的函数（正是在这里，货币学派找到了一个理论突破口）。

这一体系是以下述假定为前提的：（1）所有价格具有弹性；（2）价格预期亦具有单位弹性；（3）不存在货币假象。这几种假定实际上是恢复了新古典学派关于价格的伸缩性（弹性）会保证充分就业的理论。新古典综合派试图通过两组不同的假定（与上述三项相背反的假定）来将二者纳入自身的体系中。然而其结果是，凯恩斯的理论在这个体系中似乎更没有普遍性。因为在这个模式中，凯恩斯理论还需要一些特殊的行为假定的支持。可见，这一学派的分析方法本身，就有向新古典学派复归的倾向。此外，这一方程式组表明的一种完全静态的均衡。就是说，它没有解释从最初均衡到最后位置的运动，而仅仅假定最终达到均衡。美国经济学家巴罗和格罗斯曼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是继瓦尔拉斯和埃奇沃思之后又一批竭力解决一个竞争的经济系统在失调之后如何复归到新的均衡的理论经济学家。“他们成功地说明了达到稳定所必需的条件，但是他们又不得不采用一些非常限定性的假设”（8）。英国经济学家布赖恩·摩根也认为这一学派能够在理论上站得住脚，多半是出于侥幸：

“幸而凯恩斯学派模式中并没有肯定保证充分就业。因此，对长期不均衡问题，它更易于提出答案。……凯恩斯学派假定货币工资不变。在这种情况下非自愿失业会出现，但只有在和古典学派模式中相同的基础上才会出现。……它提出的关于政府应当增加总需求而不是总供给的政策，最终成为大多数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短期政策的基础。”（9）

所以摩根认为，新古典综合派所取得的并非是理论上的，而是政策领域中的胜利。

2. 货币学派的分析方法

货币学派这一异军突起的力量，实际上也是从凯恩斯革命的躯体上孳生的，是凯恩斯革命在货币理论领域中的“阿基里斯腱”给了它最初的推动。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位才思敏捷、学富五车的芝加哥大学教授，是许多艰深而庞大的经济学著作的作者。譬如，他和施瓦茨女士合著的《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这一领域中无可替代的经典性著作。不过遗憾的是，弗里德曼的主要经济学著作，尚未被介绍到我国来。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早期货币数量论和本世纪30年代的早期芝加哥学派是现代货币学派最早的理论渊源（10）。弗里德曼本人也有相仿的观点，他认为：“过去常被称为货币数量论的东西……，现在称之为货币主义”（11）。可以说这是现代货币学派形成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凯恩斯学派在货币分析方面遗留下来的理论空缺，是货币学派得以产生并发展的重要现实条件之一。

弗里德曼认为，应将收入的资本价值化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准。他指出，收入并不仅仅是当前的收入，而主要是一个较长时期内的收入。他在消费函数理论中又进一步把它发展成为“永久性收入”的概念。据此，他提出了两个理论假设：（1）由于某些形式上的财富比其他一些形式的财富更易于变动，因此必须设定一个属人和非属人的财富之间的比率；（2）非属人财富的多元化，是以已知的报酬率为基础的。

(公式略)

在这里, k 是流通速率(它概括了一系列因子, 如利率、预期通货膨胀和属人及非属人的财富之比率), Y 表示“永久收入”的概念。从这个公式中可以看出, 货币学派侧重收入或财富效应, 而不像凯恩斯学派那样重视货币作为其他金融资产替代物的替代效应。在《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一书中, 弗里德曼用一系列统计资料证明, 货币实际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保持着密切的相关关系。货币的需求受收入效应的支配, 而有关收入的概念不是当前可以衡量的收入, 而是长期预期收入的概念。货币供求之间的任何差异, 只有通过永久收入的变化而不是利率的改变才能加以调节。货币学派对凯恩斯学派的下述假设作了重大修正: 将价格变化与利率联系起来。它意味着有一个总需求函数, 依靠这一函数, 较低的价格会通过LM轨迹的移动, 而和较高的产出水平发生联系。从而确认, 价格对于产出量具有高度刚性。英国经济学家戴维·莱德勒认为, 弗里德曼在货币分析中采用的永久收入的概念, 促使了两方面的成功: (1) 解决了为什么流通速度根据周期有所不同, 而非取决于利率的变化的问题; (2) 解释了为什么短期货币乘数($\Delta Y / \Delta M$)值会很大, 因此证明了货币的收入流通是宏观经济学中的主要机制, 而货币供应是具有决定性的政策变量(12)。

概括地说, 货币学派强调货币需求是可以观察到的大部分变量(其中最重要的是永久收入)的稳定函数。由于货币需求的利息弹性很低(即指货币和其他金融资产间的替代效应很小), 使货币保持供求均衡的主要途径, 便是相应改变收入水平。由此得出了政策结论, 货币供给既是重要的政策变量, 又是最佳的政策指示器。

但是, 货币学派目前面临着几个令人困窘的理论诘难。这些诘难主要包括: (1) 货币供应量及其相应函数虽很重要, 但弗里德曼提出的利率并不重要的论点却遭到许多人的反对; (2) 货币供应大部分是内生的, 而不是外生的(即不是由货币供应当局决定的); (3) 弗里德曼关于货币供需之间不均衡会表现在名义收入上的变化的论点很可能是“错误”的; (4) 将永久收入假定引进货币分析, 有画蛇添足之嫌, 因为货币流通的长期稳定可以用货币供应的内生因素本身来解释。货币学派最大的困难在于, 他们未能使关于货币的外生因素决定的观点(即由货币当局的货币供应而非利率决定)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宾认为, 货币学派的几个命题不能协调地揉合在一起, 中间缺乏必要的和相应的逻辑联系(13)。

总之, 美国宏观经济学中的这两大流派, 都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严格形式化的实证分析体系。尽管他们的理论都不是无懈可击的, 有许多纰漏之处, 但他们确实创造了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 为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的分析方法论体系。因此, 可以说美国宏观经济学无论在其理论内容上, 抑或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是具有代表性的。确切地说, 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是由美国宏观经济学, 亦即美国的新古典综合派和货币学派构成的。

五、关于美国经济学发展趋势的几个问题

经过战后数十年的砥砺和周折, 美国经济学已经取得了西方经济学中心的地位。然而, 现在它面临的不是这种地位, 而是它今后如何发展, 如何在理论、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这三个方面发挥作用的问题。美国是崇尚创新的国家, 许多人们所始料未及的事物, 一夜之间就可能成为一种普通的既成的现实。然而, 经济学却是一个有趣的例外。它和其他人文学科不同, 它以一个高度完整、缜密、严格和形式化的实证分析体系作为基础。经济学的创新, 在近100年内, 实际上是分析方法的创新。这种分析体系一旦形成, 便具有一种强大的惯性。

这表现为经济学史上不断形成一个正统学说的局面。即使发生什么变化,大多也都表现为现存各种分析方法诸要素之间的重新组合,或现有分析方法在某一领域中的逻辑延伸。由于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形式化、数理化和标准化的特点,在经济学领域中很难出现方法论的迅速创新。

基于这种推论,我们似乎可以说,美国经济学在近期内的发展趋势,可能有以下几个特点:(1)由分析方法上的融合,发展成为理论观点上甚至政策主张上的融合;(2)经济学的对象范围将有所扩大。经济分析方法的覆盖面,可能会扩大到某些本不属于经济学范围的社会现象;(3)部门经济学的分析,特别是有关某些中间经济单位的功能和行为的分析,将有一个较大扩充。其中前两者将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在美国出现了一个在标准经济学分析体系基础上,试图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动向。这一动向主要是由一些新经济自由主义者发动的。其中,加里·贝克尔的新经济理论和小罗伯特·卢卡斯及托马斯·萨金特等人的合理预期理论尤其值得重视。

1. 加里·贝克尔的新经济理论

1930年出生的加里·贝克尔在我国鲜为人知。然而,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他被认为是当代西方最有才华的经济学家之一,堪与经济学史上最著名的人物相提并论。他是一位把经济研究扩展到新领域这一开拓工作中贡献最大的人物〔14〕。一般认为,他在经济理论研究中推动了三项最重要的发展:即家庭学说,把经济分析的应用范围扩大到非商业性的社会及其活动中,以及关于消费者的新学说。

贝克尔认为,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或个人对工作的态度等,都是人力资本研究方法论的一个自然的延伸。如对婚姻问题的分析和对影响家庭是否要孩子的因素的分析,可以将人口现象视为一种内在因素,将其纳入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的模式之中。因此,贝克尔将经济计量原则引入了原来无法以数字来计量的领域,如爱情、利他主义、慈善和宗教虔诚等。

在贝克尔看来,经济学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人们认为经济学仅限于研究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结构。在第二阶段,经济理论的范围扩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现象,即研究货币交换的关系。在第三阶段,经济研究的领域扩大到研究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此有关的全部决定,而不管这些问题是否具有商业性或物质性〔15〕。

这些论断实际上出于他的人力资本理论体系。他指出,经济分析方法的发展,使得它的作用范围已经大大超出了它目前的使用范围本身。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开拓和探索新的未知领域方面,比其他社会科学方法要有效得多。“经济学研究否认不合理现象的存在”〔16〕。贝克尔通过他的这些开创性的研究,大大扩大了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范围。乍看起来,贝克尔又回到了微观经济学的出发点上,如重视家庭单位,重视人的行为等。但他实际上赋予了这些因素以全新的意义,而且大大超出了纯经济学研究的范围。这些因素不是资源得以合理配置的一系列动力学过程中的环节或枢纽点,而是在经济与社会系统中不断进行交叉功能活动,而且并行地作为一种整体的行为机制发生作用的始初动力。贝克尔是用现有的标准经济分析方法分析这些问题的。但是经济学对象坐标系的改变,以及对象论和方法论相互作用的机制,对经济学分析方法体系实质性的变化产生何种影响,正是需要我们拭目以待的。

2. 合理预期学派的理论

合理预期学说是美国的产物,同时又不是。合理预期的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穆思于1961年提出来的。后来,芝加哥大学的年轻教授小罗伯特·卢卡斯又奠定了合理预期学说的理论基础。然而,实际上首先系统阐述合理预期理论的主要内容的,是一位英国经济学家乔治·沙克尔。有趣的是,他是新剑桥学派的成员之一,是凯恩斯学说的坚定卫道士。他说道:“普遍失业问题告诉我们,经济行为不仅是对稀缺性作出的反应,而且也是对另一个至少同样重要的条件——不稳定性——作出的反应。”〔17〕因此,不仅要认识到,而且还要去积极地预期不肯定性的作用并为稳定经济提供各种方案。“投资选择的基础是对未来事

件和环境的模糊、不肯定和变动的预期，即在某些情况下没有坚实基础的预期”。〔18〕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的不确定性理论给了合理预期学派以诸多启示。此外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拉赫曼也对合理预期理论的形成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按照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贝内特·麦卡勒姆的解释，合理预期就是假定单独的经济单位在形成预期时利用了一切有关的、可以获得的（包括以往所提供的）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了理智的整理。这并非意味着消费者或厂商具有“完善的预见”，或者他们的预见总是“正确的”。它说明的是，经济单位考虑他们过去的失误，如有必要，就修改他们的预期行为，以便消除这些失误的因素。〔19〕

根据合理预期理论，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不能有规律地影响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期失误，这样它也就不可能对就业率的变化产生影响。在市场上，由于各种原因，工资和价格具有高度刚性的情况下，相机抉择的稳定性政策很难发挥相应的效果。不管有否这种政策，经济和经济单位都要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和随机冲击的影响。

有很多人认为合理预期理论是货币学派的附属物或分支。然而也有些人认为它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学术流派。它承袭了货币学派的诸多分析方法（二者都是以芝加哥大学为据点），但分析的对象范围却大大拓宽了。它不仅分析了货币当局对经济现象的有规则的政策反馈问题，而且讨论了以往的正统学说尚未涉足的各个社会单位对经济前景的预期及其经济合理性问题，并试图用标准经济分析方法来解决问题。

美国经济学家哈里·约翰逊认为：“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并非学术领域，而是政策的现实。新的观点之所以赢得公共和本行专家的吸取，并不在于它们的科学价值，而在于它们是否能够为解决重要问题提供解决办法，而这些问题又是已确立的正统观念被证明为无力解决的”。

〔20〕现代西方经济学，就其方法论的主流来说，是严格形式化的。各种模型和联立方程式，一般变量选择，各种参数的排列和引入，经济函数功能的推导等，都有着一定的规则和一致公认的原则。萨缪尔逊的《经济学》被认为是将西方经济学加以体系化、综合化和教科书化的典型。还有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做了大量这方面的工作。因此，各种不同的西方经济学流派之间的理论分歧，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大。譬如，后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的主要分歧就在于货币是外生变量还是内生变量的问题上；两个剑桥之间的争论，也是在投资与储蓄之间函数作用的主次问题上。在标准的分析方法体系内，各种变量和参数排列及选定，是通过一系列假定条件表现出来的。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各流派之间的理论差异，多多少少地就是假定条件的不同，而非分析方法或实际推导过程的不同。不同参数在经过标准分析以后所产生的，几乎是直接的政策结论。约翰逊的上述话，恐怕指的就是这一点。各个流派之间的分歧，并不主要地表现为理论观点或分析方法上的差异，而是表现为政策主张上的差异。这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很突出的一个特征。基于标准化和形式化的分析方法之上的政策结论，将会产生一种相互吸引、接近或补充的趋势：某种政策结论不完整的，说明它的变量或参数选定不够充分，或推导过程不够完善。因此必然会产生一种增补缺乏或未给予充分导入的变量，使变量序列的主次更动或序列本身加长的必要，以使结论显得在形式上更为完善或索性得出一个新的结论。所以旧的结论和被补充被完善了结论以及新的结论之间，存在着许多内在的联系。关于这一点，最好的回答是美国经济学界两大相互对立的学派的头面人物作出的：

美国后凯恩斯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莫迪利阿尼说：“现在我们都是货币主义者。”

货币学派盟主弗里德曼说：“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注释：

〔1〕西穆尔·哈里斯：“在美国，任何一个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的这个领域中作出的贡献都没

有汉森教授那样大。”(Hansen, *The American Economy*,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Inc., 1957, p. 6)

(2) Victoria Hick, *Macro Economics After Keynes*,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4, p. 14.

(3) 雷诺兹:《宏观经济学:分析与政策》,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7页。

(4) 雷诺兹前引书,第119—120页。

(5) 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货币主义者对当代经济学说的贡献,远比固守旧信条的人看到的要大得多。对货币乘数和货币传送机构的独创性的分析,是最近几十年来最令人鼓舞的成果之一。”(“Monetary Theory and Keynesian Economies”, *Monetary Trade and Economic Growth*; Allen&Unvin Co., London, 1962, p. 87.)

(6) John Hicks, *Economic Perspective: Further Essey on Money and Growth*, Oxford Press, 1977, p. 74.

(7) J. R. Shackleton and G. Losksley, *Twelve Contemporary Economist*, MacMillan Press, 1987, p. 221.

(8) R. Barro and H. I. Grossman, “A General Disequilibrium Model of Income and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 1971.

(9) 布赖恩·摩根:《货币学派与凯恩斯学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1页。

(10) 参见胡代光、厉以宁著《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9页。

(11) M. Friedma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Univ. Press, 1967, pp. 27-28.

(12) 弗里德曼:《失业还是通货膨胀——对菲利普斯曲线的评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8—40页。

(13) James Tobin, “Money, Capital and Other Stores of Valu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1961.

(14) 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15) 前引书,第6—7页。

(16) G. Becker, *The Economics Discrimination*, Chicago Univ. Press, 1972, p. 38.

(17) G. Shackle, *The Years of High Theory*, Cambridge Univ. Press, 1957, p. 107.

(18) Ibid., p. 74.

(19) 麦卡勒姆:《合理预期理论的意义》,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七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0) 哈里·约翰逊:《凯恩斯革命与对抗革命的货币主义》,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一辑,第107页。

从社会结构变动看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动向

邓 方

社会结构是“人们各种社会关系的模式，这种模式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1〕本世纪以来，美国社会结构经历了数次重大变动。每一次变动，都伴随着美国社会学一个学派的兴起。第一次变动是美国从农村社会（Rural Society）向城市社会（Urban Society）转变，芝加哥学派在这期间兴起。第二次变动是美国社会结构从地方互动（Local Interaction）转变为全国互动（National Interaction），哥伦比亚学派出现在这一变动中。这两个学派在美国社会学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它们集中表现了社会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征，它们的研究重点及研究方法分别统治了整个学科各30年。芝加哥学派和哥伦比亚学派是怎样在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动中兴起的？为什么这些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学学派总是与社会结构的变动相伴而生？本文将简要分析这些问题，重点阐述美国社会结构变动与社会学发展的关系，并以此为根据，指出目前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动向。

沸腾的城市与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学派诞生于本世纪初，其繁荣时期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这个学派是怎么形成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历着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变动。当时的芝加哥城把这场变革的主要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芝加哥是美国中西部交通、商业及金融中心，在开发西部的进军中，它是美国文明的前哨。1840年，芝加哥是个仅有4000多人的小镇；1890年，它的人口数量达到100多万。〔2〕人口暴涨使芝加哥在美国城市排列中从第23位跃居第2位，成为仅次于纽约的大都市。但城市人口激增还不能全面反映这种社会变动。移民的大量流入，才是美国这场社会变革的最显著特点。1900年，芝加哥市170万人口中，1/2在美国之外出生。“新芝加哥人”中，有从中西部大批涌来的农民，但更多的人来自德国、斯堪的纳维亚、爱尔兰、意大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地。移民的涌入，多种文化的混合，使由于城市人口激增所造成的社会失控陷入几乎无法扭转的危局。整座城市动荡不安。1910年，斯蒂芬斯曾这样描述：“芝加哥充满了暴力，肮脏不堪；人们无法无天，相互憎恨，处处喧闹。它敞开着犯罪的大门；它进行着厚颜无耻的交易；它无知而又野蛮。”〔3〕

芝加哥学派从创立之初，就把自身的命运与这座“邪恶之城”联系在一起了。当时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斯莫尔作为学派创始人曾提出：“社会学应当为芝加哥的社会改革作出贡献。”〔4〕这个学派的其他重要成员也对芝加哥的前途充满关注和热情。他们把城市当作“社会实验室”，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研究重点涉及城市社会问题、移民及其同化及社区亚文化等。这种社会研究所包含的前提是：揭露社会问题可以促进城市正常秩序的建立。当36万波兰移民涌入芝加哥后，这个城市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华沙和罗兹的第三个最大的波兰人聚居区。1918年至1920年，芝加哥学派的托马斯教授和助手一起，研究了这种大规模群体迁移中的移民同化问题，发表了题为《波兰农民在欧洲和美国》的论文。

这篇论文被公认是美国社会学发展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帕克是芝加哥学派的核心人物，在他的指导下，一批研究城市社会问题的论文涌现出来；如：《芝加哥的黑人》（约翰逊，1922）、《黄金海岸和贫民窟》（佐尔博，1929）等。这些论文后来都成为城市社会学和城市社会问题研究的经典著作。

芝加哥学派开创了美国社会学的一个新时代。它所倡导的实地研究，从根本上扭转了美国社会学以理论研究为重点的发展方向。这个学派对城市化及由之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以及所运用的研究方法——社区调查、参与性观察、定性分析等，在30年内统治着整个美国社会学。本世纪40年代初，移民浪潮趋于平缓，城市秩序走向正常化。美国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化这一历史时期基本结束，芝加哥学派也逐渐衰落。

全国市场的出现与哥伦比亚学派

哥伦比亚学派起始于本世纪40年代，与芝加哥学派不同，它的研究重点不再是城市社会问题，而是个人行为问题，如：读者与听众研究（Audience Research）和市场研究（Market Research）。研究方法也改变了，小范围的社区调查为全国性的抽样调查所代替；研究者不再进行参与性观察而改用问卷搜集资料；计算机处理资料及一系列统计技术的应用，使得精确的定量分析取代了定性分析。哥伦比亚学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拉扎斯菲尔德。他是一位数学博士，后来兴趣转向社会学。1940年，他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由于拉扎斯菲尔德被公认是20世纪对社会学定量研究方法具有最重大影响的人，^{〔5〕}人们通常把哥伦比亚学派的兴起归功于他。这正确无疑。但如果把视野扩大一些，便可以看到一幅描述哥伦比亚学派如何兴起的更准确的图象。

本世纪40年代，继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之后，美国社会又经历着另一场变动。这是社会结构从地方化到全国化的一种转变。全国市场的出现是这一转变的主要特征。1940年以后，美国消费品制造业的集中趋势发展很快。战后（1945—1949）大公司兼并的企业数是战前（1935—1939）的三倍。^{〔6〕}50年代后，这种趋势发展更快。兼并与集中使市场由局部扩大为全国。人们购买全国数家大公司生产的名牌洗衣机，取代了本州、本县生产的搓板和洗衣盆。大众媒介也在同期取得了重大发展。与30年代初期相比，1946年全国期刊发行量增加了两亿多份，电台数量增加了200%，有收音机的家庭增加了282%，达3400万户。^{〔7〕}1946年后，增长趋势持续不减。几家主要的期刊及广播公司控制着全国大部分读者与听众。以大众媒介的发展为前提，广告业迅速兴起，充当全国市场上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中介人。这时，人们的注意力从各自的社区转向全国，依据来自全国的信息作出各种决定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普遍现象。

全国市场的出现带来了社会互动结构的转变。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已不再是老板与顾客面对面地讨价还价；纽约人依据报刊上的广告便可决定购买洛杉矶食品公司的产品。全国市场加强了个人在社会互动结构中的地位。在地方化的社会互动结构中，个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人际关系、个人与家庭的联系及个人在社区内的影响。但在全国化的互动结构中，个人成为全国市场的组成部分，任何传统的社会关系都不再限制他的发展。社会互动从地方化到全国化的这种转变，使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区之间的联系日益削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非地区性的新型互动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一极是全国性的大公司，另一极是个人。两极依赖大众媒介来连接。这种联系方式是非直接的。

美国社会结构的这种变化，提出一类新的社会问题，即读者与听众研究和市场研究问题。大公司与个人之间的间接联系，造成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结构性的距离。生产者可以通过大众媒介向消费者传递产品信息，却没有渠道收集遍布全国各地的消费者信息。影响产品销售的原因是什么？新的生产计划该怎样制定？这一切都含混不清。在大众媒介的传播中，也

有因能力有限而难以寻求答案的问题,如:有多少听众收听某广播公司的某一专题节目?什么样的读者阅读刊登在杂志上的广告?

拉扎斯菲尔首先参与了读者与听众研究。40年代初,他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建了应用社会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所在的纽约市是全国商业、金融业中心,广告业中心及大众媒介传播中心,这成为哥伦比亚学派发展的重要条件。应用社会研究所通过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及统计分析为美国新的社会结构中相距甚远的两极(大公司和个人)创造了联系的机会。拉扎斯菲尔与哥伦比亚学派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培养了一代年轻的定量分析社会学家。在其后的30年内,哥伦比亚学派以个人行为为中心的研究重点和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统治着整个美国社会学。

美国社会结构变动与社会学的发展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科学发展的模式就是由一个常规科学传统转变到另一个常规科学传统,……常规科学传统是由一个公认的理论决定的,这个理论包含着研究方法和技巧,它指定什么疑难问题要加以研究,并且什么样的解决是可以接受的。”(8)在美国社会学的发展中,学派代表了这种常规科学传统。这种常规科学传统由“问题”、“方法”和“判断标准”三部分构成(这里及下文的“问题”是指构成研究对象的疑难问题)。芝加哥学派的“问题”是社区失序,如:暴力、贫穷、种族歧视等。研究方法以参与性观察为主。判断研究成果依据是否揭露了社区失序问题产生的社会背景。哥伦比亚学派的“问题”集中于个人行为,研究个人的社会特征怎样影响他的消费行为及其他社会行为。这个学派以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方法收集反映个人特征的各种资料,运用先进的统计技术分析个人行为。在回归分析中,个人行为变化中的大部分能够得到解释,被认为是较成功的研究。由于这两个学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问题”、“方法”和“判断标准”,它们各自在30年内吸引了大批社会学家,为美国社会学界进行了研究定向。

美国社会学在旧学派的交替中得到了发展。新旧学派的根本差别在于它们所提出的具有定向性质的研究问题不同。在哥伦比亚学派时代,美国仍然存在着暴力、贫穷与种族歧视,这些曾是芝加哥学派的研究重点。但是,哥伦比亚学派把注意力转向了读者与听众研究、市场研究等以个人行为为中心的新问题。正是这种研究方向的转移,促成了哥伦比亚学派。美国社会学的历史表明,在一个学派所代表的常规科学传统中,“问题”是核心,“方法”服务于“问题”的解决,“判断标准”表示对“问题”解决的接受程度。没有新的“问题”提出,就没有新学派的产生。

为什么芝加哥学派和哥伦比亚学派能够提出具有定向性质的新问题?为什么这两个学派均产生于美国社会结构重大变动之际?社会结构变动与定向性问题的提出有什么联系?为了解答这些问题,首先应理解“结构断裂”这一社会特征。在美国,每一种新社会结构的形成都要经历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漫长过程;在这过程之初,旧的社会结构瓦解了,新的社会结构尚待健全。这时社会呈现的特征是“结构断裂”。这一特征导致了社会失序。结构断裂酿成了社会疑难问题,社会失序体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从而能够引起众多社会学家的关注,使问题具有定向性质。

本世纪美国社会第一次结构断裂发生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时期。当千百万移民涌入城市时,他们“惊奇地发现,自己已经脱离原有社会组织,进入了现代生活”。(9)他们长期以来一直遵循的民俗民规已经失效,新的社会规范是什么?大批移民对于城市社会关系的无所适从,显示了结构断裂的特征。正是这种结构断裂酿成了芝加哥学派提出的社会疑难问题。

第二次结构断裂发生在美国社会结构从地方化到全国化的转变中。全国性市场造就了以

个人为一极,以全国性大公司为另一极的新的社会互动结构。这种结构把大公司的兴衰存亡与消费者的个人行为紧密连接在一起。个人行为以前所未有的魅力吸引着大公司的目光。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过长,使得在地方化互动结构中直接考察个人行为的大多数方法无效。全国性大公司对于消费者个人行为的考察无能为力,这又一次显示了结构断裂的特征。第二次结构断裂酿成了哥伦比亚学派提出的社会疑难问题。

芝加哥学派和哥伦比亚学派是美国社会结构变动的产物。没有社会结构的变动,没有结构断裂这一特征,就没有这两个学派赖以形成的核心问题,也就不存在这两个学派。然而,是谁首先对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动作出反应?是谁第一次提出具有定向性质的研究问题?芝加哥学派和哥伦比亚学派不仅是美国社会结构变动的产物,而且是学术精英所创造的产物。芝加哥学派的帕克和哥伦比亚学派的拉扎斯菲尔德正是这样的学术精英。他们对社会变动高度敏感,善于识别具有定向性质的研究问题;同时具备充分的应变能力,为解决不同的社会疑难问题,提出了适当的研究方法。

当前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动

美国社会学的发展表明,美国社会结构的每一次重大变动,都表现出结构断裂的特征;这种结构断裂酿成导致社会失序的疑难问题。正是这种疑难问题,为学术精英创造社会学学派提供了条件。因此,观察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动向,首先应分析当前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动。

当前,美国社会结构正处于第三次变动之中。这是社会责任结构从分散到集中的变化,它始于本世纪60年代。社会责任结构是社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社会生活中人们责任关系的模式。这种责任是对合法权益,即应该享受的不容侵犯的权利的保护。责任与权利,存在于社会互动之中。例如: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社会互动中,对于产品质量的要求是消费者的权利,生产者的责任是保证产品质量,而消费者的责任是服从市场价格,以保障生产者获取利润的权利。没有互动关系,就没有责任关系;互动关系的变化也会导致人们责任关系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社会互动结构的特点是地方化。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区之间都有较密切的关系。由于互动对象相互承担责任,那时的责任结构是分散化的。例如:养育子女、赡养老人是家庭的责任;地方教会除了办学,还承担排除社区内部纠纷的责任。第二次社会结构变动以后,传统的互动关系消失了,分散的责任结构也不复存在。全国市场的出现,大众媒介的发展,把人们的互动关系扩大至全国。在个人为一极,各种全国性机构为另一极的新的互动结构中,朋友、家庭与社区不再是责任的主要承担者,而全国政府的作用却越来越显著。社会责任结构呈现集中化趋势。

美国社会责任结构的集中化,不仅使人们向联邦政府提出越来越多具有合法权益的要求,而且联邦政府为了保护人们的合法权益,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施各种社会立法和社会政策,它们包括教育、卫生、就业、福利及住房政策等。60年代中期签署的民权法、选举法、中小学教育法及医疗保健法等,体现了联邦政府对社会责任结构集中化作出的强烈反应。以民权法为例,二次大战以前,美国黑人大部分生活在南方农村。在分散化的责任结构中,他们各种合法要求的承担者是地方机构甚至某些个人。这种责任结构不利于取消种族歧视,因为分散削弱了合法要求提出者的力量。战后,许多黑人迁居到北方城市,即使留在南方的,也随着社会互动全国化的过程,开始与全国市场和大众媒介建立联系。黑人不必要再向任何个人及地方机构乞求合法权利,他们在集中化的社会责任结构中组织起来,“为争取就业和自由向华盛顿进军”,〔10〕向联邦政府提出取消种族歧视的合法要求。1964年民权法的签署,标志着维护黑人权利的集中责任结构的建立。

80年代,社会责任结构集中化的趋势仍在继续。1988年总统竞选中,如何对人们具有合法权利的各种社会要求作出反应,已成为获取选民支持的关键。人工流产、爱滋病及

学龄前儿童的照料等社会问题，都成为两党政纲的重要内容。(11) 在分散化的社会责任结构中，任何引起总统候选人激烈辩论的这类社会议题，都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那时，从没有人向联邦政府提出类似要求，因为这些责任都被认为应由个人、家庭或社区承担。

当前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动同前两次一样，具有结构断裂的特征。社会责任结构集中化以后，联邦政府承担了制定社会政策的主要责任，但它的能力不足，表现为不能对与社会政策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作出准确与及时的判断。例如：某项政策涉及的领域该有多宽？正在实行的政策是否有效？某些政策是否应当继续下去或是否应当修改？联邦政府判断能力的欠缺，是由于信息不足。在分散化的责任结构中，关于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保障的信息反馈是短距离的、直接的。责任结构集中化以后，政策在联邦政府制定，实行却是在地方上。信息传递不仅距离过长，而且是间接的。这给信息收集带来了严重障碍。原有的信息反馈渠道已经无效，新的有效的反馈渠道尚未形成，这是社会变动中结构断裂的特征。这种结构断裂使人们具有合法权益的社会要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影响社会正常秩序的建立。

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动向

当前社会变动中的这种结构断裂，为美国社会学提出了新的疑难问题。个人的具有合法权益的要求怎样结合成社会的选择？一项适当的社会政策怎样才能施展充分的效力？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当前美国社会学具有定向性质的研究问题。尽管若干年前，这种社会政策研究还鲜为人知，目前也还没有形成像芝加哥学派、哥伦比亚学派那样的社会学常规传统；但它必定迅速占据美国社会学研究的中心地位。因为美国社会结构的每一次变动，都为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能。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由于第三次社会变动所产生的结构断裂，以社会政策为研究重点的美国社会学正在孕育着常规传统的重大突破。为了充分理解这一新的动向，有必要说明什么是社会政策研究。

美国社会政策研究的种类很多。(12) 当一种社会要求被较多地提出时，所进行的研究被称为“社会实验(Social Experiment)”。这是在局部地区进行实验，以检验与这种要求有关的政策规定。这种研究为最高层制定政策时提供信息。一项社会政策实行的初期，通常进行“形成评价(Formative Evaluation)”。这种研究是为了发现政策在实行中的不完善处，提供信息给负责执行政策的管理者，他们有责任使正在实行的政策趋于完善。“总结评价(Summative Evaluation)”是关于政策效果的研究。它为较高管理层提供信息，以决定某项政策是否收到了预期效果，是否还应继续。以上三种研究分别在政策制定时期、实行初期和末期进行，研究结果为不同层次的管理者提供了信息。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以政策实行结果为研究重点。一种新的社会政策研究正在出现，它的研究重点不是政策实行结果，而是实行过程，因此得名为“过程评价(Process Evaluation)”。这种研究把与实行一项政策有关的各个部门看作一个组织系统，检验实行政策之初投入系统之中的钱、财、物等资源是怎样从最高层逐级向下运行，直至产生最后效果；考察在运行过程中资源是否以及为什么被挪作他用或效益不高，以至整个政策被歪曲。与那种仅仅以政策结果为着眼点的研究比较，“过程评价”更成熟了。它注重检验组织内部的各种功能，使社会政策研究向纵深发展。

预言美国社会学孕育着重大突破的根据是什么？一切“重要的科学发现都始于异常”，(13) “异常”的发现、扩展及其适应构成了科学发现的全过程。美国社会结构的“异常”发展，为社会学常规传统的重大突破提供了条件。这种“异常”在哥伦比亚学派时代已初见端倪。当前美国社会变动所产生的结构断裂，使这种“异常”逐渐扩展。

美国社会结构的“异常”发展，表现为社会学研究第一次成为社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次社会变动所产生的结构断裂，使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行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社会政策研究不仅正在解决那些新的社会疑难问题，而且正在使它自己成为一种信息反馈渠

道,这个渠道是美国社会责任结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社会学第一次由立足于社会之外,进入社会之中,成为个人与政府及其他全国性组织的中介物。这种变化出现在哥伦比亚学派时代,在第三次社会结构变动中,它开始引人注目。

观察当前美国社会学在研究目的及研究发起者方面的变化,有助于理解美国社会结构的这种“异常”发展。

美国社会学第一次以提供信息为主要研究目的。芝加哥学派研究城市问题,目的在于发展社会学理论。托马斯的《波兰农民在欧洲和美国》,是他为了讲授“移民”和“社会态度”这两门课程而设计的研究项目。虽然当时的社会学家都关注着城市社会问题,但这种关注并非直接干预,而主要包含于一种假设之中,即:揭露社会疾病可以促进其解决。在哥伦比亚学派兴起之初,读者与听众研究及市场研究都是以提供信息为目的的。但当具有定向性质的研究问题被扩大到各种个人行为时,多数研究在设计时仍然以发展理论为出发点。最显著的实例是关于个人社会经济特征如何影响个人社会地位的大量研究,它们的研究目的显然不是提供信息。当前的社会政策研究,是以向政府或其他全国性组织提供信息为目的的。这种研究可以对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但这并不是政策研究的出发点。

美国社会学第一次主要由从研究成果中获益的行动者担当研究发起者。全国性的互动结构使信息具有价值。社会政策的研究成果,为政策制定者带来了直接利益,那些受益者们根据研究结果决定如何行动。在芝加哥学派时代,却不存在这种直接的收益者。当时可能不少人阅读过《黄金海岸和贫民窟》等论文,但多数读者对城市社会问题不能产生直接影响,决策者们采取任何改革措施时,也不以这些研究成果为依据。哥伦比亚学派形成之初,全国性的大公司是市场研究的直接受益者,随着研究重点转向个人各种社会行为,大部分研究成果不再使特殊的行动者受益。第三次社会变动以后,美国社会学的多数研究成果都有了直接受益者,使得社会学研究的发起者发生了变化。芝加哥学派时期,社会学研究的发起者是学者或提供资助的慈善机构,这些人并不等待研究结果,以决定如何行动。与之相反,社会政策研究正越来越多地由政府和各种全国性组织发起。因为他们是行动者,研究成果提供的信息,对他们至关重要。美国联邦各部,例如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交通部、劳动部等都曾是社会政策研究的委托人,他们委托具有研究能力的大学和社会学研究机构,进行特定的社会政策研究。

在某种意义上,美国社会第三次结构变动比前两次深刻而且影响重大。它把社会学研究与社会结构融为一体。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化,使社会学的常规传统孕育着重大突破。全面论述这即将到来的发展,尚有一定困难。可以预料的是,这一突破将使社会学的理论重点发生转移,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框架。

长期以来,由于个人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是不重要的,社会学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各种社会群体是怎样影响和限制个人的行动。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关于社会现象的定义规定了这一理论重点。“几百‘动作状态’,有定或无定,是由外界的强制力而使个人感受的;又或一种强制力,普遍的存在于团体间,且有他固有的存在性,压迫个人,而使个人感受的,叫做社会现象。”〔14〕其后有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论述,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对个人价值观影响的分析等。全国市场与大众媒介使个人的力量得到加强,在新的社会结构中,个人虽然仍受到社会群体的限制,但同时又可以以自己有目的的行动影响社会的发展。个人的意愿怎样变成集体的选择?个人的有目的的行动怎样结合成社会系统的行动?描述这种个人到社会水平的转移过程,是当前美国社会结构提出的重要理论课题。面对这一课题,原有的社会学理论已显得能力不足,具有敏感性的社会学家们正尝试创建新的理论。虽然美国社会学界目前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仅仅是开始,但正如著名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所指出的:“毫无疑问,这个课题(指个人到社会水平的转移过程)是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最有前途的新领域。”

〔15〕

注释：

- (1) Jonathan H. Turner, *The Structure of Sociological Theory*, 4th ed., The Dorsey Press, 1986, p.407.
- (2) 本节统计数字, 均引自 Martin Bulmer, *The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p.12-28.
- (3) Jane Addams, *Twenty Years at Hull-House*, New York: Signet, 1960, p.x.
- (4) 同(2), 第23页。
- (5) Michael Mann, ed., *Macmillan Student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Macmillan Press, 1985, p.203.
- (6) 林克等:《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300页。
- (7) 《美国历史统计: 殖民地时代到1970年》(1976年版), 第775页。
- (8) 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109页。
- (9) 同(2), 第50页。
- (10) 林顿:《美国二百年大事记》, 上海译文出版社, 第424页。
- (11)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7, 1988.
- (12) James S. Coleman, *The Structure of Society and the Nature of Social Research*, Knowledge: Creation, Diffusion, Utilization, 1980, (3):333-350.
- (13) 邱仁宗:《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 知识出版社, 第110页。
- (14) (美) 涂尔干:《社会学方法论》, 许德珩译, 1924年, 第1章。
- (15) James S. Coleman, *Social Theory, Social Research, and a Theory of Action*, AJS Volume 9, Number 6, 1986, pp.1309-1335.

“太平洋的东部首府”洛杉矶(二)

——一个被低估了的美国城市

王受之

三

洛杉矶人口混杂、种族繁多, 因而又被称为美国的第一个“第三世界都市”。

目前洛杉矶大都会共有人口1260万, 2000年将会达到1640万, 2010年更将有1830万人口。按人口算, 这是世界12大都会之一。而如果按其面积与财富计, 洛杉矶可列入世界头几号。根据彼得·霍尔(Peter Hall)的《世界的都市》(*The World Cities*)一书, 1950年世界12大城市中有7个在北美洲与欧洲, 而到2000年, 12个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中只有两个在北美洲——纽约与洛杉矶, 到那时欧洲的大城市就排不上号了。

不少第三世界国家人口急剧增长,大量人口流入都市,因而造成大都市化现象。比如墨西哥城即为一例。这种类型的大都市是国家贫困化的标志。而洛杉矶则与东京一样,人口的增加反而是财富与实力的标志。事实上,2000年的世界12大都市中,从经济、金融、科技、教育等方面看,只有洛杉矶与东京可以列入发达的后工业化都会(Post-industrial cities,后工业化是一个社会学术语,指信息化时代的社会特征)。其他一些,如墨西哥城,将会进一步贫困化,亚洲的其他一些大城市则仍将为实现工业化而奋斗。

为什么洛杉矶会有这种奇特的地位呢?除了上述那些因素之外,值得特别讲讲的是它的大量移民。我曾几次去过东部几个移民局,如费城的移民与归化局,那只是一间比教室略大的小房,坐着二三十个人等着办手续。而当我陪一位亲戚去洛杉矶市中心的移民局时,发现那个房子简直大如一个室内运动场,几百号人出出进进,加上其他独立办公室,一日处理的申请入籍,申请永久居留,申请合法大赦,申请考试,申请亲属入境之类的案子数以百计。相比之下,东部、中西部的那些大城市的移民局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就拿考驾驶执照为例,也可说明洛杉矶移民量之大。我的第一个执照是在宾夕法尼亚州取得的。笔试用英文考卷,无一例外。等我转到洛杉矶工作之后,出于对工作方便的考虑,我去本地一个区的车辆管理处(称DMV—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去申请换一张加利福尼亚州的执照。按本州法令,外州取本州执照,无需考路试,但要笔试,因为州与州之间的交通规则有所不同。我走入试场时,管考的那个女孩问我要什么文字的考卷,吓了我一跳。我当时想,大约不外是英、法、西、葡、德文吧,还有什么别的?于是开玩笑说“中文”。没想到她居然就拿出中文考卷来了。中文有,日文、朝鲜文、越南文也会有。考完之后取得新执照,与那个主管的官员聊了几句,问他为何设这么多语种试卷与其他文件。他说新移民像潮水一样涌进来,大多不会英文,难道因语言不通就不许开车吗?

在70年代初期,洛杉矶移民数是下降的。当时房价贵,产业不兴,使不少人望而生畏。但从70年代下半期起,移民越来越多,终成洪水状的涌入。不少原在美国其他地方的外国移民,也因洛杉矶就业好、收入高,而从外地移入。甚至外国留学生也有不少放弃旧校,在此就读。这里不少大学的外国留学生数字之高是惊人的。上个月我在长滩玛里奥特大酒店与加州大学长滩校区研究生院院长和外国学生部主任聊天,他们二位告诉我,单长滩校园目前就有外国留学生8000人。

随着外国移民的增加,拉丁语裔(南美洲、中美洲移民)与亚洲裔的比例日增,大有直迫大洛杉矶区欧洲裔(英语称“盎格鲁”,Anglo,出自Anglo-Saxon,指原籍英国的移民,目下泛指欧洲裔白种人)之势。欧洲裔比例将会从目前占全区人口50%下降到2010年的40%,美国黑人则少有增加,将从9%升到10%。亚洲裔则会从目前的6.2%升到9.3%,达百万人之多。最大的一支应是西班牙语裔(主要是墨西哥人),他们在同期将从目前的24%升到40%,达400万人。这些新移民大多教育水准较低,语言不通,缺乏高技术技能,因而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他们大多住在城区中,使得洛杉矶变成名副其实的“第三世界城市”。

如果你到洛杉矶市中心的百老汇大道走走,你就会感到界线分明的社区现象。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这条街是以欧洲裔中产阶级为中心的。而现在这条街的中部与南部是西班牙语的世界,北部一段则是唐人街。在西班牙语区,连电影院放的电影都是讲西班牙语的。

亚洲人是此地最令人注目的一群。中国人是此地最早的亚洲移民,目前他们已不只在唐人街一处。除黑人区、全西班牙语区和极贵的白人区之外,几乎整个洛杉矶都有华人踪影。蒙特利公园区由于台湾人多而被称为“小台北”。此外,如阿罕布拉、拉·豪地、林肯高地、帕萨迪纳也有成片的中国城。在这些区内,你就是一句英语不会讲也没问题。中文报纸、中文杂志、中国餐馆、中国公寓、中文路标、中文电话本、中文广告、华语电影院、中国人的超级市场、中国人开的车行,甚至华语广播电台、华语电视节目,一应俱全。我在唐人街上

的感受是好像把广州西关的一块，加上香港西营盘的一块移来一样。

美国政府几年前接收的一大批越南难民，大多数选择在洛杉矶定居。橙县的两个小市镇威斯特敏斯特、加登格罗夫之间一条三四公里长的博尔萨大道，以前几乎是条荒弃的烂街，而现在有几百家越南人的商店、银行、餐馆。这个地区因之被称为“小西贡”。整个洛杉矶地区目前共有越南人（含华裔越南人）12万人。这条博尔萨大道已成为美国越南人的“首都”，每到星期日，数以千计的越南人在此购物、逛街、上教堂。一个曾去过越南打仗的美国退伍军人告诉我，他有次夜里到博尔萨大道一家法式越南咖啡馆坐了一下，感到好像回到60年代的西贡一样。

如果讲移民狂，最好的例子是“小台北”蒙特利公园区了。这个“都市村”离洛杉矶市中心8公里，位于安静的圣·加布里尔山谷，15年前是欧洲裔、拉丁语裔白人的居住区。现在，这个区的6万居民中有一半是亚洲人，并且大部分是中产阶级亚洲人，一跃成为美国最重要的亚洲人社区之一。

另外一种移民是较少为人注意的。由于洛杉矶的经济发展，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中产阶级上层的欧洲裔技术人员、科学家、商人和其他专业人员近年也都移入本市。他们为此地的更好的工作机会、更高的收入所吸引，从东海岸、中西部，甚至从加州的另一大城市旧金山移入本市。不但为洛杉矶的经济发展起刺激作用，而且也改变了这个市新移入者的结构。

新移民的发展区主要在城东、东南部。西南部是传统的黑人贫民区，生活条件差，犯罪率高，帮派成群，至今形同一个“废城”；西部，特别是西北部则是传统的上等区，包括比华利山、贝尔-艾尔（Bel-Air）、布兰伍德（Brentwood）、太平洋-巴里沙德（Pacific Palisades）等区。新近里根总统已在贝尔-艾尔买了一所大房子，作卸职后的永久住地（他的牧场与别墅在洛杉矶北部边缘的圣塔-巴巴拉）。因为贵人迁入，大多认为目前那些豪华的住宅太小，不够豪华，因而当地业主纷纷拆掉旧屋，另建大院。这股浪潮叫“tear-down”（“拆倒”）。那些占地200到300平方米极为典雅的旧屋，一间间被拆了，建起巨大的700到900平方米的私人“庄园”，内中从网球场、游泳池到巨大的花园一并俱全。有些大到几公顷。这些区可能是世界上地价最贵的地段，一公顷左右的地（不含建筑）要200万美元以上，在上面再建屋宇设备，卖价达千万美元。当人们听说里根的那间屋子的室内装修花费400万美元时，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你如果在那些绿树掩映的区走走，不会看见西尔维斯特·斯泰隆像《第一滴血》、《洛奇》中那样周身是汗在练跑步，不同的是四周总有七八个保镖跟着跑。那时，你才会想到这个区是“何方神圣”的住所。

四

我1987年花了不少时间在东海岸看博物馆。由于我研究的主题之一是当代艺术，当然少不得整天泡在纽约，特别是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古根汉姆博物馆等。记得一次在刚刚落成的大都会博物馆现代艺术部——华莱士厅中看一些后现代主义的作品时，遇到一位在费城艺术博物馆远东艺术部作负责人的艺术史家，谈及现代艺术收获，她相当权威地说：在美国想看现代与当代艺术品，只有五个馆是一流的，即纽约的这个馆，MOMA，古根汉姆，惠特尼艺术博物馆，再就是洛杉矶新近落成的“当代艺术博物馆”。她说：纽约之外只此一个，别无分店。以后我了解日多，方知洛杉矶的文化也随经济共生，日益强大，日益丰富。

如讲古典作品，洛杉矶当然不是纽约与芝加哥的对手。纽约的那批被称为“强盗男爵”的海外艺术品搜集富商，芝加哥那批以牛肉生意起家的财主，在19世纪几乎把世界上能花钱买到的艺术珍品都买了过来，而洛杉矶当时还是一个荒野中的小城。洛杉矶直到本世纪中

期还是以无文化而出名的。世界闻名的“行动绘画”大师杰克逊·皮洛克的一张作品在50年代居然被随便扔在洛杉矶县艺术博物馆的一间库房内；一张在此馆陈列的毕加索作品也居然因被视为“共产主义宣传”而被取下。当时美国艺术界的人一听到洛杉矶就皱眉头，认为是艺术的沙漠。

但这种情况已成史迹，艺术活动目前在洛杉矶相当活跃，在某些门类中甚至超过了纽约。由于这个城市日益富有，人口更多，并且又有种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社区，因此这个城市的艺术更具其多样性与复杂性。对于大多数中产阶级欧洲裔美国人来说，他们更乐于听到洛杉矶已成为西海岸的文化中心与艺术中心这一讲法。因为经济中心是可以统计数字表达出来的，洛杉矶的经济地位无人可以争辩；而艺术中心则大多是一种无形的公众估评，更为难得。洛杉矶的有钱人一直在不断地大买特买新旧艺术大师的作品，在市内到处购置具有历史价值的旧建筑。这些人在自己的后院建造雕塑及花园，以至《洛杉矶时报》上的房地产广告出现“……后院可以陈设你的亨利·摩尔作品”之类字样。

作为本市艺术活动的核心，是两个新近落成开放的艺术博物馆。《新闻周刊》为此刊文宣称：就当代艺术家这个更为广泛的国际圈子来讲，洛杉矶是可供画商、收藏家去找寻他们作品的新地方。1986年12月，洛杉矶当代艺术馆在市中心开幕，存有当代重要艺术大师作品600余件，全部是本世纪40年代以来的作品。这个博物馆的英文缩写MOC A立即成了美国艺术界的“行话”。这个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是一个日本人设计的，由各种几何形的现代结构组成。顶部是一个透明的玻璃金字塔，加上印度沙岩红墙、铝质构架，在南加州的丽日蓝天之下实在是现代之极。另一个则是已有23年历史的洛杉矶县艺术博物馆所辟的新馆区。这个新馆同旧馆面积一样大，于1986年11月开幕，共耗资3500万美元，叫罗伯特·安德逊厅，专门陈列现代艺术品。这个博物馆目前还在建造一个新馆区，将用来陈列日本艺术品，特别是江户时代的日本绘画。

帕萨迪纳区的诺顿·西蒙艺术博物馆，也是一所国际级的艺术博物馆。馆主诺顿·西蒙最近计划把他另一部分艺术藏品送给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的博物馆，这批艺术品总值7.5亿美元。另一个巨富保罗·盖迪（Paul Getty）在西部海滨的马里布已有一所相当可观的保罗·盖迪博物馆，由于他近年藏品日多，旧馆已装不下了，于是在布兰伍德区山顶上建立一个新的艺术博物馆，并成立盖迪人文与艺术史研究院的总部。这个新的盖迪博物馆主要收藏古希腊与古罗马的艺术品。盖迪的经济大本营盖迪信托公司对这些艺术品的投资以亿元计，真是叫人搞不清他到底有多少资本来支持这种艺术收藏热。另外，盖迪已无条件地送了300万美元给洛杉矶县博物馆，100万美元给市中心附近的西南艺术博物馆。

除了这些正统的艺术博物馆外，洛杉矶还有一些特别的艺术中心。比如霓虹灯艺术博物馆，是世界上唯一收藏与展示商业霓虹灯的地方，并且还提供条件与场所给艺术家利用霓虹灯从事创作。市中心区的另一所非牟利性的洛杉矶当代艺术展览中心，则支持、主办各种艺术活动，比如外国人喜剧节，新表现主义展等等。

在表演艺术上，洛杉矶也急起直追。橙县表演艺术中心是一所新落成的演出大厅，有3000个座位，另有一个300座的排练厅。另一个1000座的剧院正在计划兴建之中。这个表演中心完全是以从私人募款的方式集资兴建的。有钱的洛杉矶人为这个表演中心捐献的钱总数达1.4亿美元！这是全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全私人募款支持表演艺术的项目。洛杉矶人此举，的确叫东部一些知名人士目瞪口呆。而市政表演中心，洛杉矶众多的音乐厅，话剧中心分布于整个大都会各区，使得洛杉矶成为许多外国大演出团体来美非到不可的一站。比如1987年在纽约演红的英国歌剧《悲惨世界》（据雨果同名小说改编），在纽约结束后即到此上演；在纽约相当成功的另一个歌剧《尼克松访问中国》，1988年4月刚结束即移到洛杉矶上演。洛杉矶已成为美国西部文化的首都，并且有直追纽约成为全美第一之势。

五

随着洛杉矶的经济、文化、政治地位的急剧发展，官僚结构、权力结构、能源与交通、犯罪与毒品等等问题也随着产生。许多美国社会学家认为，洛杉矶在发展上已“超越时代”，因此今天这里出现的现象，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明天所会遇到的问题。因而不少人对之相当感兴趣，相当关注。

首先是一个又旧又新的问题：种族歧视。以前在洛杉矶市中心工作的上流人、大商人，大多住在帕萨迪纳、圣·马利诺，或汉柯克公园区，这些地区都在市中心以西或西北几英里。这种地区具有白人至上、种族歧视的传统。比如市区的“加利福尼亚俱乐部”和“约那桑俱乐部”只接受白人会员，并且无视1987年通过的洛杉矶反种族歧视法。目前亚洲裔、西班牙语裔的移民社区不断扩大，对这种歧视已有所冲击。但如果一个非白人进入这些区，你仍有明显的受歧视感。我教书的大学处在帕萨迪纳一个富有的清一色的白人区内。有时开车走小路，穿过那些花园一样的住宅区时，那些牵狗放风的老太太、带着收音机慢跑的老头、开着欧洲名车乱冲的青年人都会用一种冷冰冰的眼光盯着我，好像见了鬼一样。

但从总的讲，洛杉矶如果不打破种族的藩篱，可以说已无法取得事业的大成功。因为这里白人所占比例已非优势，特别是重要的几个区几乎都有各种民族居住。“种族合作”在这里是一句时髦的口号。《洛杉矶时报》大老板的夫人、现任经理的母亲罗斯·钱德勒就是在设法取得各种族、各社区、各阶层的支持以后，才得以在市中心崩克山建立了偌大的洛杉矶音乐中心的。

黑人市长汤姆·布莱德利是一个很好的典型。虽然黑人目前只占本市人口的少数，但这位黑色皮肤的市长却已连任三届了。有不少白人背里骂他无能，但从他的任职看来，他是洛杉矶史上最有效率、最能干的一个市长。他能使各种族的人都对他有好感，事无大小，只要他认为重要，他都要过问，并且手段高明，干净利落。我遇到的一些拉丁语系居民或亚洲居民，谈到他都交口称赞。最近市中心区乱停车几乎成了灾，布莱德利立即宣布把罚金提高到55美元。并且添置了一批特制的轮胎铁卡，吃了罚票还走不了，非得找到警察不可。前日中午最多人时我开车到市中心办事，交通状况果然好多了。人人讲起1984年奥运会都记得主持人尤伯罗思，但很少人想到，如果没有这个市长用人、决策的高明，奥运会根本不可能在“他的”市内举行！

种族之间的这种新合作关系，是美国其他大城市极少见的。上面讲到的那些大博物馆，其捐款来自各个社区；不少大的花钱的活动，也得到各社区的支持。正因如此，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洛杉矶县艺术博物馆新馆都是国内第一流的大艺术中心，同时也是美国唯一没用政府一文钱（即纳税人的钱），而全靠人民——各种族的——捐款而建成的。这种新型的种族合作、团结关系，真使得那些整日为种族问题焦头烂额的东部市长们羡慕不已。

当然，在许多方面种族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以政治为例，在15人组成的洛杉矶市政府领导中，盎格鲁人（欧洲裔白种人）占了10个席位，而他们所代表的欧洲裔白人只占市区人口41%；另一方面，占全市36%的西班牙语系人口在市政府中只得到两个席位，而亚洲裔居然无一席位！这种情况各地都有，但在洛杉矶尤为突出，以致美国联邦司法部下令要洛杉矶市政府在选举时要执行社区平等原则。

洛杉矶最头痛的问题当推非法移民——主要是从墨西哥偷渡过来的非法移民。美墨之间有极为漫长的接壤，从得克萨斯州厄尔·巴索市一直到加州的圣迭哥市，1000多公里的边界，几乎无法挡住移民的洪流。我曾到过一个小村子，灰尘扑扑，商店里黑黑的，所用收款机是30年代的，人人讲西班牙文，村子里一路全是土路，小孩在泥中玩，猪在树荫下拱泥。我一进村，家家开窗看我，真怀疑自己是否走过边界到了墨西哥了。在那干旱的开阔地段，到了夜里，三五成群的墨西哥人移开铁丝网，步行到小村、小市，再交钱给“人

贩子”，由他们用烂卡车运到大都市。这一带唯一可以安然找到工作，又无需懂英文的城市就是洛杉矶。

非法移民问题事实是由两方面构成的。一是由于墨西哥的贫困化，造成千万人到美国谋生，而移民当局依法办事，不断地抓，抓到就送回去。这是明的一面。而另一面则是美国缺乏廉价的、干粗活的劳工。如加州的柑桔、草莓收采，因为工作粗重而工资低，一般美国人是不会干的。如果农场主能找到一批非法劳工，他们只拿几毛钱一个钟头，什么都干，这个农场主就“发”得起来，而地区性农业或小制造业也正因此兴盛。可以说，南加州的经济奇迹，一部分是依靠这种极廉价的非法劳工而创造的。对这一点，司法部门心知肚明，因而开一眼闭一眼。抓到了就送回墨西哥，抓不到就算，并且也不认真去抓。有一次我开车经过一个大草莓农场，同车的一个美国人指指在田里工作的工人讲：这些人全是非法移民，如果移民局真想抓，只要到洛杉矶城外田里去，要多少有多少。当然移民局是不会劳这个神的。

问题在于“人贩子”。他们把那些对美国一无所知的墨西哥人关在货车上，装在集装箱内运来，有时怕被移民局发现就自己逃了，让那些可怜的人没吃没喝被关到死。1987年在一个货车厢内就发现十几名因此丧生的非法移民，包括几岁的孩子！1988年以来，移民局在洛杉矶市到处搜捕人贩子和收藏非法移民的据点。一个点有时会藏有几十人之多。看见那些拖儿带女的男男女女，真是人间悲剧。

问题之三是犯罪帮派，英文称为G a n g。帮派活动因各种移民增加而越来越严重。瓦茨区的黑人帮派是出了名的，西班牙语社区的墨西哥帮也发展极快，越南难民青年的“越青帮”、港台及大陆部分新移民青年的“华青帮”则更是新现象。帮派控制地头，操纵贩毒、走私、卖淫、抢劫等，对社会已造成极大危害；而帮派之间的武装冲突，则更常常使市民受害。1988年2、3月份，市民被帮派杀害事件常有发生。2月份一个晚上，在豪华的威斯特伍德大街上，一个日本裔少妇居然被帮派分子无缘无故枪杀；3月份，几个市民在路边等公共汽车，忽然被帮派分子从一辆开动的汽车中乱枪射杀。当地的电视新闻，几乎每天都有帮派的新闻报道。帮派搞得市民个人心不安，闹市入夜无人敢去，店主叫苦不迭。于是在1988年4月1日到3日，洛杉矶市出动上千警察搜捕帮派分子，一夜抓了700多个。天上直升飞机，地上装甲车，真像打仗一样。警察局局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讲：由于帮派人员太多，警察不够用，他要求动用国民警卫队“参战”，打一场消灭帮派之战。当然，人人都知道这是治不了本的应急行动而已。洛杉矶是底特律、达拉斯之后美国犯罪率第三的城市。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人心惊了。这个城市，每年非法销售可卡因一类毒品总值达10亿美元之巨。如果到帮派横行的西南区走走，你可见到那些黑人帮派分子开着豪华的价值5万到9万美元一部的“奔驰”、R M W汽车在荒凉的破烂街道上横冲直闯。他们的打手都拿着全新的U z i 半自动步枪，或苏式的A K - 4 7 冲锋枪。据统计，每年死于这些枪口下的人有70%是市民、路人。

第四个头痛的问题是环境污染。这个1000多万人口的大都会，几乎每个成年人都开一部汽车，每天有500~600万部汽车在市内飞奔，排出大量废气。而整个市区位于山谷中，除非有强劲的海风，这些废气是不会散的。上周我在一位教授家作客，他家在离开市区的马里布海湾一个绿色的山头上，面对大洋，同时可以看见海湾对面的洛杉矶。落日时分，从山顶上那间木屋的大平台上看100~200米以下波涛汹涌的太平洋，真是壮阔无比。但当我的眼光转到落日中闪闪发光的洛杉矶市区时，就看见一层厚厚的、黄色的“雾”紧紧地包着整个城市。这才知道这个市的污染严重到什么地步，这才明白这位教授为什么不怕每天开车一个小时上班，也不肯住到市区里去的原因。这个市的居民的头痛、喉痛与其他病症，明显地比加州其他地区居民要高，这就是大气污染的结果。这个问题是市政府无法控制的，有待联邦政府与州政府进一步的反污染立法来解决。解决的首先一步应是控制汽车数量，但汽车却又是人们生活的必需！

海水污染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曾在东海岸有名的赌城大西洋城海边散步，亲眼看见被海水冲上来的垃圾，使得游泳的人望而止步。洛杉矶也出现同样的问题。洛杉矶白色细沙的海滩约百公里，是世界上最长最壮观的海滩之一，只有布宜诺斯艾利斯可以与它相比。最美的一段是从巴洛—维德 (Palos-Verdes) 到马里布 (Malibu)，这一带有一条太平洋沿海公路，一边是棕榈树林，无数的度假旅馆、饭店、酒吧与娱乐场所，另一边则是连绵不断的细白沙滩，无数的人们在这里冲浪、游泳。但如果到沙滩上走走，你就会发现不少被海浪冲上来的城市垃圾，如废瓶子、废塑料袋、包装盒等等，海滩正在被污染。

DDT 在水中含量也急剧升高。地震的威胁，刺鼻的工业废气，海水中的油污与化学污染，还有预言中到 2000 年城市用水的短缺，都是这个急剧发展中的城市所面临的问题。DDT 事实上已进入了洛杉矶沿海的生物链了。不少鱼类体中所含 DDT 已大大高于联邦机构的标准。大量从工厂来的化工、油料废物未经完全处理即倒入海中，产生严重后果。目前，州环境保卫部与地区水质控制局，对未经二级处理倾倒入海的个人与机构处以 62.5 万元的罚款，另一个更严、更重的处罚法令正在州政府进行讨论。

还有个问题就是交通。讲洛杉矶而不讲交通，等于讲广州而不讲广州菜一样荒唐。洛杉矶市区如此之庞大，完全是靠十几条超级公路联系的。这些公路形成一个网络，比如叫“圣·莫尼卡公路”的 10 号国家公路、叫“金色州公路”的 5 号国际公路，以及 110，710，101，210，134，2……等等。这些公路大多是一边 4 条车道，两边共 8 条，完全分隔，行车速度为市区内 80 公里/小时，市郊 100 公里/小时，每日高峰时间，上百万辆汽车在这些公路上飞奔，相当壮观。

洛杉矶的公共交通是相当落后的。当然这里也有公共汽车系统，但由于市区过大，远水救不了近火。出租汽车也有，也是因为市区大，因此动不动就要付几十元“的士”费，平常人大多不坐。外地来的人一下飞机即在机场的租车公司凭驾驶证与信用卡租一辆车，一天租金 25~40 美元不等，于是就有“脚”走了。出差到这里的人，费用除飞机、旅游、日常开支外，大多包括租车费，可见公共交通的落后。

三四十年前，洛杉矶曾经有过十分有效的有轨电车系统。50 年代，美国几家大汽车公司为了推销汽车，用重金买下电车系统，然后拆了！于是造成人人开车的局面。这大约是洛杉矶交通现状的形成原因。洛杉矶超级公路的总长度 1200 公里，同时还有上万条街道，来到洛杉矶，简直像入了迷宫一样。

虽然道路建设很好——洛杉矶大都会的超级公路网是美国第一的，但由于车辆有数百万辆之多，一到高峰时间，交通阻塞仍十分严重。我时常去圣·莫尼卡办事，如果碰巧遇上高峰时间，在几千辆汽车的洪流之中进退不得，一等几十分钟，真是叫人烦恼之极。我上月与英国后现代主义建筑一号权威查尔斯·简克斯博士约好下午五点与他在圣·莫尼卡山顶的别墅吃饭，那天正是星期五——美国的周末，我被交通阻塞卡住了，迟到了一小时，他则被卡到七点钟。结果晚餐告吹，两人在电话中骂了一顿交通。按官方估计，洛杉矶开车人每一天在路上浪费的时间总共达 10 万小时！交通阻塞已经造成南加州人的行动不自由，假如想出去走走，想到交通状况，大多数人就会说：算了，别去了。被阻在万千车辆之中，头顶炎炎烈日，又怕上班迟到，对不少人来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精神压力。有人急了，出口骂人，扔废物到别的车上，这还事小；有人急得开枪杀人。1987 年一年之中，就有三起因交通阻塞、骂前面的人开得太慢而开枪杀人案。除洛杉矶外，还没有听说别的美国城市有同类事件发生。而大部分案件都发生在阻塞最严重的 5 号公路上。

解决的方法呢？当然应加强公共交通，以减少“汽车族”人数。如果开车在这里上班，你会看到 80% 以上的汽车中只有一个人，一家三人上班就是三辆车，这正是问题的根源。市政府与一些大的“都市村”1988 年通过一些计划，准备重建有轨电车。虽然耗资巨大，但可望起码在市区内解决部分问题。

其次是加建公路。从绝对数字讲，洛杉矶的公路是美国城市第一的；但从人平均讲，则十分落后。按人/英里计，洛杉矶在美国名列17位；按人均公路投资计，洛杉矶与加州几乎成为美国50州中最后几位。这个州虽富，但人口极多，车辆也多，而州政府对加建大量公路举棋不定。当地社区为了保护市区建筑，反对拆建，问题迟迟不得解决。因此布鲁克林学院教授安东尼·董斯开玩笑说：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买辆BMW（极贵的西德豪华汽车，每辆价格2~6万美元不等），有舒服的座椅，高级音响，汽车电话，尽量享受！他的意思是在交通阻塞中只好听音乐、打电话消磨时间。

洛杉矶市区不断扩展，大量居民越住越远，将会使这个问题更为严重。来回开车二小时的“上班族”（英文叫Commuter）会越来越多。

六

洛杉矶未来的发展有赖于以上问题的解决。洛杉矶有关部门目前已从宏观、未来角度来找寻解决问题的途径。例如，南加州政府部门协会最近安装了一台现代化的大型电子计算机，对2010年洛杉矶的交通状况进行预测与模拟。解决的结论正不断由计算机中显示出来。例如建双层高速公路，加建公路，增设公共交通体系，改革交通管理体系，等等。但在所有这些解决方法中，最有效的（无论是计算机评定还是人工评定），只有一项——把就业人口的住处与工作地点距离拉近。换句话说，就是就近就业。

洛杉矶一直是在与问题斗争中成长的。建设初期，无水是个大问题。结果兴建大水渠，从内华达州引水，到本世纪20~30年代这个问题即得到解决，从而造成经济繁荣。原来天然港口条件不好，大船进不来，因而影响贸易。于是在圣·比德罗兴建人工新港，洛杉矶一跃成为外贸中心。90年前，洛杉矶面积比现在小得多，人口也少得多，而今日变成一个含有5个县、157个市的大都市区，问题当然是不可免的。而世界上从来未有这么一个大城市，所以它面临的问题中不少是史无前例的，更具有挑战性。洛杉矶一个市有六个大型机场，几乎每个大区（县）都有一个，每日数千架次飞机在六个机场起落，加上无数的私人飞机、直升飞机、军用飞机，使洛杉矶的上空也变得如同地面一样拥挤。1987年年底，里根总统坐直升飞机回他在圣塔·巴巴拉的庄园去，几乎被一架私人小飞机碰上，即可说明空间之挤。而那架小飞机在空中巡逻队的警告之下，能在5号公路上降落，又可说明这里公路条件之好。真是一个古怪的大杂烩！

____洛杉矶解决问题的方法，看来在于“非中央化”（decentralizing），即把原集中在几个区的经济、文化、政治、商业、居住、娱乐设施，尽量分散到更多的“都市村”中去，创造就近就业，减少“上班族”，减少车流，加强法制，控制污染……。如果“非中央化”，或称“权力下放化”计划成功，洛杉矶的前途将是无可限量的。